

---

# 苏轼研究

2014 年第 4 期（总第 39 期）

（季 刊）

## 卷首语

东晋永和九年（353）上巳节，王羲之召集谢安、王凝之、王献之等 40 余人，于会稽山阴之兰亭雅集。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共作诗 30 余首，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了享誉千古的文坛佳话。而雅集也成为历代文人追慕和模仿的对象。苏轼《满江红·东武南城》曰：

东武南城，新堤就、郑淇初溢。微雨过，长林翠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试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将相泛曲水，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坐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

中国文人历来有“以文会友”的优秀传统，无论是古代“十日一会，或一月一寻盟”的文人雅集，还是伴随着相互仰慕、惺惺相惜的交游唱和，抑或是现代社会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文化交流平台和形式，文字总能穿透时间和空间，实现思想碰撞和精神交流，迸发智慧的火花，叩击人们的灵魂，带来无数的启迪。很幸运，《苏轼研究》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里广大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可以展示悉心研究的成果，可以为一个论题或研究方向各抒己见，甚至可以为一个观点展开辩驳……

在这一期的《苏轼研究》中，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身影，不仅有苏轼密州时期的思想、作品研究，还有胡传志老师就乔建功、王宪斌《三苏园“苑中碑”的时间推断及历史价值》而作的《苑中〈题二苏坟〉写作时间补证》等，相信大家看了一定会有新的启发。

---

# 苏轼

## 研究 SUSHIYANJIU

2014 年第 4 期（总第 39 期）

（季 刊）



## 目 录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主 编：张志烈  
□副 主 编：宋明刚 方永江  
□责任编辑：刘清泉  
□编 辑：袁 丁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mailto: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华信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 年 12 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特 稿

刘小川与苏东坡 蒋子龙/4  
闲谈哲思与国学 刘小川/5

### □苏学论坛

超然物外：苏轼人生思考成熟的标志 王启鹏/6  
谈苏轼价值观的三境界（下）  
——廓然境界 郑秉谦/11  
苏轼超然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变奏  
——以密州为中心的考察 彭林泉/16  
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苏东坡诗酒人生的多元境界 王许林/23  
苏东坡人生起跳与乃父乃母 涂普生/29  
论苏轼治徐守密时期的求实作风 林冠群/32  
清廉苏轼及其启示 胡先酉/38

□顾问：李 静 宋朝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乃昌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李景新  
冷成金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周成仕 周裕锴  
祝 云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赖正和  
蔡心华 潘殊闲

---

苏轼与中国墨文化 刘晓凤/42  
苏轼笔记文之我见 许植基/49  
苑中《题二苏坟》写作时间补证 胡传志/55  
东坡文化研究上的惰性思维 饶学刚/57

## □诗文鉴赏

千古绝唱悼亡词  
——试析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陈慧君/61  
习主席李总理引用苏轼名言  
——读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 王晋川/66

## □新书评介

《苏轼词编年校注》第五次印刷后记  
邹同庆 王宗堂/67  
开卷有益的“另类”窗  
——读夏海《品读国学经典》别札 方永江/71

## □苏学专家

三苏葬邳追梦人：乔建功 王宪斌/73

## □本期关注

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致辞 苏 灿/76

## □研究史话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十三) [日]池泽兹子/77

## □景苏札记

我与苏东坡的“第二次握手”(三)  
——河南卫视《成语英雄》拍摄记 李 新/79

## □苏学动态

“苏东坡的流寓人生与文学研究”会议召开 一 隅/80  
“地方传统文化进课堂”教学展评举行 一流/80

# 刘小川与苏东坡

蒋子龙

这两位相距 923 年的人物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关联大得很。他们是近邻，苏家的宅院在改为“三苏纪念馆”之前是不封闭的，因此刘小川自小跟苏东坡吃的是同一个井的水。苏东坡曾在自家院子里栽过一棵荔枝树，此树现在还活得颇为健旺，刘小川少年时代没少吃这棵树上的荔枝，可谓“前人栽树，后人吃果”。但最重要的关联是刘小川写了一部《苏东坡》，这是一部厚实的大书，资料丰富，内涵充溢，境界阔大，情智饱满，文字多姿多彩，时有惊人之语，精神的力道很足，正好与坡翁的巨人体量相称，足可构成一门“苏学”。有一种好书是让人放不下，又舍不得一下子读完，总想读却又老是停下咂摸其中滋味，《苏东坡》就是这样的书，是刘小川先生“品中国文人”系列的巅峰之作。

我最早被“刘小川”这三个字惊住，是在《小说界》上读到《司马迁》、《嵇康》、《屈原》、《李白》等，“品”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人物，曾被无数人讲过、评过、写过，他竟能以精妙的哲思、丰沛的情感、飞扬的文采，“品”出了新意和深意，读来妙趣横生，又不失思想的光芒。急功近利的社会，人们常津津乐道那些靠巧劲、凭聪明、撞上了大运的成功者，而像《品中国文人》这样的书，单凭一个“好点子”或聪明劲，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必须要有真才实学，下过“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功夫。我自己读书不系统，学识不足，对有学问的人总是格外钦羡，自此，凡见到刘小川的文字，必买下来一读为快。

前年一位朋友的孩子刚初中毕业就要去英国读高中，临行前他领着孩子到我家来，一定要我对孩子嘱咐几句。我不能用几句空洞的鼓励话敷衍，便如实说出自己的忧虑：我在国外的中国朋友家里接触过这样的孩子，中文快忘了，外国文化没有学好，两头够不着，弄不好会影响孩子一生的选择。

怎样掌握外国文化的精髓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怎样不丢了中国文化……说着从柜子里搬出积存的一摞《小说界》，从刘小川“品”的中国文人中一个时代选一个。由于孩子出国的行李已经很重了，不能带那么多整本的杂志，就忍痛将其中的刘文撕下来，摞在一起不过一本书厚，然后我对孩子说：我们的经典书籍你带不动，带出去如果看不懂或没有兴趣，丢在一边岂不白费劲？我给你的这些中国文化标志性人物的传记，是我自己珍藏的，保证你读得进去。每当孤独了，想家了，想国内的一切人和事了，都可以读这本书，把这些人物读透了，中国文化你就丢不了啦，中国的历史也记住了大概，就可保住自己的根！不管外国的东西你能学到多少，保住自己的根就能以不变应万变，甚至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前不久我去四川洪雅参加一个活动，特地绕道眉山拜访刘小川先生，不想他的家就在“三苏纪念馆”旁边，提议再到馆里看一看。我也很想再进去拜一拜“三苏”，但又有些心怯。许多年前跟几个文友第一次参观此馆后，馆里叫我留句话，没有仔细斟酌便把当时的真实感受写了下来：“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三苏。”舒婷站在我旁边，当即问了一句：“拜过之后可有豪气了？”我无言以对，在场的人也都听到了并成为见证。如今我真的不敢说文章有了豪气，却可以肯定地说因年岁增大锐气反倒有些钝了，实在是有些无颜再拜“三苏”。刘先生见我犹豫，不仅顺口背出了我当年的“题词”，连落款也一块念了出来：“小作家蒋子龙放肆。”话说到这个份上，圆乎脸一抹变长乎脸，权当再“放肆”一回，就放胆随刘先生又走进了纪念馆。此文开头提到的古井、古树，都是走过井边树旁时小川亲口告诉我的。

（下转第 5 页）

# 闲谈哲思与国学

刘小川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后来知道那是哲思的萌芽。小时候天天疯玩，天上都是脚板印，感觉、意绪何止几千种，打下了现实感的比较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上的读与思，庶几能获得穿透力。思想所到之处，生活扑面而来。每每有读者对《品中国文人》、《苏东坡》感到好奇：写几十个标志性的大文豪，那要查多少资料啊？蒋子龙先生不久前来眉山，也问这问题。其实不用查太多的史料，感觉和印象的紧急集合更能扑向思索，提取人物的生命精华，描绘他们的命运曲线。《品中国文人》面世七八年，依然活得不错，魏心宏先生写信说，在今年八月的上海书展上仍然受欢迎。

不过哲学书真难读，文字密度大，尤其是创造性的哲学大师们，思人类之所未思，注定要生造大量的、环环相扣的哲学概念。我的“摸高式”阅读，摸了三十余年，从萨特、罗素、马克思到海德格尔。半个月不摸哲学书，手会发痒的。于是我像个钟摆，长期摆动于哲学与文学之间。有些书，几个月读下来，读懂两三百页就不错了。《存在与时间》，我从九十年代初读到今天，暗自揣测，可能悟到一小半。张汝伦教授的大著《存在与时间释义》，煌煌四大卷，一百二十多万字，我下了决心，用两年的时间攻下它。哲思进一寸，文学长三尺。今日之世界太复杂，要赢得严格意义上的全球视野，没有哲思不行。眼下的文学也好，国学也罢，缺了哲思的维度，一定会囿于自身，年复一年在小圈子里打转，并且把小圈子认作大圈子，孤芳自赏或泥古不化。韩少功先生抱怨看不懂现象学，讥讽“现象学时髦”，看来是因为用功少的缘故。

海氏告诫：少一点哲学，多一些思想的细心；少一些文学，多一些文字的保养。

中国古代的文化先贤，都有哲思的轨迹。苏轼《思堂记》，有现象学式的领悟。但“国学”这个词，我是不大用的。学问之事，本无东西。人活着，总会有某种哲思。不识字的老农可能比大学教授更能领悟事物，这里有海氏讲的“前现象学式的领

悟”。苏轼云：“人生识字糊涂始”，包含了这层意思。苏轼自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听上去像豪言壮语，其实是经验之谈。底层乞儿领悟的东西，云端的玉皇大帝哪里懂得。所以，作家是没有身分的人，优秀的作家能穿越社会各阶层。

国学一词留给人的印象，是抵挡强势的西学，恐怕暗含了文化自卑，慎用为宜。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大师几乎都是批判西方的，中国传统文化倒是给这个星球提供了首要的普世价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末了，贡献一点读哲学的体会：读了就忘了，忘了可能就记住了。

（刘小川，当代著名作家、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上接第4页）

我是有一些问题要向他请教的，比如为什么像火山爆发似的如此大规模品评中国文人，只几年的工夫成书近200万字，即便不好说字字珠玑，也是篇篇精彩，本本厚重？还有，读他的书，你无法不惊异于作者的渊博学识和博闻强记，奔涌的哲思随手拈来，又恰到好处，极其精当。好像他把古今中外所有有价值的书，特别是经典及哲学著作，都能倒背如流，一个“60后”是怎么做到的？他却说得极其轻巧：读过就忘了，忘了就记住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哲学是万树之树，“没有哲学就没有文学”。但只有思想才能生发思想，刘小川有强悍的思想发射力，他拢集了三十余年的读和思，曾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保持着“强行军般”的写作态势，“未曾见过的词汇几乎是自动涌到笔下”。古代文人是历史的馈赠，三皇五帝没了，唐宋帝国灰飞烟灭，传统文化的甘露始终是甘露。文气通正气，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文章，古今人杰没有一个是浅表性生存……“小川”已成江河，波澜壮阔，气势非凡。

（蒋子龙，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转自2014年11月4日《新民晚报》）

# 超然物外：苏轼人生思考成熟的标志

王启鹏

**内容提要** 苏轼是个智者，他从小就对人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文章从他的青少年开始直至在密州任上提出了超然物外的思想为止，具体研究了他在各个时期对人生思考的言论和行动，得出了“超然思想的提出是他人生思考成熟的标志”的结论。文章还阐述了超然思想对于认识人生的作用。

**关键词** 苏轼 人生思考 超然物外 寓意于物 成熟

王水照、崔铭两先生合著的《苏轼传》书名冠以“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这就道出了苏轼的一大特点：智者。这是十分准确而又非常有意思的。所谓“智者”，就是指有智慧的人，或是说智力超常的人。这些人对许多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而苏轼确实是这样。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颀颀当世贤哲之意。”<sup>①</sup>可见苏轼从小就是一个智力超常、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用现代话语来说，苏轼是一个思维早熟的人，他在少年时期的思维就非常活跃，知道许多令成年人都未能弄清楚的事情，尤其是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也显得很老成，很有特色。其中“超然物外”思想（简称为超然思想）的提出，就是典型的一例。

## 一、苏轼在青年时期就不断地探索人生

苏轼之所以会在青少年时期就不断地探索人生，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正如他在《密州

谢上表》中所说的“臣家世至寒”。苏轼自小生活在农村，经历过“少年辛苦事犁耕”（《野人庐》）的生活，遭受过“小人自疏阔”（《答任师中家汉公》）的冷遇，目睹了“野人喑哑遭欺漫”（《和子由蚕市》）的悲惨情景，所以，他对贫民百姓的生活出路就一直关注。表现得最为集中的是，嘉祐四年（1059）十月，在家服母丧后启程还朝，父子三人一起坐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凡与耳目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其中苏轼的好些诗文就是和人生联系起来的。如《夜泊牛口》诗就最为典型：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  
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  
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儿女自咿嘤，亦足乐且久。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  
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sup>②</sup>

苏轼看见山中居民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显然是“足乐且久”的；而自己呢，却要为生活而“汲汲强奔走”。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所以，为了追求“富贵”的生活，就要劳碌奔波了。

进入忠州地域，苏轼看见屈原塔。苏轼认为：“在忠州，原不当有碑塔于此，意者后人追思，故为作之。”他想到了屈原的为人，想到了屈原的死，最后认为：“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

所以持死节。”(《屈原塔》③)在这里,苏轼对“名声”与“富贵”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名声”是长久的,而“富贵”是短暂的。

走出了黄牛峡,也就是走出了长江三峡的激流险滩,苏轼又发一通议论:“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出峡》④)走完了长江,到达浏阳时,苏轼好像要对自己旅行心得来个总结似的写道:“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器器好名心,嗟我岂独无。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浏阳早发》⑤)苏轼自己也承认,“富贵本无定”的,但自己也不免了世俗,还是要去追求的,只不过不要太疯狂就是了。

这是苏轼尚未进入仕途时对人生思考的第一阶段。

## 二、入仕后对人生的思考

嘉祐五年(1060)二月,苏氏三父子抵达京师。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不赴。与弟苏辙寓居怀远驿攻读,准备参加制科考试。这时,苏轼献《进策》和《进论》各25篇,应制科试,取为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十一月前往赴任。

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从小在一起玩耍,一起读书,形影不离,感情十分深厚。现在两人要分开了,自然不习惯,显得十分痛苦和无奈,所以子由要送他去赴任。当送到郑州,刚出西门作别时,苏轼的内心就十分痛苦,在《辛丑十一月十九日……》⑥诗中说:“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当苏轼一个人来到当年他们赴京应举时曾住过的浉池,看见接待过他们的老僧已经死了,曾经题过诗的墙壁也已经损坏了,于是感慨万分。当接到弟弟的《怀浉池寄子瞻兄》诗后,马上和诗《和子由浉池怀旧》⑦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从苏轼的这两首送别诗我们就可以看到,苏轼对人生确实有独到的认识的。他把人生比作“飞鸿踏雪泥”,这是非常形象而又深刻的。既然人生在世只不过是“偶然留指爪”,所以就应该“慎勿苦爱高官职”了。两人尚未正式为官,就相约早退,共为闲居之乐了。

苏轼到了凤翔履行人生的第一次任职,有幸看到了凤翔的8件宝物,当他看到了仰望已久的周朝时的石鼓时,忍不住写道:“兴亡百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⑧由眼前的石鼓想到时代的变迁,再想到人生。他在给予由的和诗中亦说:“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方愁后会远,未暇忧岁夕。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胡为独多感,不见膏自炙。”所以,他和苏辙约定:“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⑨不久又说:“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三⑩)由此可见,苏轼离别了弟弟到凤翔来任职是不得志的,所以他又写诗劝子由要看淡名利和富贵:“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莠。”“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⑪)苏轼虽然认为自己与“官爵”和“富贵”无缘,但为了生存还是要去当官的。

苏轼虽然为生存而奔波操劳,但他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心中有着自己的远大志向。当他罢凤翔任还朝时,路过秀州时就说:“鸟囚不忘飞,马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秀州僧本莹静照堂》⑫)甚至还说自己“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二⑬)可是,现实并不是如苏轼的愿望那么完美的。是时,宋神宗正在支持王安石变法,而苏轼又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于是乎苏轼只能“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泗州僧伽塔》⑭)甚至发出了“我生飘荡去何求”(《龟山》⑮)的慨叹。

在苏轼踏入官场的第一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是身心疲惫的。他对官场感到厌倦,但为了生存又没有办法,只得违心地干下去。

### 三、在王安石变法中受挫后对人生的思考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苏辙在川居父丧后还朝。是时,“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三年,又让苏轼“权开封府推官”,企图用具体的事务缠住苏轼,不让他参与朝廷政务。四年,王安石大肆推行变法,但苏轼都持不同意见,并提出批评。于是,“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诬苏轼兄弟扶父灵柩回川时贩数船苏木入川),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sup>④</sup>苏轼在《与张君子书》(其五)<sup>⑤</sup>中谈到他请求外往的原因也说:“而为郡粗可及民。又自顾衰老,岂能复与人计较长短是非,招怒取谤耶?若缄口随众,又非平生本意。计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

苏轼一到杭州,就遇到严重的蝗灾:轼“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sup>⑥</sup>)加上此时又实行手实法和免役法等新法,苏轼感到十分无奈,他在给弟弟子由写诗说:“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sup>⑦</sup>)还自嘲地说自己“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戏子由》<sup>⑧</sup>)。是年苏轼才37岁,正是年轻力壮、大有作为之年,可他却说“如今衰老俱无用”,这显然是对时局大大的不满。所以,他在《送岑著作》<sup>⑨</sup>中说:“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直者有时信,静者不终居。而我懒拙病,不受砭药除。”还坚持说自己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次韵孔文仲摧官见赠》<sup>⑩</sup>)。既然是改不了不向改革派屈服的个性,那应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做个“中隐”之士:“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sup>⑪</sup>)

什么是“中隐”?白居易在他的《中隐》诗中写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日有俸钱。……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这种“中隐”的实质就是:不做京官,做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官;不再以隐作为实现独立和价值的途径,只以隐作为隐姓埋名、自我潜藏的一种手段;不抛弃隐士的名称,以隐逸作为虚幻的精神寄托;做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拿一份不薄不厚的俸禄,过一种不紧不慢的生活,讨一份不喜不忧的心情。<sup>⑫</sup>所以,“中隐”这一观念在唐宋时期的官场上是得到认同的。

但是,苏轼绝不是这种人,当他看见江浙农民“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的现状,看见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伤害时,就“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并写了一些反映新法的诗歌,如《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目的是让皇帝看到了,能了解新法的弊端。所以,这时的苏轼在农村巡视时的感受是:“身世悠悠我此行”,但“惟有悯农心尚在”,所以他才能事事都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并为农民的利益鼓与呼。

当然,此时的苏轼对人生的感触也是颇为深沉的,他说:“人生如朝露,要作百年客。喟彼终岁劳,幸兹一日泽。愿言竟不遂,人事多乖隔。悟此知有命,沉忧伤魂魄。”(《九日,湖上寻周……》<sup>⑬</sup>)甚至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天全。从教世路风波恶,贺监偏工水底眠。”(《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其一<sup>⑭</sup>)可见他在杭州通判期间的思想是十分矛盾的。

### 四、守密时对人生思考的成熟

通判杭州届满,熙宁七年(1074)五月移知密州。为什么他要主动请求调往经济落后的密州去呢?是不是如他在《密州谢上表》<sup>⑮</sup>中所说的“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充;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呢?不是的。苏轼通判杭州,本来就是为了避开朝廷的斗争而自请外任的。他原想在外地等待有利时机再回到朝廷。可是,三年过去了,朝廷中的斗争却更加激烈。在韩绛、吕惠卿主持朝政下,继续大力推行新法,对欲动摇新法或起用旧党人的举措、建议,



都坚决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要回到朝廷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为了远离斗争漩涡，等待时机，他才自动请求调往密州。<sup>③</sup>正如他刚到密州时写给王庆源的信中说的：“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谓‘居闲食不足，从官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谓矣。”（《与王庆源十三首》其一<sup>④</sup>）

苏轼请调密州不仅是为了避祸，更主要是要等待时机。他在赴密州的路上写给苏辙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sup>⑤</sup>词就说得很清楚：“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在这里，他把他们兄弟俩比作西晋时期才华横溢的陆机、陆云兄弟，且说致君尧舜之事何难？但在这个时候，苏轼兄弟俩就应该保重身体，“袖手闲处看”了。这样说，还不是有明显的等待时局变化的意思吗？

当时的密州，经济发展本来就落后。苏轼到任那年，正好遇上严重的天旱和蝗虫灾害，苏轼要全力带领地方官员和百姓投入到灭蝗斗争中去。由于地方经济落后，密州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艰苦，正如苏轼在《后杞菊赋》<sup>⑥</sup>中说的那样：我“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对人生怎样看待呢？庄子的齐物论思想马上涌现出来：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sup>⑦</sup>

庄子在《庄子·齐物论》<sup>⑧</sup>中就说过：“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把世间的任何事物都看成是无差别的，而苏轼也是一样，把“贫”与“富”，“美”与“丑”，“梁肉”与“糠核”都看成是一样的东西，并且认为吃这些粗糙的食物也许能长寿

呢。这是他初到密州时所形成的超然物外思想的基础。以后，他在《和蒋夔寄茶》诗中将他赴密前后的生活作了对比：在吴越时，“三年饮食穷芳鲜”，吃尽了高档的食品；到了密州后，就只能“厨中蒸粟堆饭瓮，大杓更取酸生涎”了。苏轼近似总结地说：“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死生祸福久不择，更论甘苦争蚩妍？”<sup>⑨</sup>这就说明苏轼是具有牢固的“随遇而安”思想的。

随着苏轼对人生思考的深入，他在到密后的第二年便重新修整了西城台（后称超然台），作为登眺游息之所。于是，便借机向友人广泛征集台名。而对家兄有深切了解的弟弟苏辙，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耶？”

《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超然台赋》<sup>⑩</sup>）苏轼则欣然同意，并大加赞赏。所谓“超然”者，就是“超然物外”之简称也。超者，高超脱俗；物外者，世外之谓也。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超出世俗生活之外，不受外界物质的诱惑。

苏轼在《超然台记》<sup>⑪</sup>中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这就是“超然物外”思想的表述。这一思想的提出，说明了苏轼已经将他过去对人生思考的心得体会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形态，并提出了观察外物的方法，从而使这一思想具有普世价值。因此可以说，“超然”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苏轼对人生思考的成熟。

## 五、超然物外思想对于认识人生的作用

《超然台记》的思想非常丰富，我在《超然：苏东坡思想的精髓》<sup>⑤</sup>一文曾作了具体的论述，认为此文表达了苏轼透彻的人生哲学思想，旷达的处世思想和强调神似的超然艺术观。如果仅从人生哲学角度来研究，苏轼最大的贡献就是给后人提出了人类认识和处理外界事物的思想方法，要求人们要“游于物外”。二年后，苏轼在徐州任上又将这一思想作了具体的发挥，他在《宝绘堂记》<sup>⑥</sup>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

“寓意于物”和“留意于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寓意于物”，就是说每一事物都可以寄托人的思想感情，让人从外界事物中感到快乐。人是以一个观赏者的身份来看待事物的；而“留意于物”呢，则是“在意于物”，即斤斤计较一物之得失。在这里，人是作为物质的获取者来看待事物的，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为什么说“留意于物”不对呢？因为“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从现代心理学来看，世上的种种纷争，无非是为了财富，为了名誉，都不外乎利益之争。我们身在其中时，不免把它们看得很重。但是，如果我们是第三者，用“超然物外”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我们拼死拼活地追求的物质享受和名誉地位是十分可笑的，不值得的。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激励理论》中就提出：人类生存需求分成5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亦称为社交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人类的生存，物质东西多一些固然好，但能保证基本生存也可以了。至于对精神财富的追求，由于各人的

素质不同，成就当然也就不同了，所以人与人之间根本上不存在冲突。由此看来，人世间的东西，有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还有一半是不需要争的。况且，在终极的意义上来说，或是用庄子的“齐物论”思想来看，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云烟，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佛教教我们“得不喜，失不忧”，要人们用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事物，千万不要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我国古语也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就是苏轼“超然物外”思想应有的内涵。它对于人们正确地看待人生，并用于战胜人类在生活中遇到的苦难是十分有用的。

## 六、余论

由于苏轼在密州时期就树立了“超然物外”的思想，这就为他以后遭受到三次贬谪的痛苦遭遇做好了思想准备，使他能够从贬谪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的困苦生活中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如在黄州的东坡地上种植小麦、水稻；在惠州种菜、种茶。又由于他有了一颗“无区别”之心，就使得他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做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sup>⑦</sup>更由于苏轼具有超然物外的思想，使得苏轼能够忘掉自己的痛苦，始终保持着一一种热爱生活的心态，不论是做官还是遭受贬谪，始终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把“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东坡文化现象，使得后人对此现象百谈不厌。这就是“超然物外”思想所产生的神奇效果。当然，苏轼能够做到这样，也离不开宋代文人普遍高扬主体精神的社会大环境。他们不肯屈从官方或世俗的观念体系，他们看重自身的修身养性，而不屑于官场的进退，追求“自得”和“乐”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境界，所以才能形成“超然物外”的思想，只不过苏东坡就是其典型代表罢了。

（下转第15页）

# 谈苏轼价值观的三境界（下）

## ——廓然境界

郑秉谦

**内容提要** 本文从苏轼的“浩然”、“超然”及“廓然”三个境界，来谈他的价值观，并探索这三种境界的相互关系及其文化渊源。

**关键词** 苏轼价值观 浩然之气 超然之度 廓然之思

### 廓然境界

苏轼价值观中的廓然境界，同其超然境界有重叠的部分，但更有不同的部分。简单说来，超然境界使他把今天的穷与过去的达都看得很淡，令自己得到清静与愉快，但目的仍是“有待”于达。而廓然境界，使他把穷达都看得很空，从而无待无思。自这种境界出发，眼前与胸中均“廓然无一物”（《与子明兄一首》<sup>⑩</sup>），既无穷亦无达，既无过去亦无今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sup>⑪</sup>）这种廓然境界，虽到他晚年贬往岭南海外才趋于完整，但其始却很早。举例说，他一辈子钦佩陶潜的为人与作品，但他却认为“渊明非达”，这里的“达”指达观。他说：“陶渊明作《无弦琴》诗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子曰：渊明非达者也。五音六律，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无琴可也，何独弦乎？”（《渊明非达》<sup>⑫</sup>）陶潜在《自祭文》中说“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苏轼认为不彻底，说：“但恨其犹以生为寓，以死为真。嗟夫，先生岂真死独非寓乎？”（《渊明无弦琴》<sup>⑬</sup>）至于刘伶，他也不以之为“达”，说：“刘伯伦尝以锺自随，曰：‘死便埋我’。苏子曰：伯伦非达者也。棺槨衣衾，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死则已矣，何必更埋！”（《刘伯伦非达》<sup>⑭</sup>）正因为此，他在当徐州知州时就作过一首诗：“我笑陶渊明，

种秫二顷半。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无弦则无琴，何必劳抚玩。我笑刘伯伦，醉发蓬茅散。二豪苦不纳，独以锺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孰云二子贤？自结二重案。”（《和顿教授见寄……》<sup>⑮</sup>）以耕以酒自隐的陶刘二人都不算达，他人就更不用说。东坡自以为他比谁都“达”都“了”。

宋代士大夫中的参禅者，常以“了事汉”作为对人的赞誉之词。“了事”，就是“廓然境界”在生活中的表现。苏轼前半生，虽未完全“了事”，但他所作的“了语”却很多。举例说：以“断肠”言相别之痛，已颇极端，但他说送别归来“欲断无肠”，意为肠早已痛断，比极端更极端。说凭栏人易老，已颇极端，但他说：“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法惠寺横翠阁》<sup>⑯</sup>）说万事转头空，已颇极端，但他说：“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说往事如梦，已颇极端，但他说：“已（以）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答李端叔十首》其三<sup>⑰</sup>）他一生中，在诗文中不计其数地写过人生似梦似寄。光其中“人生如寄耳”一句就在诗中，至少重复使用了九次。<sup>⑱</sup>这不因他江郎才尽，无法用其它句子来代替，而是因为他这种感慨实在太深了。但这些仅为诗文中的“了语”，而非生活中的“了事”。它既反映早期苏轼价值观中的“廓然境界”，但也反映了这种“廓然境界”的不彻底、不牢固。

使苏轼“廓然境界”完整形成并日趋牢固的，看来始自惠州之贬。绍圣元年，他受人诬陷，从一个地方大员一步步被贬为不得签署公事的从八品罪官，从雄卫北疆被逼待罪岭南。虽然此前他已有一定思想准备，但也未料到会如此一撸到底，并还“畏有后命”。这对他打击很大，到惠后致信参

寥说：“自揣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屡起，数为世务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与参寥子二十首》其十九<sup>⑥</sup>）他的一些得道朋友，如佛印、吴子野都十分关心他的命运，纷纷指点他。如他南下过扬州真州时，见到在旅途中的吴子野，吴无一语涉及得丧休戚，只说：“邯郸之梦，犹足以破妄而归真，子今日见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与吴秀才三首》其二<sup>⑦</sup>）

佛印在他到惠的次年，写长信予他以当头棒喝。其中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耳，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sup>⑧</sup>东坡在惠期间，虽前后两任知州詹范与方子容均对他极好，可是当时他还是为了住房问题大受刺激。可能因为州里没有合适的公房吧，他被安置于合江楼住。但合江楼是监司行衙，属广南东路监司所有，供运使、提刑和常平三位监司长官巡行时居住。不久东坡被人以“法不得久居”为名逐出。他所退居的嘉祐寺，不能遮风挡雨，他不得不倾其所有，在白鹤峰造屋。当时他虽以他的超然之度从容应对，但所受的刺激极大：一个两部尚书、二度内相、八州太守竟然连个遮风挡雨之处也没有！贬逐期间的屈辱与穷困是无情的现实，这促使他的价值观中的廓然境界进一步发展与固定。

这一现实逼得他不能不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内心的庇护，以便自己平安而快乐地度过此劫与此生。他找到的是佛禅的“空”与老庄的“无”。当时他刚刚经曹溪南华寺来到惠州，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南宗禅。我国从中唐开始，南宗禅大发展。当时禅宗五祖弘忍欲传衣钵，命弟子作偈，以便他择优选取接班人。首座弟子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僧众以为他明心见性，衣钵必落他手。不料一个踏碓的僧工慧能听到了，因自己不识字，便口授偈语托人书写，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他“彻见心性”，便将衣钵传给了他。慧能十多年后，便成为禅宗六祖。六祖与他的两传弟子马祖道一等，开启了南宗禅的大盛之门。中唐大文人中，如白居易、柳宗元等都是南宗禅的信徒。东坡早年即对“无镜则无尘”之说已有感悟。他于绍圣三年四月，再次被迫迁出合江楼，在风雨不蔽的嘉祐寺又住了近十个月，才迁入匆匆落成的白鹤新居。他在这“有屋二十间”的

新居中辟了一间“思无邪斋”，并写了著名的《思无邪斋铭》<sup>⑨</sup>，其铭的上半部是：“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圆明，镜镜非我镜。”这四句偈，下两句来自六祖慧能，上两句则来自《老子·十三》：“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本来，镜上有尘而勤拂拭，就很“了”；但若根本无镜，则尘无处可着，岂不更“了”？本来有病即治，就很“了”；但若无身，则病无所着，岂不更“了”？而我们知道这种思想，东坡并不自今日才有的，他早年从徐州、汴京去湖州上任时，过无锡惠山，曾赠钱道人三诗，其中有一首说：“有主还须更有宾，不如无镜自无尘。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前觉痛人”。（《钱道人有诗云……》<sup>⑩</sup>）五年后，他自黄移汝过金陵时，在《次韵答宝觉》<sup>⑪</sup>一诗中，又说：“芒鞋竹杖布行缠，遮莫千山更万山。从来无脚不解滑，谁信石头行路难。”关于这首诗，需稍加解释：有僧去见石头和尚希迁回，马祖道一问“从何来”，僧答“石头”；马祖说“石头路滑，还趺到汝么”，僧答“若趺到，即不来”。可是，若从字面上，则似更易理解，它只是说“石头路滑，若想不滑，不如无脚”。这说明了东坡的价值观中早就有廓然境界的雏形，只是这两次被逐出合江楼，使他“动了真个”，这境界便更加成熟与完整了。这个境界的核心是无镜则无尘，无身则无病，无脚则无滑。这便是苏轼的“破妄归真”，便是他寻找到的自家“本来面目”。

苏轼虽早已认识到“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物”（《怪石供》<sup>⑫</sup>）但只停留在口头上或诗文里。只有当现实生活迫使他追求“无身”（或老庄所谓“吾丧我”）时，他才真正接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无差别，接纳“相即非相，非相即相”的彻底空。既然连自己都“无身”或“吾丧我”了，也就是连自己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有待”、“有思”呢？于是他正式认可了无待无思。在他第二次被迫迁出合江楼，特别听说宰相章惇发话“被贬逐的元祐大臣终身不徙（内迁）”后，他写了《迁居》，明确承认“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这可能是他第一次说“无待”，而他过去的“超然境界”则是“有待”的。他现在终于认识到庄子“乌乎待”发问的意义了。同时他在上述的《思无邪斋铭》<sup>⑬</sup>的序中，说“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正式提出要作“无思之思”（没有思虑的思）了。“无待无思”，便是他从他价

价值观中的“廓然境界”中引申出来的。于是他到海南的第二年，安然地写下了以下诗句：“昔我未尝达，今者亦安穷？穷达不到处，我在阿堵中”，“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和陶拟古九首》其一⑦）

色与空的无差别，相即非相的彻底空，这种观点使世上的一切都被“空”被“无”否定了：既无夜光之珠也无瓦砾之什，既无达也无穷，既无荣也无辱，既无昔也无今，既无思也无待，既无同也无别。而一切都被否定的结果，又使一切都被肯定。被否定的一切，又借“空”与“无”复活了。但这时东坡已用不着去思量它们的相同或差别，用不着再一味苦苦追求内心的空寂清静，而可以随缘自适地在生活中感受活泼泼的情趣了。中唐诗人吕温说：“水上无恒地，云行不计程。到处即彼岸，过去即前身”。⑧苏轼在惠、儋与归途的七年间，充分地享受了这种自由的、有情趣的生活。

东坡其人，本就乐于与人相处，一向以平等心与各式人等相交，无朝无野，无雅无俗，无高无下，甚至无善无恶。他能设酒款待一个在风雪中奔驰的面色如铁的陌生公差，能与素不相识的游人一道嘻嘻哈哈登上焦山，能以太守之尊“敲门试问野人家”讨茶止渴。原因无它，只在他一向自命“使君原是此中人”而已。（《浣溪沙》⑨）贬谪黄州，他更“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⑩甚至“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⑪）他“在黄州与岭表，每旦起，不召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则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矜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所以他在黄州之贬后就自称“废弃六年，已忘形于田野”，“耕川凿井，得渐齿于平民”。（《到常州谢表二首》其二⑫）到了晚年的岭海之贬，他更全身心地投入当地民间，把自己融入岭表枯寂之乡，海外荒蛮之野。他如轻风带来的细雨，化入惠、儋大地，虽无影无踪，但却湿润了这片土地，使它绿意浓浓，生气勃勃，充满人文精神。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⑬），“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春自往还”（《白鹤峰新居欲成……》其二⑭）。在儋州，他“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纵笔三首》其二⑮），“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其一⑯）。而当地的士子、农夫、道人、和尚、老姬、

儿童更以加倍的情谊报答他——他曾信心十足地自称“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饔吾”（《纵笔三首》其三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⑱）。这些都是他在那个“民夷杂揉，屠沽纷然”（《书上元夜游》⑲）的小社会中的生活实录。这种快乐，这种情趣，从表面上看与普通人得到的并无不同，但在表象之后，他则自有他的廓然境界。

我这样来解释东坡价值观中的“廓然境界”，可能会引起读者的不解：难道这些与常人一样的日常生活，里面还包涵这样的学问吗？这还得由东坡自己来解释。他在致子由书中说：“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与子由弟十首》其三⑳）他此时的生活并非颓然无知，而是和光同尘，却另有境界。他做到了他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哨遍》㉑）更做到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满庭芳》㉒）东坡好佛，但一向只重内在的佛理，而不重外在的形式；他曾说：“范景仁平日不好佛，晚年清慎，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学佛世家，然至死尝不取佛法。余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㉓禅宗的特点本就是信仰与生活的完全统一，不要烦琐的教义与仪式，不必出家，也可成佛；不必苦修苦炼，也可成佛。并且，成佛亦即不成佛，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具超脱的心灵境界，亦算成佛。一句话：东坡此时，同平常人、同日常生活表象上并无二致，只是精神境界不同而已。

屈辱而穷困的贬谪生涯，是足以致命的。但苏轼却以他非凡的毅力与悟性，化痛苦为快乐，变坎坷为情趣，安度了这段生活。最不简单的是，他在这种恶劣的境遇中，仍然笔耕不辍，创作了几百篇化绚丽为平淡的诗文，完成了对《易》、《书》、《论语》三经的研究，它们成为人类千秋万代的宝贵财富。他做到了他在《思无邪斋铭》中最后两句铭语：“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在他的作品里，闪烁着他的浩然之气、超然之度与廓然之思。此后，当他遇赦回到江南不久，他便平静地死去了。临终时，他念着《答径山长老》偈语，其中为我们所熟

悉的两句是：“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 三境界的相互关系与文化渊源

在苏轼一生中，仕宦期约占45年，仕宦期中，有一半时间沉于下僚或飘浮外地，有八、九年间受到重用（但也充满纷扰），还有十四、五年则属于贬逐时期。贬谪时间约占他仕宦期的三分之一。特别晚年之谪，在同时被贬的元祐重臣中，他是被贬得最远的一人，并且是被贬到海外（当时称海南为海外）的唯一一个。他的一生，应说道路坎坷，历尽艰辛。但这种艰辛的实践，却同中国传统文化一道，形成了他的价值观。万卷书与万里路，完成了他价值观中的浩然、超然与廓然三境界的构建。他曾以他的三个境界，为国家命运作了抗争，为平民生存赢得空间，为自己一生取得情趣，为千秋万代留下创作上的辉煌，实现了自己无可比拟的价值。这三个境界，并不互相孤立：浩然境界是超然境界的所待，超然境界是廓然境界的基础，廓然境界是超然境界的深化，而浩然境界又是廓然境界的回归。

浩然之气，按苏轼的说法，“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潮州韩文公庙碑》<sup>④</sup>）文天祥继承了他这一说法，并明确指出，浩然正气就是天地正气在人身上的表现。而这种天地正气在苏轼身上的表现，便是他对社会、对历史的使命感，和实现此一使命的大勇。这种使命感与大勇，自然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但要做到这点，却需超然之度的配合。若苏轼不能站在物外，而眩乱于富贵、贫贱与威武这几股世俗力量之中，就谈不到战胜它们，不能战胜它们，则浩然境界如何实现呢？故超然之度又是应对世俗力量的能力与智慧。这种能力与智慧，不仅使苏轼“有待”而然，并且首先使他取得了过程中的情趣与快乐。可是，苏轼的险恶遭遇，又使他感到光凭超然之度，有时还突不破世网，无法真正破妄归真，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于是他更进一步，以廓然之思来应对。无思无待，彻底否定世间一切；但否定之否定，却又带来肯定一切。但这时已用不到他来有意地追求清静了，他眼前与身受的只是世间的情趣。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行为，他的著作，却又使他回归到浩然境界，“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这就是苏

轼价值观三境界的相互关系。

很难说清东坡价值观中三境界，哪个来自儒，哪个来自道，哪个来自释。而只能说，东坡的价值观的整体来自儒释道三家之学。其中三境界的每一个，都来自这三教的融合。以浩然境界而言，如上所述，显然来自儒家的用世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它也来自老庄：《老子·四五》：“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庄子·德充符》<sup>⑤</sup>：“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这说明这一境界是儒道合一的。“超然境界”则来自道家，亲近自然、逍遥物外都是老庄的特点。可是，东坡的超然之度，并不绝对化，他还是“有待”于世的。甚至可说，超然物外只是过程，“有待”用世才是目的，这当然源自儒学。但目的有时可达，有时却不能达，然而“有待”者却实实在在享受了过程中的快乐。所以超然之度，仍然是儒道合一的。

“廓然境界”则同时来自佛禅与老庄，欲不滑先无脚，欲无病先无身，欲无尘先无镜。同样，欲解脱须先无我，“吾丧我”，不知是我梦蝶还是蝶梦我，这却又是标准的庄子哲学了。东坡在儋耳的生活表现、衣食住行，同当地黎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境界不同。昔日孔子称赞颜回，不是称赞他的学问、能力与仁义，而是称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的态度。子由解释道：“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答黄庭坚书》<sup>⑥</sup>）东坡的岭外生活中，所得正是“颜氏之乐”。这说明廓然之思中，既有禅悦风味，更有儒学情怀。这便证明了在东坡的“廓然境界”中，是释儒并举的。

台湾的国学名家南怀瑾曾说，《庄子·逍遥游》<sup>⑦</sup>寓言中的人与物，乃“借与说明高人隐士们所要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东坡价值观的三境界，是他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其中的“浩然境界”留给后人的形象就是那只“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从他的“超然境界”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姑射之神。而在他的廓然境界中，我们看到是则是一棵“树之于无何





# 苏轼超然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变奏

## ——以密州为中心的考察

彭林泉

**内容提要** 苏轼在知密州期间提出的超然思想具有三性、两矛盾、一和谐，呈现复杂性。随着空间变动，处遇、感受和体验等的差异，这种复杂性经历了变奏，逐步丰富完善，其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由此产生了重大影响，于今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苏轼 超然思想 复杂性 变奏 密州

苏轼在密州（今山东省诸城）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仅两年，但在此期间提出并初步形成的超然思想，为后人所关注和重视，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对苏轼的超然思想的内涵、形成过程、历史影响和意义作了有益的探讨。问题是，对苏轼的超然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变奏，包括其基础是什么，有何意义和影响等，却少有具体、深入的研究。本文以密州为中心，以苏轼知密州前后的两地即杭州、徐州为参照，进行分析，也就是说，通过三地的空间变化和苏轼当时的处境、感受和生命体验的比较研究，详细分析苏轼超然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变奏，也许，这对研究苏轼的超然思想有所裨益。

### 一、苏轼超然思想的复杂性

“一切文化创造都源于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需要，一切学说都是针对社会生活这个既永恒又变动的对象而提出解决矛盾的主张，指引精神超越的途径。”<sup>①</sup>苏轼的超然思想也是如此。熙宁八年（1075），苏轼将北魏时所建城台修复扩建，其弟苏辙为之命名为超然台。这年

冬，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游于物外，无往而不乐的超然思想。结合苏轼的相关看法和主张，笔者认为，苏轼的超然思想就其内涵来说，具有三性、两矛盾、一和谐，呈现出复杂性。

#### （一）“三性”

“三性”是指直面性、野性和超然性。

1. 直面性。直面是一种对自我处境的态度或感受。对自然灾害和由此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对执行“新法”、“新学”中的问题，对民生问题，以及自身生活的困顿，勇于面对，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体现出强烈的直面性。在杭州、密州和徐州任上均有体现，而在密州体现得尤为充分。他在《超然台记》一文中说，“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sup>②</sup>这里叙述了生活的困顿、遇到的自然灾害和由此引发的治安问题，以及身处困境的积极心态，体现了直面性。这与苏轼作为地方官员有关。

2. 野性。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朱靖华先生就在《旷世英才在密州》一文中，在谈到苏轼的思想时，提出了苏轼个性中的野性问题。他引述了苏轼到密州后不久《游庐山，次韵章传道》的两句：“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并作了解释，“他感到在污浊尘世上做官为宦，犹如驾车的马驹一般遭受羁绊，而那



放纵巨壑的大鱼，却可任性游泳，那才是真正的自在和无拘无束”。他认为，“野性”是苏轼本质中难以驯服的生性，到密州提出来，乃表示其“觉醒”，“野性”的意义就是崇尚自然，崇尚自由，要求个性发展，最后通向“超然物外”的旷达处世态度。苏轼提出野性，标志着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次升华。<sup>③</sup>这种洞见有利于我们全面认知苏轼，研究苏轼的超然思想。而王洪教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野性”就其原意说，只是苏轼个性、性格的概括。可以用“野性”来概括诗人一生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形成的美学观念。“野性”作为封建时代反禁锢的个性要求，它是与“仕宦”对立而又与“隐居”有所区别的人生观念。苏轼的野性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即“野性”的萌发期，发展期、形成期、反思期和成熟期，<sup>④</sup>而笔者把野性放在苏轼的超然思想中，作为重要的属性，从而把野性与苏轼的超然思想联结起来，具有新意。因为野性是对现实、官场及其内斗的不满，折射出超然、自在状态。

3. 超然性。超然，指游于物之外，不为物所蔽。它是一种心愿或愿望。苏轼在《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sup>⑤</sup>这揭示了超然思想的内涵。在人生不如意者众的情形下，苏轼“对物我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对物与我的关系论述中，他把自我摆在物之上，使物与我所观所乐不为物所役使，控制无穷之欲，不让私欲支配自己。于是，进入“超然物外”的境界，或者说游于物外。然后，达到自适，无往而不乐。<sup>⑥</sup>在《和潞公超然台次韵》一诗中，超然不仅指台名，也指潞公的诗作，以“洗我蓬之心”一语来夸说，更见出文诗的超然之致。而在《薄薄酒二首》中，表达了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对富贵功名进行了批判，对功名利禄进行了嘲讽，“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以超世之想，表现了苏轼正在寻找新的自我，并在其理想的寄托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sup>⑦</sup>体现和强化了“超然物外”的思想，“城上高楼，真是个超然”。

这三性是相互关联的，构成了一个整体，

缺一不可。

## （二）两矛盾

两矛盾即两对矛盾：一对矛盾是物与我的矛盾，另一对矛盾是他者与自我的矛盾。前一对矛盾便于理解，有论者已经作了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累叙。在他者与自我矛盾中的他者，是指变法者，“新法”、“新学”的倡导者、推动者和督导者，苏轼处于变法者与反对变法者、执行新法者与不满新法、新学之间的尴尬状态。虽然保持了相对独立的自由、思想表达，但两头不讨好。这种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矛盾的情绪，在《超然台记》中虽然没有明言，但苏轼在其中有所透露。关于这一点，我国学者在赏析《超然台记》时有过精辟的解释：

苏轼调任密州太守，虽是主动请求，但却是为了避开政治斗争中心，而采取的无可奈何的办法。因此，在文中曲折地反映出他内心的苦闷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客观地如实地描写了离开交通方便，居住舒适，物质丰盛，山水优美的杭州，来到交通不便，居住简陋，物资匮乏，而无山水游乐的密州，但却以老庄“游于物外”、“燕处超然”的思想作为精神武器，表示自己淡泊自适，无往而不乐，以抹去物质生活降低带来的思想阴影，显现出不为物役的广阔胸襟。而这种对待外物的态度，成为他今后处于严重的逆境时的重要精神武器之一；另一方面，在登台四望时，既盛赞姜尚、齐桓公之伟业丰功，又仰慕卢敖之隐居、叹息韩信功高而不得善终的悲剧，透露出他在激烈的党争中欲远祸全身的思想。<sup>⑧</sup>

在笔者看来，对苏轼而言，在《超然台记》中，物我矛盾是显矛盾，他者与自我的矛盾是潜矛盾。苏轼是在反对王安石变法后，请求外任的。苏轼通判杭州，本是为了避开朝廷的斗争而自请外任的。他原想在外地等待政局有作为时，再回到朝廷。现在三年过去了，按理应该调动工作，但朝中的政治斗争更加激烈。在韩绛、吕惠卿主持朝政下，继续大力推动新法，对欲动摇新法或起用旧党人员的举措、建议，均坚决加以打击。与此同时，新党内部也发生了一些斗争。在这新情况下，回到朝廷既不可

以,也不可能。为了远离斗争的漩涡,等待时机,才自动请求调往密州。⑨苏轼在《超然台记》和《密州谢上表》中,都有反对“新法”、“新学”之意。对《超然台记》一文,有评论道:朋九万《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轼又作《超然台记》云:“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意言连年蝗虫、盗贼、狱讼之多,以非讽朝廷政事阙失,并新法不便所致。及云“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以非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⑩苏轼在《密州谢上表》中也表现了对新法改变考试科目的不满。在《超然台记》,苏轼希望自我排遣政治失意后的精神苦闷,和既不能摆脱官场,又要寻求超然之乐的内心矛盾,以寻求心灵的解脱。

### (三) 一和谐

一和谐即一种和谐。在“三性”和两对矛盾之上,经过转换视角和心理调适,在物与自我之间,在自我与当地人民之间,初步达到和实现了和谐,诗意地栖居。人们只看到或认识到物我矛盾,而没有认识到在这种矛盾和他者与自我矛盾之上,苏轼达到了新知,进入新的境界,摒弃丑恶,消除矛盾,形成了和谐,体现在苏轼这个诗人、地方官员身上。诚如张志烈先生在谈到苏轼文化精神的中国意义时所说:

他认识到的东西,不放弃,不妥协,对外又有巨大的适应性,乐观顽强,随遇而安,面对任何打击、任何矛盾,任何困难,都能以其特有的人生智慧,转换视角,调整认知,幽默化解,总能在现有环境条件下找到可以维持身心内稳态的有利因素契合起来,从而转化为精神解脱的良药,始终保持自己诗意栖居的乐观态度。比如有名的《超然台记》,就是写他超然物外、所谓斯乖,无往不乐的生活体验。所谓超然,即游于物之外,不为物所蔽。即从庄子“逍遥”、“齐物”的观念,主动转换视角,从而摆脱现实环境造成的苦闷,收无往而不乐之效。这是苏轼一生处逆境时进行心理自助、调适情绪、稳定精神的基本途径。⑪

关注和重视苏轼超然思想的复杂性,可以更好地理解苏轼的超然思想的丰富内涵,把握其精神实质。

## 二、苏轼超然思想复杂性的变奏

苏轼超然思想的复杂性,经过了一个变奏的过程,绝不是自然产生的,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下,有不同的表现,体现不同的属性。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官场行事时,欲摆脱羁绊,崇尚自由,贴近自然,解决进取与归隐的冲突,体现出野性;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不回避、不推诿,迎难而上,积极行动,体现出直面性;在物我矛盾和他者与自我矛盾时,进行调适,追求和谐快乐,体现出超然性。这里以密州为中心,以苏轼先后任职的杭州、密州、徐州三地的空间变动和处境感受进行分析。

### (一) 任职情况

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三月接到诏命,十二月三日到达密州,担任密州知州,地方最高长官,也就是汉代所称的太守。品衔高于通判。这是苏轼首次担任地方的最高长官。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离任,任职不到两年。在此之前,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任职时间约为三年,即熙宁四年(1071)六月接到诏命,十一月廿八日到任,熙宁七年(1074)九月接到调任后离杭。通判本是为防止地方长官(知州)独揽一方大权而设立的官位,它的品衔虽较知州低,但以联合签署公文的形式,对知州起到监督作用,所以也称为“监州”。而在密州之后,苏轼在徐州任知州,继续担任地方最高长官。任职为两年,即熙宁十年(1077)春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

### (二) 行政事务情况

在密州,苏轼面临蝗灾。抵达密州住所,便开始调查蝗虫受灾情况,请教当地父老,问计民间。上书,如《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向上寻求政策支持。同时,积极组织救灾、减赋、防盗,甚至提出法外治盗的看法。还亲自到常山求雨,用心有效地履行地方长官的职责。经过努力,基本控制住了灾情,减少了经济损失。尽管如此,他也深深地自责,未能救民于苦难,“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在此期间,他延续了在杭州的抗灾作法。在杭州,虽然苏轼离开了京师的“变法”风潮,却无力

摆脱“新法”及其“提要”者的压力。作为通判，苏轼被迫审讯发落无数营销“私盐”的罪犯等，视察湖州堤岸利害。他本着良知良心和仁爱之情，了解灾情，治理蝗灾、赈济百姓，积极参与疏浚西湖六井，解决饮用水问题。在徐州，上任不久的苏轼就碰到黄河决堤，他率领军民，抢修堤坝，加固城墙，抗洪救灾，因为成绩显著而受到嘉奖。还修建了黄楼。当时，徐州人并不知道当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矿，冬天取暖，依赖柴火。每到冬天，木柴紧张，柴价暴涨，有时甚至一床棉被换不来半捆湿柴。苏轼了解这一情况后，派人四处寻找煤矿，很快在徐州西南白土镇附近找到了煤矿。他派人试着开采，结果发现这里的煤矿不但储量丰富，而且品质优良。苏轼还用这种优质煤炭炼铁，相得益彰。用炼出的精铁打造兵器，坚利异常。从那以后，徐州就一直以盛产煤和铁著称。<sup>③</sup>这些务实为民的作风和成效受到称赞。

### （三）对“新法”和“新学”的态度

苏轼一生坎坷，与反对王安石变法有关。在杭州任职期间，苏轼继续反对王安石变法。从实际出发，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新法的弊端，希望有补于国，在职权范围内“因法以便法”，同时以诗、词、文，讽刺新法。熙宁五年（1072），在《戏子由》一诗中的“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sup>④</sup>和《赠孙莘老七绝》，以及后作的《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诗词反映民间疾苦，托讽新法、“新学”。并抗拒盐法。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苏轼在密州时期，继续反对盐法、手实法和食盐官榷。熙宁八年（1075）十月，手实法被废除。不过，此时他对新法的态度有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仍坚持固有的反变法立场，声称“民非独病旱蝗也”，对正在实行的方田均税法、手实法，乃至即将在密州推广的官盐专卖法等逐条予以批驳，提出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新法，如免役法，他不再全盘否定，而是试探性地提出一些改良的意见，与执政者商榷，并在实践中，对于新法中他认为有害无益的，便拒不执行；认为尚可接受的，便参量短长，因法以便民。<sup>⑤</sup>在徐州，“此时的苏轼，虽不能说已释意于新旧党争，但新法实行的时日已久，成了定局，加之神宗亲政，不便措词反对，故其

心态向超脱的方面发展为多，与熙宁中出京的时候应有不同。”<sup>⑥</sup>这个演变的态度值得注意。

### （四）物质生活情况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叙述了物质生活的匮乏，在《后杞菊赋》中再次作了描述和补充，“而余（苏轼）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sup>⑦</sup>甚至以杞为粮，以菊为糗。饮食的粗陋和单调，与苏轼在杭州期间丰盛的物质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是在徐州，物质生活也远好于密州，因为“和密州相比，徐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交通便利，物产丰饶，不失为繁华热闹的都市”。这种生活场景特别是物质生活的匮乏所带来的暂时不适和困扰，触动苏轼的精神活动。

### （五）处境感受与人生态度

于是，在密州的苏轼感到“寂寞山城人老也”，想予以摆脱。和杭州相比，密州的生活不仅艰苦了许多，也寂寞了许多。在杭州任职期间，苏轼情不自禁地陶醉在湖光山水之中，赏牡丹，观钱塘江潮，参加层出不穷的游宴活动，留下无数浪漫的故事，经常漫步名山古刹，与许多高僧结为至交，寻得心灵的安憩与慰藉。<sup>⑧</sup>虽然苏轼在杭州生活和工作不满三年，但心情是愉悦的，难忘的，尽管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中充满了苍凉愁苦的意绪，流露出苏轼对仕途及人生命运的深思。而在密州的情形却迥然不同，处于现实人生困境，如仕途上的进退失据、亲人的长相别离以及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的永恒悲感，物质生活的匮乏，民生的艰难，自然灾害的应对，以及对死去的妻子的怀念等，使苏轼感到精神苦闷和矛盾。这从熙宁八年（1075）十月苏轼作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可以看出，他力求超越。而重读《庄子》，使苏轼心中时时涌起豁然开朗、如获至宝的快慰，他开始以全新的心态重新面对并接纳密州的生活，写出了豪放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抒发了效力边疆、以身许国的豪迈激情。也就是说，当时所处的人生困境引发了苏轼精神上的追求，改变了他人生态度，促使他在知密州时提出超然思想。

而在徐州，他的业余生活、精神生活又丰富起来，可以说有声有色，逍遥写意，更重要的是在熙宁十年（1077），苏轼在《宝绘堂记》中进一步阐述了超然物外不为物役的观念：“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在文中列举刘备等人寓意于物而流誉后世之后，又进一步申明：“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如书与画。”而为物所役沉溺于书画的钟繇、王僧虔、恒玄、王涯诸人因其沉溺而害其国凶其身。这就是沉溺外物的灾祸。朋友王巩酷嗜书画，为了友人能够“全其乐而远其病”，苏轼告诉王巩：“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sup>⑩</sup>苏轼将自己由少至壮于书画的态度的转变告诉王巩，意在告诫他。诚如有论者所说，《宝绘堂记》，论古之嗜书画有害其国、凶其身者，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譬如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sup>⑪</sup>

可见，随着空间变动，处遇、感受和体验等的差异，苏轼超然思想的复杂性经历了变奏，逐步丰富完善。需要指出的是，地域空间的变动，苏轼的直面性并无减弱，他始终保持着积极用事的精神和强烈的直面性，面对和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一个地方官员的担当和责任，这反映出苏轼作为“能吏”的一面。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苏轼任地方官员的二十多年中，均有些作为，被当地的人民所喜爱。而野性有所强化，超然性更是进一步完善丰富，上了一个新的层面。他以生命体验，安顿自己的生活，保持良好的心态。这在苏轼《和蒋夔寄茶》、《蝶恋花》、《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薄薄酒二首》等诗文中均有表达，可以说，这是其超然思想产生的直接动因和演变原因。有论者认为，苏轼超然思想的萌发与思考，与

苏轼密州时期力图解决当下的困境心态密切相关；与其长期以来接受、融会、思考社会人生密切相关；而亲友之间的切磋琢磨对于其日后超然思想的深化和丰富起到了促进作用。<sup>⑫</sup>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苏轼的超然思想是其长期对于人生思想探求的结果。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流放到黄州之后，才真正明白、懂得超然，一直到惠州、儋州，从而最后形成了超然思想。这从“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叹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感悟和《行香子》表达出的超然、欲隐退的心态可以看出。这并不否定苏轼对工作、生活及其困境的短时间焦虑。

### 三、苏轼超然思想复杂性及其变奏的人本主义基础

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命名为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并叙》赞之，为苏轼欣然接受，并引发其《超然台记》的横空出世。这说明老子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事实上，佛老思想对苏轼的困苦起了缓解作用。

在笔者看来，苏轼超然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变奏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近年来，多次论及人本主义的郑永年认为，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人，是人本身的价值。虽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对人的理解有不同，但互相尊重，尊重彼此的文化、宗教、信仰，应该成为共识。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这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人本主义是中国各民族唯一能够共享的。即使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归根到底还是人本。应多讲共享价值。“共享”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和谐”只是一种追求的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还是需要人本。和谐不是一个价值观，和谐是个结果。人本主义的政策可以最终达到和谐。<sup>⑬</sup>这对人本主义的含义、为什么要讲人本主义的共享价值，人本主义与和谐的关系作了阐述，值得重视。

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人的本能在于趋利避害。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

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在苏轼看来，“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sup>②</sup>苏轼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名地方官员。作为一名地方官员，守土有责，需要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的价值，同时基于人本主义，对百姓尤其是灾民充满了深沉情感。

苏轼在外任期间，在前面所述的杭州、密州和徐州三地，“惟有悯农心尚在”，对人民的苦难充满了同情，而且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如苏轼在任密州知州期间，一如既往地投入到行政事务工作。正逢严重蝗灾，百姓生活艰难，但密州的上级长官为了取悦朝廷，竟然说虽有蝗虫但未成灾，甚至说蝗虫还会“为民除草”。苏轼一面上书，陈说灾情，请求朝廷减负课税，一面组织农民积极捕蝗，采用火烧、土埋等办法消灭蝗虫。灾害之年，当地一些人迫于无奈，常把并新生婴儿遗弃城外，苏轼见此惨状，心急如焚，亲自沿城捡回弃婴。他清查官仓，发现尚有几百石的救灾粮，就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于收养弃婴，还规定，凡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可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终于熬过了灾年活了过来。<sup>③</sup>这体现了“恤人情”。所以，苏轼很有感触地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超然台记》），与密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苏轼任期已满，准备离开密州时，百姓闻讯，纷纷前来送行，连孩子也在问苏轼，这一去何时才会再来？父老乡亲还自发地在城西的园囿中供奉起苏轼的像，逢年过节，就来拜谒。九年以后，苏轼前往登州，路经密州，乡亲们还扶老携幼前来迎接他们先前的父母官。<sup>④</sup>正是他的人本主义价值观，以及他的正义感和成就感，使他度过了人生的诸多不幸甚至苦难。

#### 四、苏轼超然思想复杂性及其变奏的意义和影响

苏轼超然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变奏有多重意义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苏轼而言，超然思想是苏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苏轼度过人生逆境和不幸的精神支柱之一。苏轼在知密州期间，明确提出了超然思想，这集中体现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但也不限于此，在其他诗、词、文中也有体现，甚至有所深化。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苏轼的思想，离不开对苏轼超然思想的研究，而要研究苏轼的超然思想，密州时期是需要论者特别关注的地方。李泽厚先生认为，苏轼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在王洪教授看来，其实，这正是我们概括的“野性”，或者说是其“野性”的中坚。笔者认为，苏轼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就其一生综合来看，始终保持坚毅、积极用事的精神，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或者说苏轼从来就没有真正出世过，即使在受到严重挫折时也是这样。这与他所受的教育、志向、性格等有关。虽然苏轼儒释道汇通，但儒家思想是底色。所以，他在困境、处遇不佳、忧患中能够超越，于是才有人发出了“超然有几人”的感叹。

其次，对当时特殊群体的影响。苏轼在其弟苏辙命名为超然台和《超然台赋》的基础上引发思考，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超然思想，诚如有人评论所说：“若无子由明兄意，神州那得超然台。优游物外启心智，诸城至今寻旧台。”而当时的或敬重，或赞同，或质疑甚至批评，在促进苏轼超然思想的丰富完善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苏轼写有《超然台记》，苏辙、文同、鲜于侁、李清臣、张耒都写了《超然台赋》，除本赋以外，其他四赋皆存。苏轼分别为苏辙、文同和李清臣的《超然台赋》写了跋文。这不仅围绕超然台形成了文学创作的热点，也对当时的这一特殊人群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其次，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影 响。苏轼在密州时期的作品和离开密州以后回忆密州的作

品,包括诗、词、文,共230篇,这是苏轼留给密州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sup>②③</sup>苏轼的这些作品以及体现对密州人民的一片深情厚谊,特别是超然思想,与密州儒商文化相结合,对促进当地历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当地给予的评价是:“苏轼在密州(诸城)形成的豪放词风、超然思想,不仅是苏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诸城地方文化的重要宝贵财富,对诸城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是中肯的。苏轼修缮的超然台后毁于战火,成为遗址,但超然台在苏轼创造自我形象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说昔日苏轼借密州、超然台,重视超然思想,在无形中为密州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的话,那么,今日密州则借苏轼、借超然思想、借儒商文化,实现共存互助。

第四,对后人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期,面临许多问题和矛盾,包括物我矛盾、他者与自我矛盾,当然,这里的‘他者’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指“新法者”,而是指与自我相对应的人。如何应付这些挑战?在直面问题,寻找有效解决方法方面,苏轼给我们以启迪。这自然离不开苏轼的超然思想及其复杂性的变奏。2014年7月11日15时,在“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上,凤凰网总裁李亚指出,文化与思想是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他说,“35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也日渐感受到价值失重、道德失范、社会失序的挑战。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主导了人们的价值观,急功近利与实用主义泛滥,从儿童、大学生、弱势阶层,到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浮躁、贪欲、甚至暴戾之气,侵蚀着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一个诚信与信仰缺失的时代,个体道德如何建立?文明演进如何可能?如何能让社会拨开雾霾,重见精神之光?……续接我们的文化之根,张扬我们的思想之魂,为我们躁动的心灵找回一方精神家园,为我们剧变的世界留住一片澄净天空。”<sup>②④</sup>这里的“文化与思想是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中的文化与思想应包括苏轼的超然思想及其传承。而继续重视、强化、宣讲和落实人本主义的共享价值是重要途径。向世人提供精神公共产品,可以借鉴苏轼的超然思想。

## 注释

① 张志烈著《张志烈文存》,香港新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页《诗性智慧的和弦》。

②③④⑤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1~352、351、4、356、531页。

⑥ 饶学刚著《苏东坡在黄州》,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页孔凡礼《高品位的地方文化史籍——〈苏轼在密州〉出版》。

⑦ 木斋著《苏东坡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3页。

⑧ 饶学刚著《苏东坡在黄州》,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邱俊鹏《简论苏轼知密州时期的思想》。

⑨⑩⑪ 李增坡主编《苏轼密州作品赏析》,齐鲁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260、299页。

⑫⑬ 曾枣庄主编《苏文汇释》,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217页。

⑭ 《苏轼研究》2013年第4期,钟永新《东坡文化精神的中国意义——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张志烈会长》。

⑮⑯⑰ 童强著《苏轼》,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61、56~57、57页。

⑱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4页。

⑲⑳ 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60~70页。

㉑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㉒ 《苏轼研究》2014年第2期,庆振轩《东坡超然思想探论之一》。

㉓ 《中国改革三步走》,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207页郑永年《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

㉔ 李增坡主编《苏轼密州作品赏析》,齐鲁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㉕ 参见 <http://culture.ifeng.com/a/20140712/41126304-0.shtml>,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彭林泉,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专委、高级检察官)

# 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 ——苏东坡诗酒人生的多元境界

王许林

**内容提要** 从饮酒与自然风景融合的妙境、饮酒与亲情友情融合的雅境、饮酒与雄心抱负融合的豪境、饮酒与世道沧桑融合的哀境、饮酒与哲理意趣融合的悟境五个角度透视了东坡诗酒人生的多元境界和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快乐、烦恼、感喟、忧惧、省悟。

**关键词** 苏轼 诗酒词赋 多元境界

酒，一种用粮食或水果发酵酿造而成，富有独特和浓烈醇香味的液体，自从在神州大地问世以来，便深得国人的青睐，中国文学更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早在《诗经》时代，民间歌手就高唱：“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三国的曹孟德，大叹：“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短歌行》）魏晋“竹林七贤”则人人嗜酒，刘伶还写有《酒德颂》。而“偶有美酒，无夕不饮”的陶渊明，“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太白，“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杜子美，更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何尝不是如此？他自称酒量不大，饮少辄醉，但“不可一日无此君”，甚至“一旦无酒则病”。（《饮酒说》）少年时就写了《竹叶酒》：“惟馀竹叶在，留此千古情。”后为官杭州，他“饮湖上”；在密州，他“欢饮达旦”；在黄州，他“一樽还酹江月”；在扬州，更是连写二十首《和陶饮酒》。直到在常州临终前，还书写《跋桂酒颂》以赠好友。东坡饮用的酒名五花八门：竹叶酒、黄柑酒、黄封酒、屠苏酒、茅柴酒、冰堂酒、羔儿酒……多达十七八种。他还别出心裁，自酿美酒，如在定州用松脂酿造“松醪酒”，在惠州用米麦加蜂蜜而成“真一酒”等。苏东坡一生与诗酒相伴——不论志得意满、官运亨通之时，

还是饱受挫折、穷困潦倒之时，所谓“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和陶饮酒》其三）他对酒有个绝妙比喻：“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洞庭春色》）酒既能“钓诗”，又能“扫愁”，也就成了东坡终生不离不弃的精神至交和灵魂伴侣，给予他生活的乐趣、力量、激情，给予他心灵的抚慰、体贴、安宁，更给予他生命的感悟和创作的灵感。那些酒酣耳热、即兴挥毫的诗文词赋，透视了东坡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快乐、烦恼、感喟、忧惧、省悟，因此，他的诗酒人生也呈现出丰富多元、耐人寻味的境界。

### 一、“春光有佳句，我醉堕渺莽”——饮酒与自然风景融合的妙境

苏东坡天性开朗，多才多艺，热爱生活和自然，对山水风景具有精细而独到的审美眼光，尤其喜欢边饮酒边赏景，把饮酒与写景状物融为一体，让醇酒浸润美景，让美景烘托酒意，构造一个酒香景美、妙不可言的境界。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当属游宴于杭州西湖的山光水色中，即兴而作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仅“水光潋滟”、“山色空濛”，西湖夜色也令东坡流连忘返：

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  
篮舆湖上归，春风洒面凉。  
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苍苍。  
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

尚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

——《湖上夜归》

对苏诗颇为苛求的清人纪昀，也由衷赞曰：“句句摹神，真而不俚。‘清吟’二句神来。”（《苏文忠公诗集》卷九）东坡钟情岂止山水，一花一木亦可尽得风流。写于徐州的《月夜与客饮杏花下》，就是天纵神笔、清幽超远的妙作：

杏花飞帘散馥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开篇“杏花飞帘”、“明月入户”呼应题意，点出时空环境；“踏花影”、“涵青蘋”，尤为空灵、婉媚，惹人情思。中间化用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月下独酌》），又一改其孤寂、凄清的意趣，把主客饮酒与赏花、观月融于一体，变换笔法，错落穿插，别开一个人与物游、如诗如画的境界。醇酒置于花间，酒兴更显热烈；趁着酒兴赏花，花香分外浓郁。加之月色皎洁，箫声悠扬，令人仿佛置身于清虚、明净的世外桃源。可惜“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总归要月落杯空，夜将尽矣，惋惜之余留下一份悠长的韵味：行乐及时、尽兴而欢。这种景美酒香、超脱飘逸的作品不胜枚举：“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吉祥寺赏牡丹》）“提壶劝酒意虽重，杜鹃催归声更速。”（《携妓乐游张山人园》）“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送春》）饮酒乎？赏景乎？已经难解难分了，一言以蔽之：“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二）

东坡以词表现酒酣景美、天人合一的妙境，另有一番情趣和风韵。试读《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

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春夜料峭，醉不得归，连人带马露宿野外，本是一件狼狈、尴尬之事，但东坡笔下，却变得那么新奇、清秀、空灵，给人无限遐想和情思。醉眼惺忪中，春溪荡漾的细浪，天空琼玉

的月色，配以香气四溢的花草，绿杨垂拂的小桥，影影绰绰，若隐若现，诚如词序所说：“及觉，已晓，乱山葱茏，不谓尘世也。”结句再用“杜宇一声”的听觉形象，烘托、强化前面的视觉形象，使这幅人间仙境更显得缥缈而立体，灵动而亲切，可以一洗尘虑，一涤心胸！当然，东坡对农桑劳作、人间烟火亦情有所系，有时会把自然景色和乡野民俗风情结合起来，显示其“跌宕昭彰，独超众类”的又一特色。例如《浣溪沙》：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

相排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

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

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人景互动，活灵活现，古朴雅致，好一派乡土气息、令人神往的田园风俗画！

## 二、“但喜宾客来，置酒花满堂”——饮酒与亲情友情融合的雅境

苏东坡为人平易随和，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所以交游广泛，门生故友遍天下，有公卿贵胄、文士墨客，也有市井小民、乡村野老，乃至黎族土著，皆能真诚相待，把酒成欢。早年在京城为官，就于城东的西园广邀文友，饮酒赋诗，泼墨作画，时有“西园雅集”的美谈。后到徐州任太守，组织军民成功抗击洪水后，曾修建一座纪念性的黄楼。次年重阳节，东坡在黄楼大宴宾客，饮酒奏乐，气氛热烈，史称“黄楼乐会”。弟苏辙和门生秦观同作《黄楼赋》记其盛事，东坡也乘兴写了《九日黄楼作》：“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一杯相属君勿辞，此景何殊泛清雪。”不过，这些官场性的诗酒盛事，虽说热闹非常，却难免附庸、应酬之嫌，谈不上精妙动人的雅趣。而日常生活中的亲人相逢、友朋聚会，觥筹交错中才真正显示东坡的真兴致、真情愫、真个性：

东邻酒初熟，西舍彘亦肥。

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

——《别岁》



但喜宾客来，置酒花满堂。  
我欲东南去，再观双桧苍。  
——《种德亭》

与君几合散，得酒忘醇醪。  
君谈似落屑，我饮如奕棋。  
——《次韵钱穆父会饮》

使君置酒罢，箫鼓转松陵。  
狂生来索酒，一举辄数升。  
——《上元夜》

信笔写来，不假雕饰，而兄弟间的情深意重、关怀体贴，朋友间的坦坦荡荡、无拘无束，以及酒桌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谈笑风生、一饮而尽的文人气派和风采，扑面而来，感人至深。尤其是患难中的友人相助和温馨聚饮，更令东坡刻骨铭心，例如《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之一：

暮雪纷纷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黄沙。  
旧游似梦徒能说，逐客如僧岂有家。  
冷砚欲书先自冻，孤灯何事独生花。  
使君夜半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哗。

时逢除夜，大雪纷飞，逐客独居，孤灯相对，内心的凄凉、清冷不言而喻。然而，尾联笔锋一转，境界大变，调子顿时欢快起来。好朋友半夜冒雪登门，雪中送酒岂不胜似雪中送炭？酒逢知己，开怀对酌，酒香弥漫屋中，妻子儿女一片欢呼雀跃。人生能有几回醉？雪夜的清冷在欢声笑语中一扫而光，逐客的凄凉也在友情温暖中烟消云散。前哀后喜，巧用反衬，对比强烈，把雪夜之惊喜、情谊之真诚、饮酒之快乐，表现得淋漓尽致，诚如赵翼所云：“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瓯北诗话》卷五）

在苏东坡的诗酒交游中，有两件颇带传奇色彩的事情，值得大书一笔：一是与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的客人，亦能相见如故，兴味十足，一醉方休。且看《大雪独留尉氏……》：

古驿无人雪满庭，有客冒雪来自北。  
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  
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  
我酌徐徐不满觥，看客倒尽不留涩。  
千门昼闭行路绝，相与笑语不知夕。  
醉中不复问姓名，上马忽去横短策。

诗题云：“大雪独留尉氏，有客入驿，呼与饮，至醉，诘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谁。”大雪封门，滞留驿站，是客皆友，兴至即饮，没有隔阂，无须客套，“相逢一醉是前缘”，问什么姓甚名谁？这种名士的风范、侠客的气度，坦荡、洒脱，大俗中有大雅，实在古今罕见！二是以诚待人，化“敌”为友，把酒成欢。东坡晚年流放海南儋州，负责监管他的昌化军使张中，却为东坡的人品、才华所感染，竟把“监管”抛弃一边，彼此成为推心置腹的酒友，堪称奇闻和美谈。且看《和陶与殷晋安别》：

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  
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  
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  
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

一个有“奇士”之风的军官，一个豁达开朗的贬吏，因缘聚合，相知相惜，完全无视官场的禁忌和恐惧，白天饮酒，晚上下棋，通宵达旦，其乐融融！这“卯酒”和“夜棋”中包含了多少人间正义、人间真情、人间温暖、人间雅趣，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享受？正是凭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开朗个性，困厄中的东坡赢得了海南各方人士的尊重和帮助：“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膾吾。”（《纵笔三首》其三）所以，他没有如朝廷权奸指望那样，在海岛的瘴风痼雨中自生自灭，颓然倒下，而是优游从容、自得其乐：“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天门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并舍闻。”（《庚辰岁正月十二日……》）

### 三、“酒酣胸胆尚开张”——饮酒与雄心抱负融合的豪境

苏东坡才华盖世，二十二岁即中进士，随后又向朝廷进献策略、策别、策断三部分共二十五篇的《进策》，大声疾呼“荡涤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力主富民强国的政治革新，宋仁宗览之叹为“宰相之才”。他也雄心勃勃地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孤馆灯青））这种雄心和抱负，在酒酣耳热之际更显得亢奋、激烈：“醉里便成敲雪舞，醒时与作啸风辞。”（《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即使因反对王安石“虐民以富”的变

法，受到排斥打击，外放苦寒之地的密州，似乎也没有损减。东坡在密州就“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下豪放名篇《江城子·密州出猎》。上阕以“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会猎习武场景，铺垫下阕关心边防、建功立业的爱国热忱：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狼。

酒意浓，心气高，胆更壮，鬓边几缕白发，何妨为国效力？接着用汉文帝命冯唐持节赦免云中太守魏尚的典故，倾吐心中的抱负：虽为一介书生，却有一腔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赤诚，热切渴望“射天狼”——一举击溃西北辽和西夏的侵扰，确保大宋边陲的安宁！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酣歌中“会挽雕弓如满月”的东坡，是何等豪气冲天、狂放激昂！《和陶饮酒二十首》之末章，亦表现了同样的情怀和感慨：

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  
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  
寂寞千载后，阳公嗣前尘。  
醉卧客怀中，言笑徒多勤。  
我时阅旧史，独与三人亲。

三人者，饮酒谈笑间而国治的曹参，贵清静而民自安的盖公，豪饮而刚正的谏议大夫阳城。东坡咏史乎？夫子自道也！虽然带着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苍凉，但一股追慕先贤的雄心和豪气，充溢于字里行间，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和陶，气象只是坡诗，如云‘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渊明绝不能办此。”（《跋东坡和陶饮酒诗后》）确实，东坡钦仰陶公，毕竟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终其一生未能忘怀国事民生。他任职徐州，身先士卒，抗洪救灾，与民同乐，毫无官气，还写了歌谣式的《登云龙山》：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  
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  
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诗仅七句，非律非古，纪昀评说：“偶成别调，不可无一，不可再二”。（《苏文忠公诗集》）须知，此处的“使君狂”与密州的“少年狂”

一脉相承，抒写心志，讲什么体例格式？东坡狂放而洒脱的本色跃然纸上！此后，遭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虽然心头留下深痛巨哀，但一杯下肚，笔墨挥洒间仍然英气逼人，且看《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在友人家开怀痛饮，乘醉走笔，先画竹石于壁又题诗，且造语奇特，惊世骇俗，深得前人赞誉：“画从醉出，诗特为醉笔洗剔精神。读起四句森然动魄也，句句巉绝，在集中另辟一格。”（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当然，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和打击，终于使东坡明白“致君尧舜”、“兼济天下”政治理想已经破灭，只能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力所能及地“惠于下民”，饮酒取乐中亦关注民众的生存疾苦：“江城白酒三杯酹，野老苍颜一笑温。”（《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江城的白酒固然醇美可口，而野老乡民的安居乐业，更令他温暖舒心。这里，酒中的雄心和豪气，已化作一片亲民的至诚柔情了。晚年在海南，东坡常常访贫问苦、体察民意：“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被酒独行……，二首》其一）“诸黎”就是儋州的黎族土著朋友。正是与他们的串门、饮酒、聊天中，东坡获悉当地远离中原，文化落后，缺医少药，巫风盛行。于是，与小儿苏过自编教材，兴办学校，开启民智；上山采药配方，治病救人。《琼台纪录》说得好：“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东坡）启之。”这是海南人民的永远怀念，在东坡的诗酒人生中，或许是又一道风景和光彩。

#### 四、“醉饱高眠真事业”——饮酒与世道沧桑融合的哀境

苏东坡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从少年得志贵为翰林学士的朝廷大员，到一路贬黜沦为天涯海角的“罪臣”，其间官场之险恶、世道之炎凉、人情之冷暖，他有着切肤之痛：“世道如奕棋，变化不容覆。”（《和李太白》）东坡既以诗酒声名远播，又以诗酒惨遭祸变，一些玩笑的、牢骚的、自嘲的饮酒诗句，如“绿蚁（酒名）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次韵刘贡父

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我今号为二千石，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莫笑银杯小答乔太博》)、“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赠孙莘老七绝》其一)等等，都被奸佞小人上纲上线，诬为“讥讽新法”、“诽谤朝廷”，录为“乌台诗案”的罪证。东坡对此啼笑皆非，曾愤而想戒酒，但“一旦断酒，酒病皆作，谓酒不可断也”。(《饮酒说》)——俗世的烦恼，胸中的愤懑、心头的苦楚，无酒又何处发泄呢？因此，东坡终生没有戒酒，他要慢慢咀嚼、体会“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的滋味，把人生的失意、无奈、惆怅、迷茫，悄然渗透于饮酒诗词中。早期尚且是淡淡的、委婉的流露，例如：

酒罢月随人，泪湿花如雾。

后夜逐君还，梦绕湖边路。

——《古别离送苏伯固》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望江南》(春未老)

饮酒、赏景之余，那乡国的愁思、功业难遂的忧伤，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乌台诗案”及随后的贬谪黄州，是东坡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初到黄州，地僻人疏，悲愤、不平、孤寂、恐惧，日夜折磨他的灵魂，难以抑止，忍无可忍，终于凝结成一篇有“冠古绝今”之誉的长篇《寓居定惠院之东……》。兹录首尾：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据诗题：“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这株国色天香、珍贵无比而混杂于乱花丛中、无人赏识的海棠，不正是东坡天涯流落的自我形象写照？面对周围的“竹篱”、“尘俗”，他只能把酒相对，孤芳互赏：“携客置酒，五醉其下”，倾吐胸中的哀怨和不平。然而，东坡毕竟是旷达之士，深知不能久陷于悲苦心境而不自拔，应该把“幽独”化作一种力量，直面人生的挫折和厄运。也是在黄州，东坡把酒视为消解愁闷、宽慰心灵的良剂：“少年多病怯杯觞，老去方知此味长。万

斛羁愁都似雪，一壶春酒若为汤。”(《次韵乐著作送酒》)既然面临的生存状态无法改变，何不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于是，有了脍炙人口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表面上笔调轻松，背后却是仕途的跌宕起伏，世道的沧桑变化，以及人生的“风雨萧瑟”。这寻春途中不期而遇的风雨，不正是“乌台诗案”那场政治风雨在内心的投影和体验？现在酒醒了，心明了，不妨在崎岖的人生之旅中且行且珍重，一蓑烟雨，顺其自然。“莫听”、“谁怕”、“任平生”等关键词语，就是提醒自己，也告诫世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劫难，不必惊慌，无须浮躁，走自己的路——不怨不悔，不忧不惧！正是带着这种心态，东坡才能把人生的屈辱和苦难化作酒中乐、泪中笑，安然度过海南三年凄风苦雨的暮年岁月。且读《纵笔三首》之一：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前面的“寂寂”、“病翁”、“白须”、“霜风”都是写实，其衰弱多病的晚境令人心碎。后面却借酒轻松、幽默一把，冲淡凄苦悲凉之气。其实，彼时小儿苏过已二十多岁，岂能幼稚到把饮酒的脸红误以为“朱颜”——容光焕发、返老还童？这或许是儿子善意的谎言，是对老父的宽慰，更是东坡借酒作乐、化悲为喜、笑中含泪的手法。殊不知“一笑”之中，隐含了多少人生的感喟、人生的苦衷、人生的豁达！

## 五、“醉里有独觉，梦中无杂言”——饮酒与哲理意趣融合的悟境

苏东坡的人生观，是以儒家为基石，又兼收并蓄佛、道二家，对儒家之重人事、佛家之重人心、道家之重自然的“三昧”，都能融会贯通、透彻把握，形成多元一体、共生互补的价值体系。早年“奋厉有当世志”，追求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中年经历一系列挫折

和打击后，洞悉了官场的风云变幻和世道的炎凉冷暖，精神上便较多倾向佛、道的清静、无为、超然。晚年流放岭南惠州和海南儋州，尝尽人世的酸甜苦辣，终于大彻大悟，“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酒隐赋》），自觉寻求灵魂的救赎和生命的超越。他说：“忘口腹之为累，似不杀而成仁。”（《菜羹赋》）所谓“口腹之累”就是“物欲之累”——人的功名、利禄、权势、奢华、享乐等等物质欲望。晚年的东坡眼中，世人拼命追逐的种种物欲，并非生命的本身需要，相反是生命的沉重负担，漠视和摒弃它们，回归生命的单纯和自由本性，心灵就轻松自在了，视野就空阔远大了，命运也由自我主宰了。这样，何须儒家所讲“杀身成仁”，不杀身亦可为志士仁人，实现个体生命的涅槃。苏东坡这种人生思考和生命感悟的轨迹，在其饮酒诗词中亦可窥见一斑。早如密州时“欢饮达旦，大醉”中作的《水调歌头·中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黄州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些显然不是一般性的望月思亲或对月怀古，而是蕴含了对宇宙和人生的深沉哲理思索。酒酣意畅中的东坡，仿佛飘然若仙，登琼宇，升云端，吞吐天地，感喟古今，似乎在苦苦探求和追寻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临江仙·夜归临皋》则直接引入老庄的哲学观念，进行清晰而具体的人生思考与反省：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平生。

上阕以风趣、逼真的笔墨，着意渲染夜饮的醉态，为下阕酒醒后独立江边、静思冥想作铺垫。“长恨此身”句出自《庄子·知北游》“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忘却营营”句出自《庄子·庚桑楚》：“无使汝思虑营营。”正是在“倚仗听江声”的静默中，东坡从老庄哲学中获得启迪，明白了俗世的“思虑营营”——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可怜、可悲；懂得人生在世要善于“忘却”，不为外物所役使，不为浮名虚利所束缚，活得真实，活得自然，方能潇洒江湖，自由自在过一生。定州作的《行香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词中亦多用庄子典故：“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知北游》），“大觉之后，方知其大梦也”（《齐物论》）。月光下把酒沉思，回味庄子的教诲，恍然间惊醒了世间名利客，唤回了苦海迷航人！人生如梦，何必为浮名浮利虚苦劳神？早日做个闲人，与天地自然共生！这种看破红尘、超脱凡俗的哲理意趣，如果说词限于“用意深，用笔曲”的特点而欲言又止、含蓄委婉，民谣格调的《薄薄酒二首》就一吐为快，无遮无掩了：

薄薄酒，胜茶汤；……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薄薄酒，饮两钟；……文章自足欺盲聋，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这两首诗流传颇广，也争议纷纭。黄庭坚认为：“《薄薄酒》二章，愤世嫉邪，其言甚高。”（《山谷外集》卷五）王若虚则说：“皆安分知足之语，而山谷称其愤世嫉邪，过矣。”（《滹南诗话》卷二）其实，诗中融合了佛家“色即空，空即色”的禅意，同前述诗词一样，都是东坡在佛、道思想影响下，联系自己生平遭遇，用俚俗直白的语言，借酒寓理，对俗世凡夫沉迷于“贪、嗔、痴”作出断然否定，对人生价值、人生终极目标进行理性探求和反思。所以，它们不是简单的“安分知足”，亦非一时冲动的“愤世嫉邪”，而是明心见性、深思熟虑的，并在创作中时有阐发：

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

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

——《和鲜于子骏郢州新堂月夜二首》（其一）

寄语北海人，今日为何年。

醉里有独觉，梦中无杂言。

——《和陶连雨独饮》（其一）

（下转第 54 页）

# 苏东坡人生起跳与乃父乃母

涂普生

**内容提要** 本文列举了苏东坡的人生起跳与乃父乃母之间的感人事实，探究了其人生起跳与其父母所赋予的助力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家庭助力，特别是父母助力与人之成人成才有着重要的关系。

**关键词** 苏轼 人生起跳 乃父乃母 关系

我国北宋文坛巨擘、上个世纪世界千年英雄苏东坡（名轼，字子瞻）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四川眉山。他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走出眉山，到开封（即汴梁）。翌年四月十四日，20岁的苏轼凭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成为进士，实现了他的人生第一次高幅度的起跳。探究苏东坡人生起跳与他的父亲苏洵公、母亲程夫人所赋予的助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弄清人之成人成才与家庭助力，特别是父母助力之间关系，对于千千万万为人之父者，为人之母者，对于催生高素质的人才，实现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据史料记载，苏东坡出生时，其父苏洵已年届而立，自然高兴异常，并且对其寄予厚望。据苏洵《名二子说》解，之所以给苏东坡取名为“轼”，取字为“子瞻”，盖由于“登轼而望”生发，“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一般说来，名与字只是一个人的符号。但这个符号也蕴含着其父母的希冀，和由这种希冀生发的人生成长所需的助力。及至苏轼六岁，乃父母便将他送入私塾读书。当时教私塾的先生名叫张易简，是眉山有名的道士。他在教学时，常常宣传道教教义。在张易简先生的学生中，有两位学生是他忠实的追随者。一位叫陈太初，而另一位就是苏轼。陈太初求道成仙达到了走火入魔的

地步，成天往山林中跑，最后于有一年的正月初一，按道教的方式，白昼飞升（即死去）。苏轼也经常盘膝打坐，经常往山林里跑，并且因此常得到张易简先生的夸奖。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觉得苏轼的行为十分反常。于是毅然决然地将苏轼从私塾里拽回家。当时，苏轼的父亲苏洵因又一次考试落第，到江淮一带游历去了，只有母亲在家管教苏轼。有段时间，程夫人正在教苏轼读《后汉书》。《后汉书》里记载后汉时期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奋力反抗，有的竟不惜冒生命之危险，上书弹劾奸党。遭至迫害折磨，甚至被谋杀丧命。在这群正人君子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后汉书·范滂传》对范滂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一天，程母正教苏轼读《范滂传》。当苏轼读到“……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即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时年三十三”时，苏轼停了下来，含着泪水问其母说：“母亲，我长大了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程母爽朗而坚定地回答说：“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这子、母之间一问一答，对苏轼处世为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历史有时是何其相像呀。苏轼后来在官场的遭际，以及他面对非常的遭遇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正好应验了他儿时的愿望。与范滂何其相似。由此看来，一位母亲的一言一行，对其儿子的影响是何其之大。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心地慈善。幼年时的苏轼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其中，有一个浓烈的兴

趣就是到庭园树上窥探鸟巢。有时还把幼鸟或鸟蛋弄出来，捣掉鸟巢。苏轼的母亲很是痛心。她严厉告诫苏轼和家中的使女，一律不得窥探鸟巢，更不得从鸟巢中拿取任何东西和捣坏鸟巢。苏轼谨遵母命，从此再也不敢去干鼓捣鸟巢之类的事了。不几年，他家庭园里鸟巢多了起来。有的鸟巢做得特别的低，以致低得苏轼都可以看得见鸟巢里宿鸟的羽毛了。苏轼也因此感到特别高兴。这件事，对苏轼慈爱生命、乐惠平民品格的形成，影响也是极大的。苏轼在他二十岁考中进士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也彰显了他的这种思想和品格。尤其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后，在手无半分公共权力的情况下，依然想千方、设百计拯救溺婴弃婴，依然帮助黄州父老战胜瘟疫等爱民、惠民之举，更折射出程夫人慈善教子的显著成效。

苏轼的父亲苏洵是我国自北宋以来的知名人物。不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列，而且是北宋以后流传甚广的启蒙读物《三字经》里的典范人物。《三字经》里“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说的就是他。这位苏洵先生声名虽然如此卓著，但是他的人生道路一直都不那么顺。最突出的表现是，苏洵历经多次科举考试，而每次考试都是名落孙山。当苏洵又一次考试落第后，正准备外出散散心，积蓄积蓄一下力量，迎接下一次的考试。这时，苏轼的母亲开口说话了。她对苏轼的父亲说：“你呀，都一把年纪了，还考个什么功名罗。你看看我们的儿子都到了读书上进的时候了。而我们家附近又没有一所好学校可以叫孩子上了。张易简先生办的那家私塾好是好些，但张先生是个道士，不能叫孩子去那种私塾。我想哈，不如你就在家里，也不必去备考、赶考、求功名什么的，开个家塾教教孩子算了。”苏洵听了夫人的话，想了想，觉得蛮有道理。从此就在家呆着，一方面教孩子，一方面写点文章。

苏洵教苏轼十分认真。那种认真劲儿，大体可以用三个字概括：严、博、夸。有道是，严师出高徒。苏洵要求苏轼一天之内要熟读多少篇文章、背会那几篇文章、抄写那篇文章，每天一布置，每天一检查。检查之后，该表扬的表扬，该惩罚的，毫不留情地惩罚。惩罚方

式有不准用餐、打手心、罚站、重读、重背、重写多少遍等。有时处罚得让苏轼的母亲很心疼，跑过来说情讨保，苏洵也不予理睬，依然惩罚不辍。再一个就是“博”。苏洵教苏轼，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鼓励苏轼尽量多读些诸子百家，尽量多读些稗记野史。鼓励苏轼猎奇，鼓励苏轼联想、遐想，敢于拿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鼓励苏轼另类思维，写出出奇的诗句、文句来。苏轼十岁多一点的时候，就能提出不少与众不同的问题，写出不少出奇的文句来。苏洵对苏轼的这种培养教育的结果，在苏轼二十岁考中进士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慈与严。苏轼为了论证自己的论点，竟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几句对话不仅有力地证明了自己文中论点，而且有力地证明了明主贤君的用人之道。《刑赏忠厚之至论》因而添色，成为优等论文。而苏轼在试卷上杜撰尧与皋陶的对话这件事，在文坛上被传为佳话。这件事本身，折射出苏轼的博学和智慧。第三个字就是“夸”。苏洵在教苏轼读书过程中，十分注意苏轼取得每一点成绩、每一点进步。只要有一点成绩、有一点进步，苏洵就要大加夸奖，并且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加夸奖。据有些文字记载，苏轼有一次看到一只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在瓮里一动也不动。大家都认为这只小老鼠在瓮里真的死了，赶紧把瓮口倒过来。等把小老鼠倒在地上，只一刹那，便急速逃走了。苏轼觉得这只小老鼠机智、狡黠，把聪慧的人都骗过去了。于是产生灵感，写了一篇短赋《黠鼠赋》。赋写成后送给父亲苏洵看。苏洵看后，拍案叫好。并且亲自上街买回绫锦，亲自将《黠鼠赋》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绫锦之上，还花钱到装裱店装裱成立轴，挂在自家客厅里。每逢家里来了客人，苏洵都把苏轼叫到客厅里，当着客人们的面，大声朗诵赋文。朗诵完之后，苏洵又当着客人们的面，进行解读，大加夸奖。这样一来，苏轼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学写诗词赋的兴趣更浓了。苏洵就凭这“严、博、夸”三字，教育苏轼、引导苏轼，夯实人生起跳的文化知识的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至和三年（1055）前后，北宋户部侍郎张方平（字安道）任成都太守。张方平初到成都，求才若渴，四处打听人才。当打听到眉山苏洵文章写得好，也写得一手好字，却因屡试不第，窝居在家。便亲自写信，召见苏洵。苏洵收到张方平的信札，大喜过望，连夜翻箱倒柜，遴选自己平时写的文章，共选了8篇。第二天五更天，苏洵起了床，上了路，去往成都面见张方平。刚走过门前不远的一座桥，突然想到，我年近半百，还求什么功名，谋什么皇家饭碗。我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聪颖过人，正当入仕之年，何不将苏轼、苏辙带上，一起面见张方平，能替孩子们谋个饭碗，带入仕途，这才是正理。想到这里，苏洵急忙转回家去，把自己的想法与程夫人讲。程夫人高兴异常，随即叫起苏轼、苏辙，与父亲苏洵一道到成都去面谒张方平。待得到达成都，三苏父子拿着张方平的信札，在成都拜见了张方平。苏洵把自己的8篇文章呈了上去，然后对张方平告求道：“您的大恩大德我感激不尽。只是我已有这把年纪了，能否被录用，无关紧要。我有两个儿子，聪颖得很，我想仰仗您，把我两个儿子提携一把。如果您能帮一把，我们将永志不忘。”张方平看了看苏轼、苏辙，然后出了一道题，叫苏轼、苏辙考试一下。考试之后，张方平对苏轼、苏辙十分满意。当即拿出纸、笔、墨、砚，亲自修书一封，交与苏洵，叫苏洵带着这封信和两个儿子，赶紧到京城去拜访欧阳修。苏洵喜极而泣，拜别张方平。然后，带着张方平的亲笔信，带着苏轼、苏辙，于嘉祐元年（1056）赶赴开封，拜谒欧阳修。在欧阳修的关照下，苏轼、苏辙在开封顺利地通过了乡试、贡试和殿试。于嘉祐二年（1057）苏轼一举高中进士，实现了其人生第一次高幅度的起跳，步入仕途。

谈到苏东坡的人生起跳与乃父乃母，还有一件令人非常感动的事，是不得不说的。前面说到，苏轼兄弟是由其父苏洵带着张方平的举荐信，跋山涉水，到达北宋都城开封的。到达开封后，大抵因为是乡里人进大城市，囊中羞涩，父子三人住在开封兴国寺浴室里。兴国寺浴室便宜、安静，有利于苏轼兄弟读书学习。苏洵就一直在浴室里陪二位公子读书。有时也

为苏轼兄弟解书中之难，释书中之疑。他们每天吃的十分节俭。被苏轼后来戏称为“三白饭”，即白饭、白盐和白萝卜。苏洵就这样同甘共苦地陪着儿子。更令人感动不已的是，正是苏轼、苏辙在开封兴国寺浴室里备考、参考期间，他们的母亲程夫人在眉山身患重病，卧床不起，拖了一段时间后，溘然仙逝。程夫人临终前的遗嘱是，不要告诉轼儿、辙儿。不要耽误他们求功名。由此，不禁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父亲逝世的那一年，我在黄冈中学读书，正是我在准备高考的时候。我作为父母的长子，当我父亲弥留之际，父亲给我母亲的遗嘱，也就是一句话：“不要告诉伢，伢要考大学。”直到我高考结束，我才得到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待我从黄冈赶回老家到父亲坟前时，父亲的坟上长出了青草。啊，父母对儿子的爱呀，真是超乎常情、常理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做儿女的得到父母亲给予的这种爱，还有什么理由不奋发、不拼搏呢。

古往今来，一些哲人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人的一生，最关键的只有几步。而这关键的几步，甚至一、二步，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苏东坡的人生起跳与乃父乃母之间的这些感人的事实，给世人的启示是深刻的、丰富的。用心观察孩子的举动，及时为孩子纠偏、导正，这是为人之父、为人之母抚育孩子的第一要务。看准机会和火候，为孩子另辟天地，施展才干而忘我地提供助力，这也是为人父母帮助孩子发展，甚至起跳的最佳着力点。再就是，每个人既是父母的孩子、家庭的成员，也是社会的民众。社会乃是各种人、各种关系交织的共同体。因此，每个人都要明白并且都要践行这么一个共识：“人要人帮，人要帮人。”所有这些，都是值得那些有理想、有追求的人，那些想圆梦的人所记取的。

（涂普生，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

# 论苏轼治徐守密时期的求实作风

林冠群

**内容提要** 本文以苏轼任职密州与徐州期间的从政事实为依据，论述东坡在行政工作中一贯的求实作风。

**关键词** 苏轼 守密时期 求实作风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欧阳公多谈吏事”条载欧阳修的从政体验，认为“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出入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今日以人望我，必为翰墨出身；以我自观，亮是当年一言之报也。”<sup>①</sup>以上是欧阳修谈他早年从政被贬官夷陵（今湖北宜昌）时的一段经历。在这里，他从官方文案中亲眼目睹了前任官僚们极端不负责任、不顾事实、徇私枉法、制造冤案、草菅人命的种种恶行，从此对天发誓，居官任职一定要认真负责、不敢马虎轻忽。所以当别人认为他之所以能当上高官是因为他有文才时，他特别以此为例，再三说明这仅是偏见。他认为他之所以能当上高官，“忝尘三事”（指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等），那是因为在夷陵的经历使他“自尔遇事不敢忽”的认真求实精神所致，也就是做官任职必须认真负责。这条记载又提到，欧阳修谈论这段往事时，“老苏父子，间亦在焉，尝闻此语。其后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问之，则答曰‘我于欧阳公及陈公弼处学来’”。<sup>②</sup>可见，苏轼非常欣赏欧阳修认真求实的从政作风并引以

为楷模。

苏轼提及的另一位人物陈公弼，则是他开始进入仕途任凤翔府签判时的上级（凤翔知府）。这位陈公弼也是一个为官认真负责，甚至近于严苛刻板的人，后来苏轼还曾为他立传，写下《陈公弼传》一文。而在陈公弼未到任前，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已经开始展现出他实事求是的从政作风了。

苏轼赴凤翔签判任时，当地百姓承担一项很沉重的差役，即每年要将朝廷所需的木料编成木筏沿渭水驶入黄河，其中要经历黄河砥柱之险。很多穷苦百姓因此而家破人亡，成为地方一大祸害。苏轼经过调查访问，从有经验的衙校中得知，“木筏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涨，操筏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亡兄子瞻墓志铭》<sup>③</sup>）。于是苏轼根据实际情况毅然决定修改衙规，将普遍摊派差役改为衙门自己选择善于驾驶木筏的“水工”，并将这些人登记造册，作为一种专业操筏之人，然后等待黄河、渭水枯水的时机让这些熟练“水工”专司操筏放排。因这一项改革，多年来祸害地方的放筏之害减少了一大半。

在此期间，苏轼经过实地采访调查，了解到关中一带经过元昊叛乱之后，地方受到严重蹂躏，民贫役重，老百姓非常困苦。于是他根据实际情况写了《上韩魏公论场务书》。这是东坡从政后第一次针对社会现实提出的施政方略，得到陈公弼的赞许，上报朝廷。在这份《论场务书》中，苏轼特别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指出：“夫平安无事之时，不务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足以胜任县官权时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纳之于患难，轼恐外忧未去，而内忧



乘之也。”④为此他特地举出实例：“往者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多于府库也。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⑤即约二十五年（宋宝元元年至嘉祐八年）间，如今的“富户”不过是当年的穷户；如今存于民间的积蓄不过是当年残余不计的零头。能保持昔日富足的十不过三四。社会生产力的衰退如此迅速，实在惊人。为此，苏轼向韩琦提出的建议是：减轻穷民赋役，取消茶酒等项属于“官榷”的专卖制度，让利于广大群众。一则减轻赋役，一则让利于民，虽然表面上看暂时会减少政府财政收入，但“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⑥所以根本的出路还在于节用养民，让百姓有再生产的能力，才能富民强国，防患于未然。无独有偶，熙宁三年，司马光上疏要求罢废王安石等人设置的专为王室兴利理财的三司条例司时，其中亦谈到王安石行青苗法“放债取息”的危害。他说：“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领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不能输，况于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⑦司马光认为，这种由政府以“青苗法”的名义放债取息，盘剥百姓，其结果必然导致贫者逃亡，富者也所剩无几，社会生产力必大受影响。因此，可以打个比方：苏轼与司马光的观点是要采取“养鸡生蛋”的富民政策，而王安石是要急于“杀鸡取卵”，为国、为宋神宗兴利理财。

因为这样两相背驰的施政理念，王安石一直将苏轼与司马光等反对他“变法”者视为异己，必欲将他们逐出朝廷之外。他对宋神宗说：“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

轼、苏辙之徒而已。”⑧因此他除了将司马光视为反对派之首，力图排斥之外，就是极力在神宗面前诋毁苏轼。说苏轼是“邪憯之人”，还捏造事实，诬陷苏轼在父丧其间“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⑨。后来果真派他的亲信谢景温立案审查，欲加罪于苏轼。但再三追查的结果是，这一“人所共知”之事，纯粹系无中生有的捏造。然而，王安石还不死心，又曾向神宗建议控制苏轼之法：“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细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⑩如此主观阴险、奸刁恶毒的损人之举，综观苏轼一生，绝然做不出来，而王安石的这些被奉为“政治家”的行径，真可以百分之百地诠释中国古代的所谓“政治”。因为抑之不遗余力，所以王安石的党羽们一直盯着苏轼不放。他们宁可使出颠倒黑白、掩饰遮丑的手段来推行自己的错误主张也不许苏轼认真求实地履行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施政举措。

以下便是苏轼在密州、徐州任上的一些具体事实，可以作为对上述论断的佐证：

第一，关于“蝗不为灾”。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江浙一带已发生蝗灾。他曾经亲到灾区参与灭蝗的工作。熙宁七年九月，他被调任密州知州。十一月到任之后，他发现密州地区亦遭遇蝗灾，但当地官僚却妄称“蝗不为灾”，公然隐瞒实情。经过调查了解，他当即写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轼到郡二十余日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果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⑪铺天盖地的飞蝗一落落地，所有植物禾稼皆被吃个精光。灾情如此严重，地方官吏却如此胆大妄为，公然说谎欺瞒朝廷！可见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的吏治已经腐败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假如不是苏轼到任，及时反映情况，那么密州地区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按

苏轼在信中所反映的实情推断，那必然因为庄稼失收，百姓缺粮断炊，大批饿死！所以苏轼在信中请求韩丞相（即韩绛）立即减免秋税（北宋的秋税以纳粮为主）或者缓交青苗钱（即倚阁），让百姓手中还有些能活口的钱与粮食。为防止各级官僚拖延扯皮，耽误救灾时间，苏轼还特别向韩绛保证：“疏远小臣，腰领不足以荐鈇钺，岂敢以非灾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复检按，则饥羸之民，索之于沟壑间矣。”<sup>⑩</sup>这就是说，像我这样早就被王公大臣们疏远轻慢的小臣，个人的脑袋身躯岂敢冒犯王法而被砍头腰斩？怎敢向朝廷说谎，将不是蝗灾说成是蝗灾？请你务必相信，不要像往常那样又要派人反复查验，拖延时间，不然，等那些官僚们“查验”清楚，饥饿的老百姓都饿死丢进山沟里了。此时王安石已经罢相，韩绛执政，韩是东坡兄弟考取进士时的“座主”，有“门生”之谊，苏轼以这点关系，故而大胆上书，为群众救灾活命。假如王安石仍在相位，则又不知结果如何了。

第二，揭示吕惠卿“手实法”之弊。吕惠卿助王安石推行免役法的过程中，发现民间有瞒报财产以减少出役钱之弊，所以实行所谓“手实法”。免役法的目的是希望免除农民为无休无止的差役所累，能专心于生产。为此，将原来的差役法改变成“以产定赋，募民代役”——即由民户按财力多寡出钱不等雇人代服差役。但是由于各地方官僚在执行的过程中作弊使坏，“以产定赋”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往往是财产多的出钱少而贫困户反而出钱多。如“利州路提举司言，所部役钱法未均。……上户家业多而税钱少，下户家业少而税钱多，至第一、第二等户输纳钱少于第四、第五等故也”<sup>⑪</sup>，这是就一州一郡的局部而言，若就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更为严重。如“广西一路，户口才二十余万，盖不过江淮一大郡，而民出役钱至十九万缗，募役实用钱十四万缗，余四万缗谓之‘宽剩’。百姓贫乏，非他路比。上等之家不能当湖湘中下之户。而役钱之出，概用税钱，税钱既少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于身丁。身之有丁也，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已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之，而又敷以役钱，甚可悯也”。<sup>⑫</sup>因这种不公平不公正

的现象使免役法的推行出现重重困难。为此吕惠卿想出这一招“手实法”。“手实法”的基本点是鼓励百姓举报那些瞒报财产的真实性以回避役钱的人户。正如苏轼所言：“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sup>⑬</sup>）“手实法”规定，举报者所言如属实，可得到数目不等的奖赏。苏轼认为，那些敢于举报求赏的人多为地方上的凶奸无良之辈，这些人从根本上说不敢侵犯权势者与地方豪强，必转而欺压善良之辈，成为地方一大祸害，将来还须要地方州县共同铲除掉，才能让百姓安居。这也证明吕惠卿等并不了解下情盲目施政。而更为离谱的是，为了保证手实法及各项“变法”能贯彻下去，他们还指使司农寺擅自下文规定，凡不执行“变法”的，都应该以违反国家法律论处！对于这种不了解实际情况，擅造律令的行为，苏轼及时作了反驳。他对提举常平官说：“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自擅造律也！”<sup>⑭</sup>又在《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中云：“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窃怪司农寺所行文书措置郡县事，多出于本寺官吏一时之意，遂与制敕并行。……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轼之所深不识也。”<sup>⑮</sup>由于苏轼的及时反映，手实法最终不到一年便罢废了，司农寺一个部门敢取代国家制定法律的怪现象也才得以纠正。

第三，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京东、河北榷盐之议。苏轼在密州任上，得知朝廷听从三司使章惇的建议，要在京东、河北两路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禁止民间私制私售。密州当时正处于京东东路的辖区，苏轼到任后，经过实地了解，知道若在这一带实行食盐专卖（即榷盐）必定会给地方政府及老百姓制造动乱与麻烦。所以他在给文彦博侍中的书信中特别详细地驳斥了章惇的观点。章惇认为，河北与京东东路与陕西路一样，都处于边防要地，如今陕西都实行榷盐了，而河北与京东未实行，这是“祖宗一时之误恩也”。苏轼认为陕西的情况与京东、河北完全不同。陕西一带食盐仅靠“广袤不过数十里”的解池供给，地方狭小，政府容

易控制垄断，从北宋边境外“虏”区进入的青盐也可以容易通过军队严禁。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敢于走私，境内百姓私取青盐的也属于半公开的秘密。而京东、河北与陕西的情况就不同了。京东、河北沿海一带都产盐，若想控制起来像淮南江浙一带，情况要复杂得多。苏轼说他在杭州任上时，因为实行食盐专卖，每年要处罚犯禁而逮捕入狱的百姓数以万计！但还是不能完全禁止。一些人还组织自己的武装押运，与政府军公然对抗。而京东、河北之民“悍于淮、浙远甚，平居椎剽之奸，常甲于他路，一旦榷盐，则其祸未易以一二数也。”（《论文侍中论榷盐书》<sup>⑧</sup>）所以祖宗对这一地区不加榷盐那不是“误恩”而正是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章惇的榷盐建议实在是脱离实际的昏庸之见。另外，苏轼又分析道，因为京东、河北一带沿海皆可产盐，产量极大，若都以官钱收购，近年来官钱本就不多，能全部收购吗？官府“以有限之钱，买无穷之盐”，买了之后，销不出去，必然要亏空“官本”。为了制止这种“损官而不利民”的错误决策，苏轼极力说服文彦博出面进行干预。

第四，徐州抗洪。熙宁十年，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四月到任。他在《谢表》中有句：“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sup>⑨</sup>说出了他在神宗执政、王安石当权之初所处的真实境遇。由于敢于实事求是、直言不讳，他遭遇了王安石及其党羽的多次诬陷，差点获罪吃官司，但他依然“信道直行”，毫不屈服。所以司马光曾对神宗“自我批评”说：“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sup>⑩</sup>司马光说苏轼是被当朝权贵们疏远的小官，这一点，苏轼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也是这样说的：“轼不敢论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势有以见及。又闻自京师来者，举言公深有拯救斯民为社稷长计远虑之意。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sup>⑪</sup>这一段话正道出了他自向神宗上《万言书》得不到采纳而并遭王安石之流无休止的诋毁诽谤之后，已深知自己在官场上“孤危衰废”的

处境。但尽管如此人微言轻，“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势有以见及”，一种为官任职的责任感又时时驱使他不得不言，不得不管。如此便可以理解，他为何能在徐州任上冒着生命危险抗洪救灾的认真负责精神。

洪水初来，开始淹灌东平。僧人应言建议“凿清冷口，导积水，由古废河以入海”，当时城中官民惊恐，不知所措，对于应言的建议也疑虑不决。苏轼让应言直抒己见，充分辩说，最终采纳他的建议，“卒以其言决之，水所入如其言，东平以安”<sup>⑫</sup>。集纳群众意见，实事求是，这就是苏轼一贯的从政作风。至洪水暴涨，即将淹没徐州城的危急之际，苏轼审度形势，首先制止城中富民惊慌逃跑，大声疾呼：“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接着，他穿起草鞋，拄起拐杖，亲身到守城的武卫营中动员士兵参与抗洪救灾，又亲自与兵士一起驻守在城墙上，过家门而不入，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终于抗洪得胜，“完城以闻”（《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sup>⑬</sup>）。洪水过后，苏轼经过认真考察，知道徐州城要更好地抵御洪水，必须构筑石岸，但连上两次奏折，都没有回音。苏轼没有灰心，为着对徐州人民负责到底，他又退而求其次，再上状求筑木岸。这一次他还亲自写信给在京任职的好友刘攽，请他帮忙在朝中陈说利害：“今寄奏检一本奉呈，告贡父（刘攽的字）力言之。此事决不可缓。若更下所属相度，往返取旨，则无及矣。某岂晓土工水利者乎？职事所迫，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弃为鱼鳖也。”<sup>⑭</sup>这段话告诉我们的信息是：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北宋官场，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像这样涉及民生的工程，若没有人在上层“力言”，可能就会被官僚们借口“考察研究”而拖延时日，没了下文；其次，苏轼坦言，自己对这样的水利工程并无多少知识，但自己为官一任的职责所在，不忍心让一方百姓再次遭受水灾的祸害，所以一定要坚持到底。

最后，木岸终于筑成。苏轼也因为这次救灾抗洪受到神宗的表彰奖励。

第五，徐州上皇帝书。苏轼到徐州任后，于元丰元年，出于一种守土有责的使命感，禁不住“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这就是《徐州上皇帝书》。在这份书中，苏轼根据他到徐州后

的观察思考所得，向宋神宗提出了几件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事项。虽然他知道由于王安石等人的排挤打击，他的建议不一定能为神宗所采纳，但为官作宦的责任感、使命感总是让他按捺不住，知无不言。所以他在此书的末尾，不无自我调侃地说：“今臣于无事之时，屡以盗贼为言，其私忧过计，亦已甚矣。陛下纵能容之，必为议者所笑。使天下无事而臣获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sup>②③</sup>宁愿让人见笑，也要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到底！那么苏轼到底向神宗提了哪些要紧的事？

首先，苏轼认为徐州地形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而徐州的东北有一个利国监，此地产精铁，可制兵器。有专门在此地冶炼钢铁制造兵器的所谓冶户三十六家，家家都是豪强富室，家财巨万，但当地“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苏轼担心在这样形势险要的地方，万一有居心险恶的野心家啸聚于此地，利用能制造兵器的有利条件，叛乱造反，必将成为心腹大患！“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顺流南下，辰发已至，而徐有不守之忧矣”。<sup>②④</sup>所以苏轼建议，由政府出面将这三十六冶户组织起来，选举头目，教以战术、武术，政府定期检阅、训练，武器则集中收管，专以备防卫。

其次，增筑徐州城、增加守卫部队，以利防御。苏轼认为，徐州“城大而兵少”，只有千余人，若有事，“缓急不可守”。因此请求将南京（指今之商丘，位于徐州西北）新招的骑射两指挥移守徐州，又募石工采石筑城，使“数年之后，举为金汤之固，要使利国监不可窥，则徐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sup>②⑤</sup>

再次，整治逃军。苏轼深入考察，了解到当时朝廷规定押送犯人都用禁军（正式服役、训练有素的军人），但押送的路途无论远近，路费盘缠都由士兵自掏腰包，穷苦的士兵只得向其官长借贷应付，官长便从其粮饷中剋扣，造成士兵益发穷苦。于是“军政不修，博弈饮酒，无所不至，穷苦无聊，则逃去为盗”。而这种训练有素的逃军一旦成为盗贼，就会形成难以对付的“恶贼巨盗”，成为地方安全的大隐患。苏轼到任后，当即禁止军官向士兵借贷，又别设

经费供士兵借支，不取息钱。经过这一改革，一年之后，情况才有好转。“士皆饱暖，练熟技艺，等第为诸郡之冠（即军事考核为各州郡第一）”。因为有这一治效，苏轼还特地向神宗提出请求，让他继续留在徐州任上，推广这一方法，则“军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盗之一端也”。<sup>②⑥</sup>

再次，考选武备人才。苏轼认为，北宋当年的科举选士法仅以经术用人，只局限于选取文职官员，而且所得的人才又多数以南方吴、楚、闽、蜀这些地方的人为主，而北方如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之人，虽然学文的人少于南方，但这些地方自古以来，为豪杰之场，其人忠勇任事，果敢悍鸷，尽管成不了文人也不失为君子。所以苏轼建议采取唐代的做法，特别在京东等五路考选武职人才，使“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途，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sup>②⑦</sup>

以上四点，其实都是围绕一个重心：即以徐州为国家重要战略据点，整军备战，加强防卫。然而，就这样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具有高度预见性、前瞻性的宝贵意见却再次被当政者废弃不用，不加理睬。诚如苏轼所预料的那样，被那些“变法”派一笑置之。然而三十多年后，当金兵南下灭宋时，才验证了苏轼论断与建议的无比正确性。尤其最后一点，据《宋史·赵立传》载，赵立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徐州人，因为勇敢被招募为士兵。当金兵南下时，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武与机智，能率领有限的地方武装截击金兵，收复徐州。后来被兀术的部队重重围困时，还血战到底，决不屈服。而宋朝的军队却惧敌如虎，抗命不敢救援。假如当初能采纳苏轼的建议，积极选拔像赵立这样的武备人才，宋军又何至于像秋风扫落叶似的被金兵追得落荒而逃，一溃千里？

第六，苏轼在徐州还有一项功德无量的奏议：乞医病囚。宋朝的苛捐杂税最为严重，人民负担苦不堪言，加上每年都要忍受屈辱向北方的辽金输纳金银，财政亏空厉害，更加重老百姓的负担。百姓被迫逃亡，军士叛逃为匪，因而被拘捕入狱的也特别多。牢狱里犯人挤满。因为牢狱管理不善，常有因病而致死者。英宗治平四年，皇帝亲下手诏，规定“今后诸处军

巡院、州司理院所禁罪人”，若在一年内有两个人犯人病死狱中的，管理者（如推司、狱子）都要受处罚。每死多一人，罪加一等。但这条诏令执行几年之后，到了熙宁四年，王安石“变法”期间，遭到朝廷内外一些官员的反对，予以废止。苏轼在徐州，据观察所得，认为“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无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责者”。甚至病死百人以上也无人负责，这是极不人道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折衷创新的办法：各处牢狱可选择医生与差役各一人，专门负责为狱中病囚医病。从免役法推行过程中获得的“宽剩钱”拨给他们经费（佣钱），但一年的经费先只支給三分之一，一年之后，经查验，病囚中经医治十人只死一人的算上等，死二人的算中等，死三人的算下等，死四人以上为下下等。上等的支給全部经费，中等的支給三分之二，下等的支不支。属于下下等的，以犯罪论处。以上经过实情都要记录在案，若地方医博士、助教的官位有缺时，可从考核中评比最优的选取充当。（《乞医疗病囚状》<sup>⑩</sup>）

苏轼的这一建议后来有没有得到执行，不得而知。然而，看他于元祐末年在扬州任上写给张嘉父的信：“君为狱吏，人命至重，愿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获；及病者多，为吏卒所不视，有非病而致死者。仆为郡守，未尝不躬亲按视。若能留意于此，远到之福也。”（《与张嘉父七首》其三<sup>⑪</sup>）可以相信，在他任郡守的地方必定实行类似的方法，以挽救那些死于非命的犯人。这与他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诗：“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熙宁中，轼通守此郡……》<sup>⑫</sup>）情感是一致的。苏轼从政四十多年，即使期间不幸而陷于被贬逐的十多年间，他同情人民群众的情怀始终不变，因而不管他有权还是无权都一样认真对待自己的职守，力所能及的事他一定认真去做，决不马虎。所以他能问心无愧地认为自己也如欧阳公一样“遇事不敢忽”，“以吏能自任”。

#### 注释

⑩⑪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13“欧阳公多谈吏事”。

⑫⑬ 高秀芳、陈宏天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1118、1119~1120页。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93~1394、1393、1395、1395~1396、1396、1396、1398~1399、1400、1398、762、758~759、760、760、762、764、1563页。

㉓㉔㉕ 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7“神宗熙宁三年”。

㉖ 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6“神宗熙宁二年”。

㉗㉘㉙ 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神宗元丰五年”，卷301“神宗元丰五年”，卷225“神宗熙宁四年”。

㉚㉛㉜㉝ 林冠群点校《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卷12、15、15、16。

㉞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23页。

（林冠群，海南日报社原总编助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人生识字忧患始” 张圳篆刻）

# 清廉苏轼及其启示

胡先酉

**内容提要** 苏轼一生宦游，但无论身居何职，他都能心系百姓、为民造福，清廉为官。本文追述了苏轼清廉的事迹，分析苏轼清廉的原因和清廉苏轼带给我们的启示，除了表达对他的景仰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希望从他身上学到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关键词** 苏轼 清廉 启示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进士及第，1061年，26岁的他以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官职登上了北宋的官场。在他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曾担任凤翔签判、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知州；而在朝中，他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要职，无论身居何位，他都能心系百姓、普济苍生、清廉为官。

## 一、清廉的苏轼

位高权重的苏轼一生从未以权谋私，尤其是在地方官的任上，他一心一意为民办事，造福一方，留下不少佳话。杭州、密州的灭蝗救灾、减赋赈荒，杭州的掘湖修堤，徐州的抗洪保堤，都是让当地人民世代铭记的美好政绩。不仅如此，他还自掏腰包，为当地人民做好事。

在杭州，捐金建医院。他捐出五十两黄金，加上官费，合起来办了一个叫安乐坊的医院，收纳贫困病人，使上千患病的贫困病人得医而愈。

在惠州，尽管他已是待罪之身，无职无权，他仍乐于施医散药，倡议资助筑堤建桥。为建桥筑堤不仅劳心劳力，而且慷慨解囊。他手头拮据，无钱可捐，便将皇帝赏赐的犀带也捐赠出来。同时，他还写信给远在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的弟弟，动员弟妇史夫人把以前进宫朝见时所得赏赐数千两

黄金拿出来“助施”，终于促成了这项有益众生的壮举。苏轼不仅不以权敛财，而且还在无论顺景逆境的情况下，自己掏钱出来为民做好事，这样的官品人品堪称清廉。

下面再说说表现苏轼清廉的几件事。

### 一是“炼金方子”的故事

苏轼在凤翔为官时，工作之余，常常去当地的开元寺看壁画。一天，寺里的老僧对他说，要给他一个炼金的方子。苏轼说自己不喜欢这一类的东西，拿来也没有什么用，拒绝接受。老僧说，正是因为你不会拿它来炼金，我才给你。老僧告诉苏轼，自己曾经将这个方子给人，得到的人拿去炼金，结果有的是马上就死了，有的是家里人死了，有的是丢官了，所以不敢轻易将它传授人。苏轼不好再拒绝，只好接着。老僧又叮嘱苏轼，这个方子千万不要让太守陈希亮知道，他说，陈太守曾多次向他要这个方子，他都没有给。可苏轼把这个方子拿回去后，不久，陈太守就知道了，几次三番地向苏轼索要。苏轼没法，只好给他。不久，陈太守就因收受邻郡送来的酒而被免了官。苏轼怀疑他是因为使用了炼金方子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自己为此深深感到悔恨。后来苏轼谪居黄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也在黄州，苏轼问陈慥说：“你父亲过去究竟用没用这个方子来炼金？”陈慥回答说：“我父亲丢官以后到了洛阳，无钱买房，于是就大肆地用这方子炼金。”然而陈希亮最终因得了手指上生疮的病而死去，这才知道老僧说的话确实不是虚妄的。

### 二是唯一的一次“经济问题”

苏轼在他的为官生涯中，一直秉持廉洁自律的做官准则，无论是在朝中官居高位还是在地方做一把手，都从未有过贪财自利的劣迹。这一点连他们的政敌也十分清楚，所以他们在攻击弹劾苏轼苏辙兄弟所列出的所谓“罪状”中，几乎不关涉钱财经



济方面。说“几乎”，意味着他们并非从未干过，熙宁四年（1071），苏轼连上两篇《上神宗皇帝书》全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引起了变法派的不满。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说他在苏洵去世，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谋利，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最终却一无所得。这是苏轼一生中所遭受的无数次诬陷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遭受在经济钱财被诬。从此以后，苏轼的政敌也变得“聪明”了，他们知道，对廉洁自律的苏轼，要想在经济钱财方面找突破口，那是徒劳的，所以他们以后攻击苏轼再也不关涉钱财经济了。

### 三是婉拒亲戚

苏轼兄弟在朝中任高官时，有个叫刘厚盛的亲戚千里迢迢从眉山来到京城找苏轼兄弟帮忙在朝中谋个差事。他先去找苏辙，苏辙说自己办不到，让他去找苏轼。于是，刘厚盛便去找苏轼。苏轼得知他的来意后，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苏轼说：过去在眉山老家时，听长辈讲，有个人因家里穷，无以为生，听人说古墓里可能葬有财物，便去挖古墓。他挖开一个墓，见是一个帝王。可这个帝王对他说：我是汉文帝，我在位时就倡导节俭，我宫中用的器皿都是瓦器，我死后的陪葬品全是陶瓦器皿，没有金玉，所以无法接济你。挖墓人大失所望，忽见有二墓相连，于是动手挖开一墓，只见一饿死鬼坐在墓中，对他说：我是伯夷，因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了，给不了你什么。挖墓人叹息道：我忙了半天，一无所获，旁边还有一墓，再去碰碰运气吧。伯夷在墓中赶忙劝他说：那是我弟弟叔齐的墓，他同样是饿死的。你看我这穷样，我弟弟能有什么东西给你呢？刘厚盛听了苏轼这个故事大笑不止，就起身回乡了。

苏轼不仅不贪财，不以权谋私，而且反对豪华奢靡，提出整治官员贪腐的具体措施。

### “谏买浙灯”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自凤翔还朝，任殿中丞直使馆判官告院及开封府推官。这年元宵节，宋神宗为了取悦后宫要大办元宵灯会，便下旨减价收买 4000 盏浙江灯。当时的北宋已是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困苦，朝廷不管不顾，豪华奢靡。苏轼便写了《谏买浙灯状》，上奏朝廷，反对买灯，还建议今后游玩、宴会、赏赐之类，一切从俭。神

宗皇帝最终采纳了苏轼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谏买浙灯案”。

### “扬州罢会”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苏轼任扬州太守。扬州的芍药花为天下之最。蔡京任扬州太守时，在扬州大搞芍药“万花会”，每年用花十多万枝，除扬州城内外的花外，还从周围的各县远远运来。参与此事的各级官员趁机勒索发财，而扬州百姓则深受其害，苦不堪言。苏轼一到扬州，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决定罢除扬州“万花会”。当自今年开始，罢除芍药“万花会”的通令一出，扬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拥向扬州府衙，向苏轼作揖磕头，表达心中万分感激之情。见此情形，苏轼也感动地说：“扬州近岁，率为此会，用花十余万枝，吏缘为奸，民极病之，故罢此会。”

### “节用以廉取”

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开支巨大。尽管朝廷加紧搜刮盘剥百姓，仍是入不敷出；而各级官员为了满足自己豪华奢靡生活，无不想在百姓身上榨取。为改变这一情况，苏轼在《策别厚货财一》中提出了“节用以廉取”的主张。苏轼认为，只要朝廷和官员注意计划，节约开支，自然够用，就没有必要搜刮百姓了。这是从源头上治理贪污腐败。为了说明这个观点，苏轼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有人在穷困时只得到“十金之资”，而一家人的衣食费用全在这“十金之资”中开支，只好计划节约，结果，“宽然而有余”。可等到稍稍有了积蓄，不仅吃饱穿好，还想在其他方面多开销，到后来收入越多越不够开支。他说，“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就跟这家人相似。“节用以廉取”的关键是“节用”。怎样才能“节用”呢？苏轼提出“省无益之费”。那么，省哪些是“无益之费”呢？苏轼斗胆提出：一是省“郊祀”之费。皇帝三年必行一次郊祀，每次郊祀都要赏赐官员，且赏赐又是很丰厚的，花销巨大，苏轼主张大大降低赏赐金额。二是省庙费。他说，“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这样做本来就过分了，还要派大臣专司其职，“岁给以万计”，这样的费用是该省的。三是省“后宫之费”。他在《御试制科策一道》中说：“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

而欲广求利之门”，其结果必然是所得到的永远也不够花销。此外，对“冗官”“冗兵”，苏轼也提出应大量裁减以节约国家的开销。

### “课百官”

“课”，也叫“考课”，意为考核。“课百官”，就是要建立官员廉政考核制度，从制度上来防范与惩治腐败，用法律来强使官员做到清廉。苏轼在《策别课百官》中提出“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专任使”“无责难”“无沮善”六条考课官员的方法，他首先强调的是“厉法禁”，强烈主张用法律来约束官员，依法处理违法的官员。这实际上是从法制的角度，提出了加强廉政建设的构想。苏轼还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考课则以黜陟，大比则以用舍”主张，明确表明要用“清廉”来决定官员的升降与任免这一考课百官的观点。

## 二、苏轼清廉的原因

### （一）家庭的影响

不贪非分之财，乐善好施，这可以说是苏轼家的家风，且代代相传。

不贪非分之财的曾祖——苏杲。北宋初年，后蜀被宋所灭，后蜀的高官们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忠心，纷纷卖了宅业田产到京城去讨好朝廷。眉山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争相出手买便宜。可苏杲却不为所动。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买时，他说，没别的，只是担心置业太多会害了子孙。苏杲终其一生，家里的田地不到二百亩，几间破房也未花钱修缮，自己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可他帮助别人却十分大方，做好事从不留名。既不贪财，也不贪名。

乐善好施的祖父——苏序。苏序兄弟九人，唯他独存。他秉承父亲的本性，生活简朴，却尤其乐善好施。有好几次因帮助别人，自己一家却受冻挨饿，他也从不后悔。他好种粟，并拿家中的稻米与别人换粟，他用大仓将粟储存起来。别人觉得奇怪，问他，他只说，粟性坚，不易霉烂。有一年眉山天旱成灾，饥民遍野。苏序拿出储存了几年的粟来熬粥赈灾，救了数以千计的灾民。这时，大家才明白了苏序储粟的真正用心。

言传身教的母亲——程夫人。程家是眉山的富户，苏家则只是一般的家庭。但程夫人嫁到苏家后，谨守妇道，恭敬孝顺，勤劳俭朴。有人曾对她说，你娘家那么有钱，回去拿点，你的日子就会过得好

点。程夫人对那个人说，我回娘家拿钱没问题，可这样一来，我就会丢丈夫的脸，我绝不这样做的事。为了让丈夫发奋读书，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程夫人自己挑起了家里生活的重担。她在纱縠巷租了一个铺面经营丝绸生意，经过几年，苏家也富裕起来。有一天，店里的两个丫头正在熨丝绸，一个丫头忽然尖叫一声，双脚陷入地中。大家闻声跑来一看，见地下一坑，坑中现出一瓮，上盖一板。大家说，瓮里可能有财物，打开看看。可程夫人却当即叫人将坑填起来，不准发掘。她说，地下的东西不属于自己，那是非分之财，决不能拿。

如果说，苏轼的曾祖、祖父的好品行对苏轼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话，而程夫人的言传身教则是对儿子直接的教育。苏轼在《程夫人不发宿藏》一文中说，他在凤翔为官时，一天大雪，可他居所前的一株大柳树下，一尺见方的地上却一点积雪也没有。天晴后，那个地方突然隆起几寸高。苏轼怀疑是古人藏仙丹妙药之处，想叫人来挖开看看。这时，苏轼的夫人王弗对他说，如果母亲还在，一定不会这样做。苏轼听了感到羞愧，马上打消了发掘的念头。凤翔为官，是苏轼做官的开始，苏轼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从不贪腐，清廉一生，母亲的言传身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二）自身的修养

苏轼自幼勤奋好学，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入骨髓，小小年纪就“奋厉有当世志”。通过自身的修养，形成了自己对物质钱财的看法观点，并身体力行。

首先，虽然他从不认为人该去获取钱财，但他严格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去获取自己通过工作劳动该获得的报酬，不该自己得的非分之财自己决不去拿。他在《赤壁赋》里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几句话鲜明地表达他对得到钱财的看法。该自己得的就得，属于自己的就拿；不该得不该拿的，“虽一毫而莫取”。

其次，他不看重钱财，他认为，人生百年，终归一死，钱财乃身外之物，不必看重。即便日子清贫，也不必太在意。他不反对过好日子，但反对奢华。他在《后杞菊赋》中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这几句翻译



成今天的话就是：人生一世，好比臂肘一屈一伸。什么是贫？什么是富？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有的人吃糠咽菜却长得白白胖胖，有的人顿顿山珍海味却长得又黑又瘦。晋朝的何侯吃饭来摆满了一桌子的菜，南齐的庾杲之每顿饭除了韭菜还是韭菜。有的人就是在梦中也要去比较谁吃得丰盛谁吃得简单，这有什么意思呢？到头来最终都是一死。苏轼正是有这种淡看钱财富贵的豁达情怀，所以他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他也能笑着去过。他在《后杞菊赋》中这样写道：“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不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即密州），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谬。”笑对苦日子之情溢于言表。苏轼不反对过好日子，但反对奢华。与苏轼同朝有个叫蒲宗孟的，官居尚书左丞相，他每天宴饮都要杀猪羊各十，燃烛三百。每天盥洗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沐浴、大沐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他曾经写信给苏轼，说自己“晚年学道有所得”。苏轼回信说：“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二曰俭也。”委婉地批评了蒲宗孟的奢华。

再者，作为几十年做官的他，认为官员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也是第一位的品质就是清廉。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中一开篇就说：“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六事”，是指古人认为官员应具备的“善”“能”“敬”“正”“法”“辨”六种基本素质，而苏轼则认为，古人之所以将这六种品质归结到一个根本，都是把“廉”放在首位，这是因为首先要崇尚品德，然后才要求全面的素质。为了强调这点，他在文中还说：“故圣人恶彼败官，虽百能而莫赎。”古代的圣人憎恶那种腐败的官员，即使你有百般的能耐也不饶恕。指出对官员要“廉一贯之”，衡量官员的所作所为，应将清廉贯穿自始至终。苏轼认为清廉对于一个官员的成败至关重要，他在文中十分肯定地说：“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这个鲜明而响亮的观点应该说是苏轼总结了历代做官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一条真理，把保持清廉为官的重要性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完全可以作为每个做官者为保持清廉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的座右铭。

### 三、清廉苏轼的启示

苏轼是全中国、全世界的苏轼，更是我们眉山的骄傲。一个清廉的苏轼能给我们每个人、每个官员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员领导，都应通过学习，加强修养，树立起像苏轼那样所秉持的“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钱财观。该自己的劳动所得，不必推让，受之心安理得；不该得不该拿的千万别伸手，晚上好睡安稳觉。我们虽然好些人不可能有像苏轼家那样的家风，但只要每个人能从自我做起，那你的言传身教定会像苏轼的母亲程夫人那样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周围。

其次，苏轼那种不看重钱财，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笑着过，这样的豁达人生态度也值得效仿。苏轼从来不曾反对人应该过好日子，但对奢华的生活他绝不赞同。他在朝廷反对后宫过奢华的生活，在扬州罢万花会，这是因为无论是后宫奢华的生活，还是扬州的万花会，这些都是把豪华的生活、花费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的压榨盘剥上，且易滋生官员的贪腐。正像当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从没有说过要反对每个人过好日子，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最近，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各个单位部门都要一切从简，规范官员领导的办公用房、用车，禁止官员进各式各样的会所，等等。这些防腐措施深得人心。但这是为了反腐，不是反对人民过好日子。而我们要效仿的只是像苏轼那样不要过分看重钱财，好日子能过，但绝不能奢华，苦日子也能过，且不怨天尤人。一个人如果过分看重钱财，就难免被钱财所累，一旦非分之财、不义之财摆在面前，就可能禁不住诱惑而失节毁身，成千古之恨。至于过日子，日子好时虽说该过得好，但也不能奢华。而苦日子，肯定谁也不愿意过。但我们不可能一直过好日子，一旦苦日子降临，你就怨天尤人，度日如年，自己天天痛苦难受，那也真划不来。你看苏轼，在密州身为太守，却能吃着野菜，“扪腹而笑”。

（下转第65页）

# 苏轼与中国墨文化

刘晓凤

**内容提要** 苏轼是爱墨文人的代表，除了日常使用，苏轼在诗文中用较多的笔墨记录墨文化的历史，当时的制墨名家、制墨工艺、名墨。他亲自制墨、品墨，对文人爱墨的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从中可以窥探北宋社会的文化发展和社会风尚。

**关键词** 苏轼 名墨名家 制墨 藏墨 赠墨 品墨

墨是“文房四宝”之一，是历代文人的亲密伙伴，不仅实用，同时也是一件融绘画、书法、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中国墨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将天然墨用于装饰，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上有朱书和墨书痕迹，墨书痕迹即为碳素，可见在商代时人们已经掌握天然墨的性能，用于书写文字。《述古书法纂》载西周的周宣王时邢夷开始以煤烟为原料制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石墨。

汉代造纸业的兴起进一步推动制墨业发展，石墨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墨工开始用漆烟调和松煤的烟，制成墨丸，并出现了著名的墨工如田真，著名墨产地如扶风（今陕西凤翔）、隃糜（今陕西千阳）、延州（今陕西延安）等，宫廷设置掌管笔墨纸封泥的专职官员。在东汉出现墨模，使墨的样式趋于规整。魏晋时期制墨技术进一步提高，松烟墨生产已经日趋成熟，著名书法家韦诞为松烟墨改良作出重要贡献，开以贵重药物制墨先河。南北朝时期河北易州（今河北易县）出产的“易墨”崭露头角，引人注目，以奚氏家族为代表。

隋唐，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书画艺术繁荣，极大地推动制墨业的发展，制墨技术精进，出现专业制墨的作坊，易州奚墨，墨质极佳。

“安史之乱”后，许多制墨工匠逃向江南，易州著名墨工奚超带着儿子奚廷珪来到歙州，继续制墨事业。他们改进了捣松、和胶等方法，完善制墨流程，墨的品质得到提高，南唐后主李煜赐国姓。从此奚超改为李超，奚廷珪改为李廷珪，“李墨”名满天下。皖南歙县、休宁等地逐渐成为制墨业的中心。

宋代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了油烟墨，并在其内加以香料，其墨质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是宋代书画作品流传至今，墨色不变的主要原因。综观中国古代墨文化的发展历史，宋代是一个重要时期。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社会安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统治者以文治国，优待文人，科举制进一步完善，更多的普通人家子弟进入社会上层，激发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文人的目光从疆场转到书斋，从建功立业转到在文学艺术创作研究，这为墨文化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加之各地书院林立，印刷技术突飞猛进，有力地促进了制墨业的发展。

宋代制墨业十分繁荣。墨的消费巨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sup>①</sup>为了满足巨大的消费需求，制墨的原料松树被大量砍伐，也正是因为墨源严重枯竭的现实，使得沈括提出以石油烧烟的科学见解。他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下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sup>②</sup>由此油烟墨诞生。宋代制墨从业人员众多，名家辈出。宋代制墨名家见诸史册的多达一百余人，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沈珪、叶茂实最具代表性。他们在选料、配方、烧制、用胶、捣杵等各个环节的工艺上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制墨范例。文人墨客与

制墨工匠有密切的交往，他们互磋技艺，甚至文人亲自制墨，在社会上形成文人爱墨藏墨、以墨为交往的社会风尚，提高了墨文化的艺术品位。苏轼是宋代对墨文化发展非常重要的文人之一。

苏轼诗文、书法、绘画，成就非凡，影响深远。他带领宋代文学完成改革，他的书法成就非凡，是“宋四家”之首，用墨丰腴是他的书法特色之一；他提倡文人画，注重绘画的表达思想内容，为中国传统书画注入文化意蕴，提高传统绘画的品质，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繁荣。他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都离不开优质的墨，因此他对墨文化给予特别的关注，非常自然。

## 二

东坡与墨，可以说是互相成就的。苏轼的文学艺术创作离不开墨，质量上乘的墨，使得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苏轼的墨宝。东坡爱墨，对墨有着较深的研究，他在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制墨心得和鉴墨体会，而且在这些有关东坡与墨的故事中，也蕴含丰富内涵：记录有个性的制墨名家故事、墨的品鉴收藏、文人藏墨的社会风尚、东坡的反思以及从这些故事中得到的人生感悟等，记录这些丰富内容的诗文作品是中国墨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了解宋代墨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可以说苏轼对宋代乃至后世墨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意义重大。

### （一）名墨名家

宋代制墨的名家辈出，潘谷、李承晏、吴滋、戴彦衡、沈珪、叶茂实最具代表性。他们在前人制墨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实践创新，改进制墨工艺，规范制墨流程，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制墨范例。苏轼关注墨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高度赞扬墨工精湛的制墨技艺，记载他们的奇闻异事，这些记载生动，可爱，颇具人文意味。

#### 李廷珪、承晏墨

李廷珪，易州人，奚姓，制墨世家，五代时期随父奚超来到歙州，改进了捣松、和胶等方法，完善制墨流程，所造之墨在品质上超过了易州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赐国姓。从此改姓李，“李墨”被誉为“天下第一品”。宋乾德五年(967)廷珪去世。宋太祖以后，廷珪墨，成为贡墨，普通人很难买到李墨，庆历年间，一枚廷珪墨，卖到一万钱。

在苏轼生活的时代，常有以假乱真者：

吾蓄墨多矣，其间数丸，云是廷珪造。虽形色异众，然岁久墨之乱真者多，皆疑而未决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医者庞安时愈之，不敢取一钱，独求此墨，已而传遗余，求书数幅而已。安时，蕲水人，术学造妙而有贤行，大类蜀人单骧。善疗奇疾。字安常。知古今，删录张仲景已后《伤寒论》，极精审，其疗伤寒，盖万全者也。——《书庞安时见遗廷珪墨》③

苏轼对廷珪墨非常谨慎，因为珍贵，市场上以假乱真的非常多。从行文看，先交代自己藏有“云是廷珪造”墨，自己因为年代久远，不敢断定真伪。接下来叙述此墨来历，曲折有趣，其中人物蕲水庞安时、蜀人单骧，皆有个性，非同寻常。苏轼虽然不能断定，但倾向为真。涉及故乡之高士，不免话密。

余为鳧绎颜先生作集引，其子复长道以李廷珪墨见遗，形制绝类此墨，以金涂龙及铭，云：“李宪臣所蓄赐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书李宪臣藏墨》④

客观记录自己为颜太初诗集作序，其子以李廷珪墨酬谢。描写墨的形制，文字是李宪臣收藏的御赐墨。全文只是客观记载，没有给出结论。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许人磨。或戏之云：“子不磨墨，墨当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无恙，可以为好事者之戒。——《书石昌言爱墨》⑤

石昌言爱墨，收藏珍贵的廷珪墨，一直不用。现在，昌言已经离世多年，而墨依旧，以此告诫后人。

苏轼还有文《临筭笞图并题》⑥：

石室先生戏墨，苏轼临。是日试廷珪墨。元祐元年十月廿三日。

元祐元年(1086)十月十三日，苏轼临摹石室先生的游戏制作——《筭笞图》，并试墨，名家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数寸，仆望见，知其为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乌之雌雄，其知之者如乌、鹄也。——《书廷珪墨》⑦

也是廷珪墨的真伪，数寸，极言珍贵。苏轼一望便知为廷珪所造。后面的比喻非常形象，有趣，难者不会，如同辨别乌鸦雌雄，会者不难，能分辨乌和鹄的差别。因为看得多，亲自试用，如在《试

东野暉墨》中提到“世言蜀中冷金笺最宜为墨，非也。惟此纸难为墨。尝以此纸试墨，惟李廷珪乃黑”，苏轼亲自在蜀中最难为墨的冷金笺上试廷珪墨，其他墨皆不黑，可见其质量精良。加之不断总结，苏轼已经成为鉴定廷珪墨真伪的高手。

李廷珪的侄儿李承晏，继承并发展了先人的制墨技艺。承晏墨制作精良。同样也有仿作的情况。

苏轼也有诗《谢宋汉杰惠李承晏墨》<sup>⑤</sup>盛赞承晏墨：

老松烧尽结轻花，妙法来从北李家。

翠色冷光何所似，墙东鬓发堕寒鸦。

言及中国墨文化史中的易州墨工南迁，承晏先祖从北方迁至南方，承晏墨如东家妇人黑油油的头发，连乌鸦亦要惭愧毛色不如而从天上掉下来，生动形象，极言其质量上乘。

苏轼对当时的制墨和市场情况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时下墨工所制墨不及张、李，而吴子野自言所藏墨来历，是李承晏墨真品，苏轼对此有自己的想法：

近时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然皆不逮张李古剂，独二谷乱真，盖亦窃取其形制而已。吴子野出此墨，云是孙准所遗，李承晏真物也，当以色考之，仍以数品比较，乃定真伪耳。绍圣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书。——《书李承晏墨》<sup>⑥</sup>

苏轼文中涉及的是时人模仿名墨，墨辨真伪问题。从此可见，承晏墨的名气。

### 潘谷墨

潘谷是苏轼情有独钟的制墨名家。潘谷是宋代著名的墨工，宋元祐歙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一生制墨，制有“松梵”、“狻猊”等。苏轼对潘谷之墨推崇备至。多次在诗文中提及。

元丰七年（1084）八月，苏轼自黄州赴汝途经润洲（今江苏镇江）时就曾写诗《赠潘谷》<sup>⑦</sup>向潘谷求墨：

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市人。

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

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

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

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媿妍。

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

在诗中，苏轼将潘谷和潘岳对比，极推崇潘谷的高洁人品。接着发出感叹：世人“重耳轻目”，

使唐末五代的墨工张遇、李廷珪“争媿妍”，以“墨仙”称之。

又《孙莘老寄墨四首》<sup>⑧</sup>之一云：

徂徕无老松，易水无良工。

珍材取乐浪，妙手惟潘翁。

鱼胞熟万杵，犀角盘双龙。

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

蓬莱春昼永，玉殿明房栊。

金笺洒飞白，瑞雾索长虹。

遥怜醉常侍，一笑开天容。

（诗中自注：“潘谷作墨，杂用高丽煤。”）

潘翁制墨，取材“乐浪”，汉武帝元封元年置郡乐浪，治所即今朝鲜平壤。制作工艺：“熟万杵”，据宋代李孝美《墨谱法式》：用好醇媒干捣，用细绢于缸中，每和胶物，拌搜至匀，下铁臼中，宁干勿湿；墨色如犀角状暗黑；“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遥怜醉常侍，一笑开天容”。此以常侍比孙莘老。诗中苏东坡对制墨历史进行介绍并总结制墨经验：首先要用好松烟，鱼胞胶“熟万杵”。

潘谷墨精良，苏轼曾把潘谷和宫廷、王府的墨工制墨技艺做比较：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此裴言墨也，比常墨差胜，云是与曹王制者，当由物料精好故耶？——《书裴言墨》<sup>⑨</sup>

郭玉，宫中御墨；裴言，曹王府墨工。曹王，神宗之弟赵顼，元丰三年封曹王。赵顼博通群书，工飞白、篆、籀。

绍圣元年（1094）五月，在南都商丘，做《书潘谷墨》<sup>⑩</sup>赠前来送行的好友张元明，全文如下：

卖墨者潘谷，余不识其人，然闻其所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价不二。士或不持钱求墨，不计多少与之。此岂徒然者哉！余尝与诗云：“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钱券焚之，饮酒三日，发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视之，盖跌坐井中，手尚持数珠也。见张元明，言如此。

可见，苏轼元丰七年（1084），并未能见到潘谷。苏轼评价潘谷：“非市井人也”。记潘谷卒前情景：

“盖跌坐井中，手尚持数珠也”。时人以苏轼有句“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赠潘谷》），后潘谷果然落井而亡，以为此诗讖。元代陆友编《墨史》卷中亦载。对李墨和潘谷墨，苏

轼非常关注且有相当研究。从对两家名墨的记载之中，可以看出苏轼本人对墨文化的历史、制墨工艺非常熟悉，对名墨真伪的辨别有自己心得，尤其是对潘谷的描写非常有感情，在苏轼笔下，潘谷的高超技艺、高洁品性和不羁性格让人印象深刻。

### 其他墨工名墨

除此之外，在宋代还有很多有个性的墨工，他们造的也是墨质量上乘，而且为人可爱。苏轼的诗文中记载了很多名气不及李潘两家的制墨名家和名墨。如：

孙叔静用剑脊墨，极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盖少室间道人也。卖墨，收其赢以起三清殿。墨甚坚而黑，近岁善墨，唯朱觐及此耳。觐，九华人。——《书孙叔静常和墨》<sup>⑭</sup>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孙叔静所用墨——剑脊墨，精妙，剑脊，应该是墨的形状，墨上文字“太室常和”，常和，道人，曾经靠卖墨，盖起三清殿。所造墨，色黑，质坚，后人企及者，只有安徽九华朱觐能达到这样质量。

川僧清悟，遇异人传墨法，新有名。江淮间人，未甚贵之。予与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东罗文麦光纸，作此大字数纸，坚韧异常，可传五六百年，意使清悟托此以不朽也。——《书清悟墨》<sup>⑮</sup>

川僧清悟，并非制墨世家，亦非以墨为生，后来，机缘巧合，得到异人所传授制墨方法，从此有名，可以说是才崭露头角。可是江淮间人，不识其墨的妙处。苏轼和王文甫各得十丸，一试之后，发现质量上乘，可以使得清悟不朽。

徂徕珠子煤，自然有龙麝气，以水调匀，以刀圭服，能已鬲气，除痰饮。专用此一味，阿胶和之，捣数万杵，即为妙墨，不俟余法也。陈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谓之黑龙髓，后人盗用其名，非也。——《书徂徕煤墨》<sup>⑯</sup>

再如苏浩然墨，苏轼在文章中也提及，其为今时士大夫多贵，本用高丽煤杂远烟作之，高丽墨若独使，如研土炭耳。

这些文字灵动，有趣，甚至有些奇诡在其中，但是非常耐读。宋代制墨，除了专业墨工，僧人、道士、文人都参与其中，除了考究的质量，其中的奇闻异事也非常有趣。文人制墨，不是个别的现象，苏轼及朋友都热衷亲自造墨，有丰富的制墨经验。

### （二）制墨实践

“古人用墨，多自制造”，苏轼在制墨上有足够的热情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亲自制墨，总结经验，颇有心得。

凡烟皆黑，何独油烟为墨则白，盖松烟取远，油烟取近，故为焰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才积便扫，以为墨皆黑，殆过于松煤，但调不得法，不为佳墨，然则非烟之罪也。——《书所造油烟墨》<sup>⑰</sup>

己卯腊月二十三日，墨灶火大发，几焚屋，救灭，遂罢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著书用，仍以遗人，所不知者何人也。余松明一车，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纸。——《记海南作墨》<sup>⑱</sup>

第一则“书所造油烟墨”，与整个墨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之前主要使用使用松烟为原料制墨，油烟墨基本是在宋代才有。因为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墨的需求不断增加，致使松树大量砍伐，制墨原料严重枯竭。沈括《梦溪笔谈》中提出石油烧烟的见解。在松木资源大量减少，用墨需求又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于是一种新的制墨原料油烟应运而生。

第二则是苏轼记在海南做墨的惊险经历。海南制墨的原料丰富，《书海南墨》此墨吾在海南亲作，其墨与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择也。做出的墨与廷珪不相下，苏子自信。

而苏轼还尝试将不同的墨混合，将弃物重新利用，亲自检验新墨的品质，颇有心得，也很有成就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驸马都尉王晋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余品。杂研之，作数十字，以观其色之深浅。若果佳，当捣和为一品，亦当为佳墨。予昔在黄州，邻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谓之雪堂义樽。今又当为雪堂义墨也耶？——《书雪堂义墨》<sup>⑲</sup>

苏轼在黄州时，曾将不同的酒合置一器，谓之雪堂义樽，诗人从酒那里得到的灵感将不同墨混合。这是否为苏轼首创，之后苏浩然借鉴此法，不能确定，但是苏轼的尝试意义重大，不但改良了墨的质量，也变废为宝，使得原本要舍弃的废物，得到重新利用：

余得高丽墨，碎之，杂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剂之为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无弃物

也，在处之如何尔。和墨惟胶当乃佳，胶当而不失清和，乃为难耳。清悟墨胶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脍也。——《书别造高丽墨》<sup>①</sup>

高丽（今朝鲜）的制墨原料非常精良，但是制墨的技术稍差，所以整体上高丽墨质量不高。苏东坡将之与潘谷墨混杂，以清悟和墨法剂之为握子，调配，特别好用。

金华潘衡初来儋耳，起灶作墨，得烟甚丰，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远突宽灶，得烟几减半，而墨乃尔。其印文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皆精者也。常当防墨工盗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胶定，当不减李廷珪、张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书潘衡墨》<sup>②</sup>

被贬海南的苏轼，将制墨技艺传授与金华潘衡，并制出佳墨。

同样，苏轼也记载了好友王晋卿的制墨情况：

“用黄金丹砂，墨成，价与金等。三衢蔡瑀自烟煤胶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剂有法，甚黑而光，殆不减晋卿。”（《记王晋卿墨》）<sup>③</sup>苏轼好友晁贯之精研合胶之法，并作《墨经》。此外，如黄庭坚、秦少游、陆游等文人也都有制墨经历。

在苏轼所生活的时代，文人对墨文化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文人除了是墨的主要消费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参加到制墨业之中，他们亲自制墨，在制墨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摸索，改进工艺，偶尔的灵光一闪为制墨提供非常重要的改良方法。文人参与制墨，促进了制墨业的发展，为墨文化发展注入的人文气息，是宋代墨文化发展的重要特色。

### （三）社会风尚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爱墨，他们造墨，藏墨，品墨，鉴墨，可以说墨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实用功能，是文人交往的重要媒介，深刻影响文人生活甚至是思想。苏轼的诗文对此表现得最充分。苏轼关于墨的诗文基本上都不是单纯的就事论事，除了记叙、描写，苏轼生发的感慨充满智慧。

#### 文人藏墨

自古文人爱墨，早在魏晋时期，曹操即藏石墨，如苏轼在《书沈存中石墨》<sup>④</sup>中说：

陆士衡与士龙书云：“登铜雀台，得曹公所藏石墨数瓮，今分寄一螺。”

陆机书信叙墨来历，石墨，本为曹操所藏，藏在铜雀台，墨数量多，质量上乘，赠送陆云。宋代，

司马光爱墨，藏墨颇丰。苏轼也有藏墨，且数量不少。李之仪《跋苏轼孙莘老寄墨诗》说坡公尤喜墨，“蓄墨最富，多精品”。苏轼也在文中提到自己的藏墨：

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自是人不会事也。——《书墨》<sup>⑤</sup>

苏轼藏墨数百挺，可是佳品少之又少。并由此引发对世人“不会事”的思考。

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记李鲁直墨》<sup>⑥</sup>

苏门弟子黄庭坚，学习苏轼书法，名噪当时。这段文字里记载了当时人们求书情况：以盛有精纸妙墨的古锦囊求书。一次苏轼正遇上，从囊中得到半挺李承晏墨。黄庭坚感慨，求书人不懂自己家宝贝。苏轼夺此墨。这则故事文字简洁，内容丰富，社会风尚，人物性格，一一再现。苏轼的“夺”墨，还比较温柔，而且是从自己学生那儿“夺”，易接受。苏轼好友李公择，“见墨辄夺”就有些极端。苏轼在《书李公择墨蔽》<sup>⑦</sup>中记载了他的行为：

李公择见墨辄夺，相知间抄取殆遍。近有人从梁、许来，云：“悬墨满室。”此亦通人之蔽也。余尝有诗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语殆可凄然云。

李公择是与苏轼过往甚密的好友，两人多有书信诗文往来，朋友的极端的行为，让苏轼反思，“非人磨墨墨磨人”，应该说是非常中肯、客观。李公择是苏轼好友，两人书信往来密切。李亦曾惠赠佳墨给苏轼：

李公择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张力刚”，岂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丽使者。其墨鲜光而净，岂减李廷珪父子乎？试复观之。劝君不好书，而自论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辈同之，可以一笑。——《记李公择惠墨》<sup>⑧</sup>

对藏墨，两人也有过交流，“劝君不好书，而自论墨拳拳如此”，苏轼将好友看成自己的镜子。爱墨藏墨最痴迷者，或者数这位吕希彦：

吕希彦行甫，相门子，行义有过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戏之为墨颠。

功甫亦与之善，出其所遗墨，作此数字。——

《书吕行甫墨颠》<sup>②9</sup>

苏轼不到五十字，似乎是这位“墨颠”的传记。虽是士大夫的“戏”言，但苏轼在字里行间却有敬意。

冯当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铭云“枢庭东阁”，此墨是也。阮孚云：“一生当着几量（緡）屐。”仆云：“不知当用几丸墨。”人常惜墨不磨，终当为墨所磨。——《书冯当世墨》<sup>②9</sup>

这是对收藏现象的一种思考，收藏给人们带来满足，价值，但是对收藏目的要有清醒认识。从这些记载中，苏轼其实一直试图保持对收藏墨的一种清醒，时刻反思自己。

### 文人赠墨

文人皆爱墨，佳墨难得，在文人交往中，墨成为最受欢迎的礼物之一，很自然。墨在文人的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在诗文中反映了当时的这一社会风尚。如怀民所赠的两枚“清烟煤法墨”，苏轼非常喜欢。

怀民遗仆二枚，其阳云“清烟煤法墨”，其阴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书以报之。——《书怀民所遗墨》<sup>③0</sup>

再如李方叔亦曾赠墨：

李方叔遗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气袭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阴平，得麝数十脐，皆尽之于墨。虽近岁贵人造墨，亦未有用尔许麝也。——《记李方叔惠墨》<sup>③1</sup>

李方叔惠墨，量多，达二十八丸，皆麝，珍贵。麝的来历，最近人们造墨用麝情况，也做了介绍。

苏轼在《谢人送墨》<sup>③2</sup>诗中也表达对得到好墨的感激：

墨月黥云脱太清，海风吹上笔头轻。

琐窗冷透芙蓉碧，定有新明到九成。

苏轼同样也以墨赠友，并作《书张遇潘谷墨》<sup>③3</sup>：

麝香张遇墨两丸，或自内廷得之以见遗，藏之久矣。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仿佛，请珍之！请珍之！又大小八九，此潘谷与一贵人造者，谷既死，不可复得，宜宝秘也。

苏轼被贬黄州，王禹锡即王十六秀才相从三年。苏轼将珍爱的潘谷墨赠送王禹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 品评鉴赏

正是因为制墨工艺的不断进步，文人广泛参与制墨实践，书画艺术的发展，这些为品鉴墨提供物质基础，使得墨的品评鉴赏成为可能。一般来说，制墨工匠对墨的辨别品鉴非常高明。如潘谷，他不但精于制墨，而且善于辨墨，凡墨只要经过他手一摸，便知精粗。宋何蘧《墨记》卷上记载，一次黄山谷将自己所藏之墨，请他鉴定，他着墨囊一触，便告诉山谷说：此李承晏之软剂，今不易得。又拿一囊说，此谷二十年前造者，今精力不及，无此墨也。黄山谷取出一看，果然如此。<sup>③4</sup>

苏轼无疑是鉴墨的行家，在前面“李墨”部分提到过，不再赘述。苏轼还对墨的优劣提出自己的见解。如：

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弃物。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书怀民所遗墨》<sup>③5</sup>

苏轼对世人论墨贵“黑”的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黑”、“光”两者要兼得，而且“光”的标准“清”而不浮，以小孩儿的眼睛作比。以此论墨的见地写信给怀民作为回报。

除了对墨的质量优劣标准提出见解，还将“墨”与“茶”对比生发议论。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则反是。然墨磨隔宿则色暗，茶碾过日则香减，颇相似也。茶以新为贵，墨以古为佳，又相反矣。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谟老病不能饮，则烹而玩之。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书，则时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发来者之一笑也。——《书茶墨相反》<sup>③6</sup>

茶、墨有相似之处，隔夜皆差。相反之处稍多：所尚颜色、新旧、感官。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饮，仍要烹而玩之；“墨颠”却不能书，而时时磨墨小啜之。两人都可谓奇人。茶、墨与他物有何不同而能使人痴迷如此？苏轼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司马温公尝曰：“茶与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谓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

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实无以异。”公笑以为足。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谦出奇茗如玉雪。适会三衢蔡熙之子瑄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转颠倒，未知孰是？大众一笑而去。——《记温公论茶墨》<sup>⑦</sup>

司马光也是爱墨懂墨之人，与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品茗，品墨，苏轼为我们描写文人宴游细节。苏轼解读茶、墨相同相通之处，大家以为是。笑，是会心，不会心？苏轼文字非常可爱。

苏轼为我们留下了了解宋代社会墨文化发展的诸多线索。苏轼面对墨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苏轼是深受墨文化影响的一员，他与一般的文人墨客一样，爱墨、藏墨，以墨为交往的重要媒介，他在长期的实践中对墨的优劣、名墨真伪有自己的心得。同时，苏轼也对文人嗜墨的社会现象进行自我反思，他在《书求墨》文中云：“阮生云：‘未知一生当着几緉屐。’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取不已，不近愚耶？”<sup>⑧</sup>而在“藏墨”部分所举的例子，除了记录现象、描写细节之外，也都有自己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思考在内。苏轼也对墨的操行、品德进行总结，将墨比贤人君子，极力推崇，这是专业制墨工匠所不及处。

另外，苏轼关于墨文化的诗文还涉及北宋时期与新罗等国的文化交流。如新罗墨、“阳岩镇造”的北虜墨、“文公桧齧臍”墨。墨除了书写，还可以用来制作漆器，苏轼的文中亦有涉及，而这样的妙方是苏轼亲自实践总结的。

### 三

苏轼有关墨文化的诗文生动，耐读，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但是出色的小品文，同时也是反映宋代墨文化发展的珍贵文献资料。通过这些简洁生动、充满智慧的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宋代高超的制墨技艺、制墨名家的品行风度、奇闻异事，更可以细致了解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和交往。苏轼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为我们描摹了文人的生活细节。苏轼有感而发的这些短文，色彩斑斓，有得意，有喜悦，有调侃，有揶揄，有尊

崇，有羡慕，有严肃，有担忧，有遗憾，有反省……可以说苏轼既参与其中，享受墨所带来的便利和精神享受，同时也关注这与书写密切相关的载体对整个文人圈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情况，人们对墨的喜爱甚至痴爱的现象进行反思，升华出人生的感悟。这是宋代文人理性精神的体现。

重读这些文字，我们不禁艳羡当时文人的生活状态：悠然，自得，天真，执著，从容，全息参与，细致耐心，……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最缺乏的。或者大家会说时代不同，当时宋代优待文官优待文人，文人生活无后顾之忧，当然有闲情逸致去亲自体验各种事物，这也许是最根本的，但是颠沛流离的苏轼能在自然物质条件非常简陋的情况下保持这样的状态，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也不是简单的生活无忧所能概括。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想如果通过阅读这些文字，了解当时文人的生活状态，反观我们现在被简化的、粗糙的、干瘪的生活，思考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温润、诗情画意都去了哪儿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娱乐是什么时候被截然分开的，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快乐吗，我们还要一直这样吗，我们该怎么改变，这是更重要的。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也不可能抛却现在的科技，如何能自得是一个重要课题。苏轼的文章或者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总之，苏轼在中国墨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爱墨藏墨，亲自制墨，与墨工频繁交往，品墨鉴墨，颇有心得，整体提高了墨文化的艺术品味。

#### 注释：

①② 沈括著《梦溪笔谈》，广陵书局2003年版。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㉜①③③③③③③③ 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23、2223、2224、2573、2226、2228、2228、2228、2230、2222、2221、2224、2229、2225、2224、2229、2230、2224、2221、2226、2223、2222、2223、2225、2225、2222、2222、2225、2227、2227、2225页。

⑤⑩⑩⑩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79、1276、1319、2786页。

⑭ 据何莲《墨记》卷上

（刘晓凤，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研究学刊》编辑）



# 苏轼笔记文之我见

许植基

**内容提要** 苏轼的小品文大多随性而录，毫无讳饰，最真实流露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人格、性情修养。本文探索了苏轼笔记文的叙事特色和议论特点。

**关键词** 苏轼笔记 叙事特色 议论特点

笔记，指用散文所写、不拘体例、随笔而录的杂谈、琐语、见闻、札记等文字。它萌于先秦，至宋代达空前繁荣，宋文人把信笔而书的笔记作为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闲情杂感的流行的文体工具。

苏轼的诗词是宋代诗词的代表和顶峰，他也写了大量的笔记，他的笔记（小品文）大多随兴而录，毫无讳饰，最真实流露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人格、性情修养，一如他的诗词，反映出他经世济民的情怀，刚直的道德情操，超然自适的生活态度，知天乐命，幽默诙谐的性格。对后世的笔记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是东坡重要的笔记著作，但因《志林》编订在东坡死后，存在编次窜误，且有伪作，因此古今学者，争议颇多，版本的研究多矣。本文仅从北京燕山出版社《苏东坡全集》中记人记事的笔记为底本，探索苏轼笔记文的叙事特色和议论特点。

## 一、叙事特色

### （一）完整的故事，流畅的情节

苏轼的志人志怪记事的笔记小品，以人物为中心，叙说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其情节或简洁、或曲折、或平淡、或惊奇、或虚或实、或丰或约、或梦幻、或朴实。其语言如行云流水，了无阻碍，用今天的话说，可读性很强。读后引起深思：这则故事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富彦国在青社，河北大饥，民争归之。有夫妇襁负一子，未几，迫于饥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岁定归乡，过此冢，欲收其骨，则儿尚活，肥健愈于未弃时。见父母，匍匐来就。视冢中空无有，唯有一窍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车轮，气咻咻然出穴中。意儿在冢中常呼吸此气，故能不食而健。自尔遂不食，年六七岁，肌理如玉。其父抱儿来京师，以求小儿医张荆筐，张曰：“物之有灵者能蛰，燕蛇虾蟆之类是也。能蛰则能不食，不食则寿，此千岁虾蟆也。法不当与药，若听其不食不娶，长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张与予言，盖嘉祐六年。——《空冢小儿》①

这是一则神魔化的现实故事，虽喜剧结果实辛酸无比，逃荒中无奈弃儿，儿竟得千岁蟆庇护，非但活下来还得道，生活中不可能的，却反映了民众的愿望。故事完整而情节生动，苏轼要告诉听众什么？文本没有说，但听众从故事中领悟了，大灾之年，大饥之时，父母无奈弃儿，却有神秘的大蟾蜍救儿，人性不如兽情。为何？人们不难揣摩东坡心意。

幸思顺，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酤酒江州，人无贤愚，皆喜之。时劫江贼方炽，有一官人舣舟酒垆下，偶与思顺往来相善，思顺以酒十壶饷之。已而被劫于蕲、黄间，群盗饮此酒，惊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识其意，即给曰：“仆与幸秀才亲旧。”贼相顾，叹曰：“吾侪何为劫幸老所亲哉？”敛所劫还之，且戒曰：“见幸慎勿言。”思顺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盖尝啖物而不饮水云。——《幸思顺服盗》②

一则现实中的老儒生故事，情节极简单，

侧面描写生动地展示了老儒生的威望。

戊寅十月，予在儋耳，闻城西民处子病死，两日复生。予与进士何旻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帘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姬，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士识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飧及钱数千，云：“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遗门者，乃持饭入门去。系者皆争取其饭，僧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擎跽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送还。”送者以手擘墙壁，使过，复见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跃，处子惊而寤。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者耶？书之以为世戒。——《处子再生》③

这一则记录一女子误被捉到阴间又复生的故事，是浓缩的短篇小说，情节生动细腻，叙述清晰而有条理，层次井然，从容不迫。虽是意在宣传因果报应、与人为善的佛家思想，倒也切合苏轼历经折磨又步入暮年的心境。

## （二）生动的细节，传神的语言

苏轼的笔记能吸引读者，还在于生动传神、妥贴入微的细节描写。说妥贴，指细节描写和故事、情节浑为一体，自然而然体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这在以往的文人笔记中，是很少有的，以往文人的笔记，叙事记人都比较粗略疏阔，至东坡，加进了文学元素，因而笔记的文本虽然短小精悍，但时时露出生动描写的闪光点，开中国小说之先河。东坡的粉丝、明代小品大家袁宏道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答蔡观察元履》④）诚哉，斯言。

方李宪用事时，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孙路至为执袍带。王中正盛时，愈充至令妻执板而歌，以侑中正饮。若此类，不可胜数。而彭孙本以劫盗招出，气凌公卿。韩持国至诣其第，出妓饮酒，酒酣，慢持国。持国不敢对。然尝为李宪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宪以足踏其头，

曰：“奴谄我不太甚乎？”——《彭孙谄李宪》⑤

彭孙的奴颜婢膝，李宪的张狂嚣张，莫不跃然纸上。

（陈太初）反坐于戟门下，遂寂。师道（太守）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骂曰：

“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跌坐而逝。——《陈太初尸解》⑥道士和士卒的细节、对话，惟妙惟肖。

子瞻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脍。子瞻欲听之，而口不可。曰：“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子瞻不能决。口谓眼曰：“他日我啗，汝视物，吾不禁也。”——《口目相语》⑦

这是典型的苏式幽默，风趣中求乐观，患难间寻快乐。

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糙米适尽，乃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样二红饭也。”——《二红饭》⑧

生活的困顿挡不住乐观情绪，小儿女的抱怨，老妻的调侃，细节煞是可爱。

法颖沙弥，参寥子之法孙也。七八岁，事师如成人。上元夜，予作乐于寺，颖坐一夫肩上。予谓曰：“出家儿亦看灯耶？”颖愀然变色，若无所容，啼呼求去。自尔不复出嬉游。——《法颖》⑨

寥寥几言，精选细节，动态的变化的神态，一个活泼的又学成人样子的小和尚就站在我们面前。

## （三）融合了动作、语言、心理、神态、景物等描写手法

苏轼的笔记，在写人状物时，应用了各种描写手法：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神态描写、景物描写。拓宽并且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表现手法。

苏台定慧院净人卓契顺，不远数千里，涉岭海，候无恙于东坡。东坡问：“将什么

土物来？”顺展两手。坡云：“可惜许数千里空手来。”顺作担势，缓步而去。——《记卓契顺答问》⑩

对话口语化，至900多年后的今人读之，仍觉新鲜。寺院俗人用手势和肢体动作作答，极尽佛学奥妙。

眉之彭山进士宋筹者，与故参知政事孙抃梦得同赴举。至华阴，大雪。天未明，过华山。有牌堠云“毛女峰”者，见一老姬坐堠下，鬓如雪而无寒色。时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从来，雪中亦无足迹。与宋相去数百步，宋先过之，未怪其异，而莫之顾。独孙留连与语，有数百钱挂鞍，尽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复还求之，已无所见。是岁，孙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无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华阴老姬》⑪

一个行善得善的故事，短小精致，下笔平淡却寓意深远。景物“雪”烘托了故事的背景和环境，同时也烘托了情节的发展——雪中无足迹却有老姬坐此。“鬓如雪而无寒色”，外貌和神态描写。“未怪其异”和“宋悔”是心理描写。动作描写简洁而生动：老姬“坐”，宋先过，莫之顾，孙留连与语，馈钱，追宋，道其事，宋还求，未遇，动作活泛而连贯。

有道士讲经茅山，听者数百人。中讲，有自外入者，长大丑黑，大骂曰：“道士奴，天正热，聚众造妖何为？”道士起谢曰：“居山养徒，费用匮乏，不得不尔。”骂者怒少解……后数十年，道士复见此人，从一老道士，须发如雪，骑白骡。此人腰插一骡鞭，从其后。道士遥望，叩头，欲从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摇手作惊畏状，去如飞。少顷，不见。——《道士锻铁》⑫

此文外貌描写“长大丑黑”“须发如雪”，简练但富想象力。对话“道士奴，天正热，聚众造妖何为？”口语化，明快有爆发力。动作前后对比，“大骂”何其威风，“摇手作惊畏状”又何其畏惧。

苏轼的诗词，创作了一个个鲜明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文学形象，他的笔记，虽是信手拈来，而且“无意传世，随做随散”⑬但天才诗人的素养和才气，不知不觉潜入了笔记的

创作中，他的笔记文就与众不同了，呈现出形象化特点，为后世的笔记创作斧凿出一条新路。这是苏轼对中国文学史的又一贡献。明代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说：“其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词单语，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这是形象的力量、文学的力量。

北宋的文人好发议论，苏轼是其中翘楚，其诗词、其散文游记和史论文，好发议论，善发议论。其议论风发，汪洋恣肆，卓见绝尘，一泻千里。其门人黄庭坚都觉得其议论往往过头，黄告诫其外甥：“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⑭好骂，实际上是议论。黄庭坚批评不为过，苏轼的才气太高，有时评论人事尖刻、犀利，不留后路。但《宋史·苏轼传》说：“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这说明，苏轼即使好骂、怒骂，也是骂得在理，上得台盘。

但苏轼的状物记人记事的笔记，议论却很持中允和，议论依托于故事，有感而发。他没有“为文而文”的观念，而是感触于中，自然流露，发而为文，议论不枯燥，不空洞，不说教，议论对所记叙描写的事与人，是一个绝妙的评述、概括、点评和补充，语言平淡见功力，平实中见深邃。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二郎侄一首》⑮）如果说，笔记的主体故事是龙身，那么议论就是画龙睛。

## 二、议论特点

### （一）据实而论，不偏不倚

东坡笔记的议论，据实而论，不浮夸，不奉承，有什么就说什么，能说什么就说什么，实事求是。即便记录皇帝的故事，也是实活实说。

温成皇后乳母贾氏，宫中谓之贾婆婆。贾昌朝连结之，谓之姑姑。台谏论其奸，吴春卿欲得其实而不可。近侍有进对者曰：“近日台谏言事，虚实相半，如贾姑姑事，岂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贾氏实曾荐昌朝。”非吾仁祖盛德，岂肯以实话臣下

耶?——《仁祖盛德》⑩

宋太祖赵匡胤确是一代令主,苏轼据实而言,最后议论,没有献谄之意、之言。

元丰初,白马县民有被劫者,畏贼不敢告,投匿名书于县。弓手甲得之,而不识字,以示门子乙。乙为读之,甲以其言捕获贼,而乙争其功。吏以为法禁行匿名书,而贼以此发,不敢处之死,而投匿名者当流,为情轻法重,皆当奏。苏子容为开封府尹,上殿论贼可减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乃杖而抚之。子容以为贼许不干己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过。然先帝犹恐长告讦之风,此可为忠厚之至。然熙宁、元丰之间,每立一法,如手实、禁盐牛皮之类,皆立重赏以许告捕者。此当时小人所为,非先帝本意。时范祖禹在坐,曰:“当书之《实录》。”——《神宗恶告讦》⑪

文本叙述了宋神宗惩办投匿名信者的故事,虽然神宗一再贬责苏轼,苏轼还是赞神宗“此可谓忠厚之至”。并说当时乱象,“此当时小人所为,非先帝本意”。议论公允,还神宗本来面目。

苏轼对政治对手,也是宽容多于指责。

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也,则又出一言而解释之。是以其学多说。尝与刘贡父食,辄箸而问曰:“孔子不彻姜食,何也?”贡父曰:“《本草》,生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彻姜食,将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戏也。”贡父虽戏言,然王氏之学实大类此。——《刘贡父戏介甫》⑫

文本记录了刘攽(字贡父)戏弄王安石的故事,最后苏轼议论:“以为后世君子一笑。”苏轼从政治到学术,是瞧不起王安石的,王安石在学术上自以为是,反复不定,弄出不少笑话,这是事实,东坡笑话他也是他性格的必然。但并不刻薄,只是文人优越感的反映罢了。

## (二) 依托形象,画龙点睛

苏轼的叙事记人状物笔记的议论,紧紧扣住文本的主体——文本的中心内容,即形象,

阐发对形象的评价和判断,顺势而为,或进一步由此生发深层的感触,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的认识。

余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记游松风亭》⑬

文本的故事很简单,游途疲劳想歇找不到地方时,顿悟,可就地歇。议论的道理也很简单,即使生死关头,也应从容不迫保持好心态,随处可躺下歇歇。由此进一步传递了人生哲学:随遇而安。议论紧扣形象,衬以比喻,极自然,极紧凑,口语化,极亲切。

眉州人任达为余言:少时见人家,畜数百鱼深池中。池以砖甃,四周皆有屋舍,环绕方丈间。凡三十余年,日加长。一日,天晴无雷。池中忽发大声,如风雨,鱼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达云:“旧说,不以神守,则为蛟龙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谓蛟龙必因风雨,疑此鱼圈局三十余年,日有腾拔之意,精神不衰,久而自达,理自然耳。——《池鱼自达》⑭

对于被圈局三十多年的池鱼腾空而去,苏轼和故事讲述人任达有不同看法,任认为是蛟龙所取,苏轼认为,此鱼圈局三十多年,日有腾拔之意,精神不衰,久而自达,理自然耳。苏轼的议论显然高人一等。苏轼议论畅达,立足故事本身,说明只要“精神不衰”,就能“久而自达”,宣传了生命的力量,生命奋发的迸发力、爆发力和持续力。苏轼的积极的进取的议论深化了文本,使文本体现了唯物的色泽。

## (三) 形式多样,长短皆宜

苏轼笔记的议论,形式多样,或直吐胸臆,或委婉言之,或借他人话语,或点到为止,或深入阐发,或洋洋洒洒,或只字片语,或句首引文,或句末押题。莫不精彩纷呈,妙语如珠。

前日见邸报,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为也。近得其侄伯禄书云,景仁上殿,为定大乐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荐于乐,则新法果便也?

杨子云言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征诸生于齐、鲁，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观之，扬雄之言，可谓谬矣。——《范景仁定乐上殿》①

范镇（字景仁）是苏轼的挚友，本以反对新法而去职，现竟以新法大功告成而自荐大乐，苏轼当然不解和不满，但他没有直接批评年长二十多岁的老朋友不甘寂寞，而是引用扬雄评说西汉初孙叔通定礼仪召诸生，漏掉了两个人的典故，说扬雄谬矣。这是曲笔，扬雄错在什么地方？所漏者多矣，范景仁就是怕以后在历史上不能留下名字，现实政治上冷寂而阿附新党，东坡不忍、不肯直接批评老友，委婉言之，但不满之情，难以自禁。

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延庆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予始至，问民疾苦，遂首罢之。万花会，本洛阳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意洛阳之会，亦必为民害也，会当有罢之者。钱惟演为洛守，始置驿贡花，识者鄙之。此官妾爱君之意也。蔡君谟（即蔡襄）始加法造小团茶贡之。富彦国（即富弼）曰：“君谟乃为此耶？”——《以乐害民》②

苏轼以民之疾苦为己之疾苦，所以他刚在扬州上任，即罢了前守扰民的万花会，议论其“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又记述富弼对蔡襄以前所为的批评：“君谟乃为此耶”，明里批评蔡襄，暗里对衬批评前太守。引别人语言，对衬、对比，表达或深化自己的思想，也是苏轼发议论的一种方式。③

蔡京（1047～1120）字元长，北宋奸臣，曾在苏轼任扬州太守（元祐七年三月至八月）之前任扬州太守，大概是元祐初、中期，（蔡京在元祐元年知成德军，历知瀛州、扬州、郢州、永兴军、成都府。绍圣初回京任户部尚书。）蔡京任扬州太守时，仿洛阳牡丹万花会，作扬州芍药万花会，劳民伤财，民怨沸腾，离职后，此习尚存。苏轼上任后体恤民情，罢之。

为什么会错，可能是伪作，可能流传中，名字抄错，也可能苏轼有意写错。因蔡京是陷害苏轼的主事人之一，苏写此文时，蔡京气焰方炽，苏轼为避锋芒，故意犯低级错误，移花

接木以讽之。

蜀人张宗谔永徽，年六十七，须发不甚白，而精爽紧健，超逸涧谷，上下如飞，此必有所得。相逢数日，但饮酒啸歌而已，恨不欵曲问其所行。方罢官归阳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间人也。——《张永徽老健》④

对一个不同凡俗老英雄，苏轼用“非世俗间人也”来议论、评价他，言简意赅，一句话到位，平实、通俗又是深得其精粹。

盛度，钱氏婿，而不喜惟演，盖邪正不相入也。——《盛度责钱惟演语词》⑤  
开首“盖邪正不相入”是议论，总领下文。

王巩云：“张安道向渠说，予瞻比吾孔北海、诸葛孔明。孔明则吾岂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蠢也。”吾谓北海以忠义气节冠天下，其势足与曹操相轩轾，决非两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汉室，岂所谓轻于鸿毛者？何名为蠢哉！——《张安道比孔北海》⑥

本篇的议论特别长，从“吾谓”到文末，洋洋洒洒，“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豪放、刚直、忠烈，典型的苏氏议论风格。充分论述了孔融的品质和气节，驳斥了“蠢”的说法。文字铿锵有声，朗爱厂如家于口而受之于心。

苏轼的笔记在苏轼的创作活动中，仅仅是不起眼的支流旁逸，苏轼在主观上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不认为它有多少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也不打算生前公布于众，死后才可出示于人。黄庭坚说：“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手泽囊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⑦东坡是随机随性，无意而为，信笔写来，类似后代的文人日记。但是，就是这些不入流的笔记小品，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随性的、率性的苏东坡。

整个东坡笔记，涵量极广，有史评，有医学，有生活常识，有杂著，有题跋，有杂记，对后代的散文创作和小说创作影响极大。本文就以记事记人的极小角度，开一个小口，分析东坡笔记中微小说的形象和议论的特点，研究它们对后代笔记和小说创作的影响力。

我们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看到了苏东坡。

甚至从《红楼梦》中，也看到了东坡的影子。

#### 注释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㉔ 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6、2310、2324、2284、2322、2383、2380、2302、2303、2308、2319、2523、2281、2283、2292、2271、2309、2287、2293、2294、2289、2292页。

④ 《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45页。

⑤ 《全宋笔记》（第一编），孔凡礼《仇池笔记点校说明》，第187页。

⑥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黄庭坚《答洪驹父书》，第87页。

⑦ 作者按：这则史料有误，蔡延庆应为蔡京。蔡延庆（1028～1090），字仲远，北宋名臣蔡齐的侄子，中过进士，以文人参与抗击西夏的军务，守边多年，有谋略，有战功，从未在扬州任职，后在京城任职。官声不错。（资料见《宋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四十五》）

⑧ 转引自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黄庭坚《豫章集·卷二九·跋东坡叙英皇事帖》，第919页。

（许植基，中国苏轼研究会会员）

#### （上接第28页）

“独觉”者，就是在似醉非醉中感悟了人生的底蕴——欲望是生命的陷阱，贪婪是心智的沉沦，什么荣华富贵，什么功名利禄，无非过眼烟云，炫人梦幻！东坡的可爱与不朽，就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察得失，知进退，想得开，放得下，不悲观厌世，又及时了却生死荣辱，破除痴迷诱惑，在厄运中让心智淬炼，在苦难中让灵魂净化，大劫大难面前从容淡定、随缘自适：“先生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菜羹赋》）把握当下，快乐逍遥，夫复何求？当东

坡消弭了贪欲、奢求、浮躁，也就有了制服厄运、困穷、忧惧的力量，终于等到沉冤昭雪、渡海北归的一天，谱写了一曲“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生命凯歌。

以上，我们概述了苏东坡诗酒人生的五种境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人们常说文品出于人品，酒品何尝不出于人品？苏东坡说过：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他好酒而不酗酒，把盏而非贪杯，“吾中了然”，视酒为一种添乐趣、增情谊、安精神、祛烦恼、获智慧、得灵感、延年寿的生活伴侣，把饮酒提升到人生恬情的、审美的、文化的层次。事实上，苏东坡一生都在入世和出世中纠结，在顺境和逆境中挣扎，在现实和虚幻中徜徉，所以，他的“为醉为醒”中寄寓着生平际遇、个性志趣、悲欢离合，乃至时代的风云变幻。酒随境迁，诗伴心变，或以开朗、愉悦的心境，在山川美景中慢斟浅酌，风流潇洒；或以真诚、爽直的情致，在亲朋聚会中开怀畅饮，典雅超群；或对酒酣歌，慷慨激越，抒写一腔赤诚和抱负；或借酒浇愁，如泣如诉，倾吐世道的险恶和命运的不公。最终，“期隐身于一醉”，在似醉非醉中悟透天地间的机括和真味，远离尘俗的喧嚣和纷扰，营造不喜不悲、不忮不求、不忧不惧的心灵家园，成就了悠然自得、逍遥快活的诗酒人生。东坡去世前曾回顾一生，自问自答：“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三州乃贬谪之地，何谈政治功业？只能说造化弄人，历史没有给他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而论平生创造的文化功业——包括他的诗酒人生，却是辉耀千秋，万古不朽的！

（王许林，江苏教育出版社编审）

# 苑中《题二苏坟》写作时间补证

胡传志

**内容提要** 苑中《题二苏坟》写作时间，可以通过苑中及随行人员的生平史料，将之确定在金正大二年（1225）秋或正大三年秋。

**关键词** 苏轼 苑中 题二苏坟

金代诗人苑中拜谒河南郑县二苏坟，作《题二苏坟》诗，该诗当时即刻石，现存于郑县三苏园，为少数苏轼研究者和河南郑县学者所关注，却长期未进入金代文史研究范围。清编《全金诗》未收录该诗，清人张金吾《金文最》卷四十七囿于文体，仅收录史学、屈子元所作的题跋，而未收录该诗。今人薛瑞兆等《全金诗》、阎凤梧等《全辽金诗》、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金代文学编年史》、《金诗纪事》、牛贵琥《金代文学编年史》等著作都未论及该诗。郑县档案馆编《三苏坟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收录该诗碑全文，只是将苑中误判为宋人，标点亦间有错误。郑县人称该碑为苑中碑，碑上无立碑时间，后人或认为作于金贞祐年间，或认为作于兴定年间。郑县乔建功等人先后发表《三苏遗迹考略一二》（《苏轼研究》2010年第1期）《三苏园“苑中碑”的时间推断及其历史价值》（《苏轼研究》2014年第3期）等文，广泛搜集材料，逐一考证，将其写作时间确定在金正大二年至正大八年（1225~1231），很有见地，可惜其中也有一些误解。苑中碑及立碑时间，尚有进一步考订的空间，兹论之如次。

为便于阅读，不辞繁赘，现将苑中碑文录之如下：

人知两苏文中龙，不知道配义与忠。  
危言历历诋时政，要观瘴海蛟螭宫。  
归来万里一捧腹，鬓发愈黑气愈充。

死生贵贱皆外物，喜功之辈将安同？  
平生雨夜对床约，霜风吹落孤飞鸿。  
天涯流落两丘土，玉树并掩佳城中。  
举杯三酌不忍去，万叶索索声秋空。

奉政大夫汝州郟城县令兼管勾常平仓事骁骑尉行富枢密院弹压赐绯鱼袋李无党同立石。

正奉大夫京西分治户部接于官待阙同知滑州军州事清河郡开国侯赐紫金鱼袋张秀华同立石。

通奉大夫汝州防御使护军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裴满奕立石。

文以气为主，气以道为囿，极其指归，则无出于忠信仁义而已。此眉山两苏公所以冠千古而独步。少卿先生今日重为两公拈出，世之学者，文不泥华，气不流暴，则然后可以少卿语语之。噫，少卿之心，两公之心，两公之心，则孔之心也。吾辈宜式之。延安史学题。

东坡先生，古今忠义一人而已。其作为文章，见于政事者，故不一而足。无何，道之不行，以命官磨礪，窜居黄冈数年，然后归隐。流离顿挫，处之自若，胸中一点可谓之养浩然者也。后卒于常州，逮迈辈护丧而归，与弟颍滨先生，俱葬于郟城之峨眉，盖平生所欠，今得其死所矣。墓之侧，贤士大夫留诗者甚多，唯司农苑公先生，独以二老所蕴藉，诗人不能形容者，一时书之重吟，二老英魂其有遗恨乎？河中屈子元跋。

针对上文，有以下问题可以探讨：

第一，苑中担任司农少卿的大致时间。史

学和屈子元跋文中所称的“少卿先生”，“司农苑公先生”，即司农少卿苑中，只是二人跋中对苑中官职称谓不够准确。苑中，生平见《中州集》卷七《苑滑州中》：

中字极之，大兴人，承安中进士，累官京西路司农少卿、滑州刺史。好贤乐善，有前辈风流。贞祐中，高琪当国，专以威刑肃物，士大夫被据捩者，笞辱与徒隶等，医家以酒下地龙散，投以蜡丸，则受杖者失痛觉，此方大行于时。极之有戏云：“嚼蜡谁知味最长，一杯卯酒地龙香。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时人传以为笑。极之嗜读书，一以资于诗，诗亦往往可传。壬辰，卒于京师，年五十七。

据此可知苑中的生卒年（1176～1232）以及苑中所任官职是京西路司农少卿。苑中大概何时担任京西司农少卿？考《金史·宣宗本纪》，元光元年（兴定六年，1222）四月，“置大司农司，设大司农卿、少卿、丞，京东、西、南三路置行司，并兼采访事。”又《金史·哀宗本纪》曰：正大元年（1224）十二月，“令京、东、西、南、陕西设大司农司，兼采访公事，京师大司农总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京西路行司农司，后者是京西路司农司。从《中州集》的记载来看，当是后者。因此，苑中担任京西司农少卿的时间上限是正大元年十二月。苑中卒于天兴元年（正大九年），期间他转任滑州刺史，说明他在正大中就已经离任京西司农少卿。

第二，李无党其人。李无党是金代著名县令，名入《金史·循吏传》，却未为他立传。《金史》卷一百二十八《循吏传》卷末称赞包括“郟城李无党”在内的众多“县官”，“皆清慎才敏，极一时之选”，可见李无党以郟城县令而闻名。今考《赵孟頫集》卷八《田氏贤母之碑》，李无党是田氏母李氏之父，庆阳府合水县人，贞祐二年（1214）进士（应为贞祐三年），仕至京东道司农丞，金亡后入宋，卒于河间。《金史》卷一百一十六《石盩女鲁欢传》载，正大九年四月，“罢司农司”，李无党改任“府判”。可见，正大九年四月之前，李无党任京东道司农丞。

第三，汝州防御使裴满奕的在任时间。裴满奕生平无考，他为苑中诗立石，必然与苑中一同拜谒二苏坟，其时间必然是正大元年十二

月之后。考《金史·哀宗本纪》：正大元年正月，“大司农、守汝州防御使李蹊，为太常卿，权参知政事、平章政事。”据此，裴满奕当是李蹊的后任，应在正大元年春到任。郟城为汝州属县。

第四，史学的职务。史学之名，《金文最》脱一字，将“延安史学”误成“延安学”，致使诸多文献沿袭其误，以为延安学是一人名。苑中碑上，史学未署官职。据《中州集》卷八：“学字学优，延安人……正大中省试第一人，释褐舞阳簿，辟卢氏令，卒官。”薛瑞兆《金代科举》将其及第时间定在正大元年（1224），较为可信。据《归潜志》卷二，刘从益去世时，史学“寄挽诗，未几，亦下去。”刘从益死于正大三年五月，据此推测，史学可能卒于正大三四年间。史学释褐舞阳簿，当在正大元年及第之后，改卢氏令当在任满舞阳簿之后，即正大三年之后。史学何时与苑中等人一同去郟城县二苏坟？当是在舞阳簿任上。因为舞阳属许州，郟城属汝州，二州相邻，史学以舞阳簿身份同行，比较方便。而卢氏属于京兆府路虢州，与郟城相距遥远，史学不太可能以卢氏令的身份陪同苑中等人。因此，史学陪同苑中等人的时间当在正大元年至三年之间。

从苑中诗“万叶索索声秋空”一语来看，该诗作于秋天。苑中出任京西路司农少卿最早为正大元年十二月，故此诗最早作于正大二年秋天。鉴于史学于正大三年调任卢氏令，故苑中诗最迟作于正大三年秋天。

（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东坡文化研究上的惰性思维

饶学刚

**内容提要** 东坡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形势大好。然而当今苏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种种惰性思维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和关注。

**关键词** 东坡文化 研究 学风浮躁 陋见偏见 惰性思维

苏东坡非一般历史文化名人。全国许多城市以东坡文化兴市，成立了众多的东坡文化研究会，两年一次的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年会已开过18次，研究东坡文化的报刊及其专栏多达上10种，全国尚属罕见。东坡文化，一直是古今读者、研究者，尤其是当代读者、研究者研究的热门话题。新时期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苏学专家，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诸多体裁的研究专著，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

然而，苏学研究领域亦出现种种不容忽视的现象：有些读者、研究者，读东坡原著不多不深，所写论文，洋洋洒洒，如信天游；有些读者、研究者，步前人或其他人后尘，亦步亦趋，重复课题，缺乏新意；有些读者、研究者，眼高手低，看不起省市一级东坡文化研究期刊学报；有些读者、研究者，为寻求轰动效应，“标新立异”，信口开河……为何出现上述现象？归根结底一句话：东坡文化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学风浮躁，刻舟求剑，陋见偏见，惰性思维。

“三苏研究”专栏类之树，依然有金凤凰筑巢

最近几年，某些省高教战线评定高级职称，评审人首先看被评人是部属院校的，还是省属院校的；再看所发表作品是北京核心期刊的，还是省市一般期刊的；一概不关注被评人的学

识水平，更不考究被评人轰动学术界的新见。如果你送审的是省市一级期刊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三苏研究”专栏的文章，评审人就毫不留情面，煞！刷！杀！这是违背职称评定的初衷的，也是违背职称评审人的良心的。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三篇核心期刊文章似卦符，对于评审人来说，好处多多。不需要费时费力费脑筋去看被评人的参评文章，一卦卜定人家命运。叫你有苦难言，欲哭无泪，公平何在。现在，某些核心期刊看到有利可图了，便降低身价，抬高版面费，也干起为急欲评高级职称者“造福（符）”的生意来。职称申报者无奈，只得以高价买核心版面，加上打通评委关节，便陷入了极不公平的投机大战。随之核心期刊的形象不打自倒了，仅仅成为职称评审人的一只卦符和签文了。

谁都知道：考察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一种刊物的高低水平，是有着它的客观反映和客观依据的，而不是某个人凭主观臆断所能决定的。一部（篇）作品的命运，申报职称人的命运，不是决定于它诞生在什么地区，什么刊物上，而是决定于它是否富有创造性见解，赢得专业领域学者们的赞赏。这是职称评审者所持的重要依据，也是判定东坡文化研究水平的重要尺度。

事实上，一些地方高校学报的专栏，办得有板有眼，不要轻看。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的“三苏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的“柳宗元研究”、《九江学院学报》的“陶渊明研究”、《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东坡文化研究”、《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的“韩愈研究”等专栏。得天独厚、人无我有，其特色和优势，是其它刊物，甚至一流刊物或核心刊物无法克隆的。

它们虽然没有跻身于核心期刊之林，却有意无意地吸引了专业领域海内外金凤凰在这里筑巢。只因为一些密发人情稿、关系稿的核心期刊封闭、高贵、神圣，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令人望而却步。连一流的专家学者都觉得高不可攀，只得把一些高质量的文稿投向有影响力的地方学报专栏。这下可好了。一些地方学报专栏的优秀文章，就自然地被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报道，被权威刊物《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成为国内外闻名遐迩的优秀学报专栏。

就以《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的“三苏研究”专栏来说吧。它非同小可。创办时，由苏学研究专家、学院副院长杨胜宽先生主持，并以个人的名义特邀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做专栏撰稿人。许多优质文稿源源而来。专栏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有声有色。“有声”是指有百家争鸣的声音；“有色”是指一改“论文汇编”的单调面孔为有特色的学术专栏。它完全做到了，成功了。

“专栏”成了名副其实的百家争鸣的平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三苏研究”专栏，斗胆刊登饶晓明《新近发现“东坡诗中词”考辨补正》，论定东坡诗中词40首。在苏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学报展开争鸣，前后发了8篇文章，赞成者有苏学权威孔凡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中华书局编审刘尚荣、盐城师范学院教授王文龙、苏学研究专家韩国强等，反对者有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复旦大学研究生田苗等。吸引了苏学研究名家和词学界的广大同仁的关注和探讨。“‘三苏研究’成为了学术领域一个争鸣的平台，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向深入发展，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学报及特色栏目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有利于该特色栏目后期进一步建设和发展。”<sup>①</sup>

富有学术特色的文章，频频登上《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三苏研究”专栏。朱靖华《“中国旋宫”与质疑“燕乐词源”说——兼论苏轼〈竹枝歌〉可入词集》（2007年第9期）、刘尚荣《亦诗亦词话竹枝》（2006年第1期）、杨胜宽《说苏轼论体散文（苏轼散文分体研究系列）》（2008年第4期）等文章，均是填补东坡文化

研究空白之作。“专栏”雄踞峨眉、乐山人文地理优势，依傍全国庞大学者队伍的支撑，兢兢业业地治理了10多年，刊出了堂堂正正的近100辑、属专业领域上乘的300多篇文章，赢得了广泛赞誉。即是全国所谓一流刊物甚至什么核心刊物也是无法企及的。

为何当今教育、文化、科技、学术界职称评审，那么迷信核心期刊，瞧不起诸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三苏研究”专栏及其文稿？解释只有一个：他们趋炎附势、傲慢自负、陋见偏见、惰性思维。

“东坡因‘侵犯皇权’而遭贬”说，够不上“标新立异”

众所周知：要解读一个人的命运奥妙，首先不能不解剖个人史中的关键事件。读懂了东坡被贬黄州的真正原因，方能识别谪居黄州的东坡真面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清楚表明东坡被贬黄州的真实原因，无须赘述。

东坡因攻击新法、反对改革、侵犯皇权而被贬黄州的观点曾鼓噪过，但到上世纪90年代，这些梁效、罗思鼎们的老调重弹就停息了。然而，未想到本世纪初死灰复燃，又有人胡说东坡是什么保守派、两面派、投机派。某大学“教授”，声称东坡政治保守、反对改革以及打击报复改革者。某学院“粪青”，这个文化流氓对东坡及其家族进行人身攻击，全面否定，影响极其恶劣。他们的目的何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高唱反调，企图博得一个名人轰动效应。可耻、可怜、可悲！正直文人愤起反击，还东坡及其家族以本来面目，坚决维护了苏学的尊严。

无独有偶。我最近翻阅了较多的东坡研究的专著和网载资料。发现他们在谈到东坡为何被贬黄州时，又有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东坡“侵犯皇权”说。其理由不外乎是“乌台诗案”，“东坡攻击新法，反对改革”，“得罪皇上”，被贬黄州。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东坡何时何地侵犯皇权？神宗是怎样治东坡的？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不免有亦步亦趋、拾人牙慧而标新立异之嫌。

我以为“乌台诗案”全是舒亶、李定、何

正臣这些佞臣胡编出来的“莫须有”罪名。以诗定“谤讪朝廷”罪，连神宗皇帝都不点头。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②神宗读了东坡这首忠诚绝笔诗，动了心，表示“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③采取袒护之计，下诏宽释了东坡，“将苏轼编管在黄州”④。“编管”者，宋代官吏得罪，谪放州郡，编入该地户籍，并由地方官吏管束也。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还有太后在神宗面前屡屡求情，也视东坡为先帝遗爱之人。皇上早已在意，将东坡安置到文武官员被贬世袭之地的黄州，黄州离京城开封够近的了，让东坡靠拢自己近一点。

神宗将东坡编管黄州，完全改变了惩罚东坡的性质，东坡命运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东坡心里非常明白皇帝的良苦用心。他在《上黄州谢表》中，一千个谢罪，一万个效忠，想好好地自我表现，突围黄州，再回到朝廷。元丰六年十二月，神宗皇帝很想念还在黄州的东坡。他建议宰相王珪、蔡确安排东坡纂修国史，重新起用。然而，朝廷佞臣们坚决反对，皇帝只好手诏，调以离京城更近州府——汝州安置。就完全佐证了皇帝“不忍终弃”东坡的良苦用心。否则，让舒亶、李定、何正臣等佞臣得逞，即使东坡不被处死，也会削职为民，流放到遥远而荒漠的边疆伊犁或贝加尔湖。怎么能说东坡因“皇权的不可侵犯”而遭贬呢？

为何当今东坡文化研究者甚至是一些学会的领导人，开口东坡“乌台诗案”，闭口东坡“侵犯皇权”呢？解释只有一个：他们急功近利，“标新立异”，东施效颦，惰性思维。

### “东坡黄州词60多首”，老掉牙，太远离前沿

自古以来，“东坡词”，一直是词人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曾出现过四个研究高潮时期。深圳大学教授刘尊明、武汉大学教授王兆鹏认为：“苏东坡高居本世纪宋代词人研究成果排行榜第一名”。“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乃是20世纪东坡词研究的繁荣时期，仅80年代的

10年间，东坡词的研究成果多达909项次，堪称是20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巅峰时期。”⑤

“东坡词”究竟有多少首？“东坡黄州编年词”究竟有多少首？探索了近千年的历程。第一个大胆打破沉寂，做出回答的是一位年青苏学学者饶晓明。他先在权威学报《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三苏研究”专栏发表《新近发现“东坡诗中词”考辨补正》，推出隐藏在苏诗中的亦诗亦词40首，认定“东坡词”400多首；继而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和《中国苏轼研究》上，推出《苏东坡词的创作高峰在黄州》，论定“东坡黄州编年词”突破100首，并对其突破情况作了具体的陈述，直逼东坡词研究前沿，获得了海内外苏学界撰文认可、引用赞许。

然而，不知是出于陈旧思维习惯，不接受推出者的认定，还是没有看到推出者的观点去深入考究，全国一些苏学读者、研究者，尤其黄州的苏学读者、研究者，至今讲话、写文章，仍口口声声称“东坡词300多首，其中黄州词60多首，或70多首”。这是一个老掉了牙的概念。

“东坡词400多首，东坡黄州编年词突破100首”，决不是饶晓明心血来潮，信口开河，而是有着众多客观事实和他独立思考作依据的。

事实胜于雄辩。东坡黄州编年词的不断发现和增多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远的不说，就说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石声淮、唐玲玲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⑥问世，标志着东坡词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其中东坡黄州编年词被认定为65首。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认定词。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东坡词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西北大学教授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⑦、笔者的《东坡黄州词目订正》⑧、河南大学教授邹同庆和河南财经大学教授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⑨的出版，就是这类研究成果的展现。

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中东坡黄州编年词新增21首。经过精心考证的薛本东坡黄州编年词新增篇目，得到了东坡词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且大都被孔凡礼、邹同庆和王宗堂所采纳，分别引入《三苏年谱》⑩、《苏轼词编年校注》和《走近东坡》⑪中。

笔者的《东坡黄州词目订正》中新增东坡黄州编年词 7 首。且在《苏东坡在黄州》中,对部分东坡黄州编年词作了考证,如《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减字木兰花》(江南游女)等。有的被孔凡礼采纳,引入《三苏年谱》中。

邹同庆和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中新增东坡黄州编年词 7 首。《南歌子》(日出西山雨)等三首东坡黄州编年词,最早为日本学者保荇佳昭在上海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并与薛瑞生展开争鸣。《皂罗特髻》(采菱拾翠)作于黄州之说,最早见于刘崇德《苏词编年考》<sup>①</sup>。邹同庆、王宗堂和孔凡礼对此都有新的考证补充。笔者也将它们纳入《走近东坡》中。

饶晓明在参与撰写《苏轼词新释辑评》<sup>②</sup>书稿时,发现东坡的亦诗亦词不少,如《竹枝歌》、《襄阳古乐府》、《黄泥坂词》、《归来引·送王子立归筠州》等,其中就有东坡黄州编年词 4 首。为此,他撰写了专论《新近发现“东坡诗中词”考辨补正》、《苏东坡词的创作高峰在黄州》<sup>③</sup>,得到了孔凡礼、朱靖华、刘尚荣、王文龙、韩国强等赞赏。

上述增补东坡黄州词,历代都有考证评论。《东坡七集》续集、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苏东坡集》、中国书店版《苏东坡全集》、古代学者的校注本,都将它们编入东坡词集、乐府类或歌辞类中。上述增补东坡黄州词,增补者以东坡行实排比、诗词同步、以史证词、按词景观认定、引述他人之见等方法,做了考证,认定东坡黄州编年词确实突破了 100 首。

为何当前一些苏学读者、研究者,至今讲话、写文章,仍老调重弹,津津乐道“东坡词 300 多首,其中黄州词 60 多首,或 70 多首”?解释只有一个:他们固步自封、老调重弹、远离前沿、惰性思维。

上述苏学研究领域种种惰性思维现象,对于苏学读者、研究者尤其一些青年人的学术成长极为不利。高等院校古典文学老师和各地东坡文化研究会领导,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关注。

#### 注释

① 王兴全《重在建设——地方高校学报走特色办刊之路的再探讨》,《编辑之友》2011 年 8 月。

②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予以事系御史台狱……以遗子由,二首》(其一)。

③ 南宋重修《神宗实录》(手诏),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④ 东方龙吟著《万古风流苏东坡》,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⑤ 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6 年 6 月。

⑥ 石声淮、唐玲玲著《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⑦ 薛瑞生著《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⑧ 饶学刚著《苏东坡在黄州》之《东坡黄州词目订正》,京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⑨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⑩ 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⑪ 饶学刚著《走近东坡》,香港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

⑫ 刘崇德《苏词编年考》,《河北大学学报》1984 年 3 月。

⑬ 朱靖华等《苏轼词新释辑评》(上中下),中国书店 2007 年版。

⑭ 饶晓明《苏东坡词的创作高峰在黄州》,《乐山师院学报》2006 年 3 月。

(饶学刚,黄冈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千古绝唱悼亡词

## ——试析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陈慧君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诗歌的大花园里，开得最盛、最美的要数爱情诗。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许多歌颂爱情的诗。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些诗句都流传久远，在民间耳熟能详。

在西方，被柏拉图誉为“第十位缪斯”，古希腊的第一位女诗人萨福，就以炽热的情感用七弦琴弹奏出了爱情的诗篇。

纯洁的爱情如春日般温馨，秋月般澄澈，又像鲜艳的玫瑰一般芳香，美妙的音乐一般沁人心脾。它可以纯洁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前进的勇气，增强人们奋斗的力量。总而言之，纯洁的爱情对人们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正能量。因此，古往今来的诗人，往往以最炽烈的感情，用最动人的词语讴歌爱情。

在历代诗人的诗作中，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表示比比皆是：

《诗经》中的名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现代人的爱情故事中经常被引用。

汉乐府里的古老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对爱情坚贞不渝的表示达到了极致，也常被现代人所称颂。

还有其他许多名诗、名句流传至今：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

……

爱情是美妙的，浪漫的，甜蜜的，令人销魂的。然而，有时也是痛苦的，烦恼的，伤感的，令人肝肠寸断的。最悲痛的莫过于恩爱夫妻中途丧偶，这对于未亡人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悼亡诗词即是抒发这种感情的典范。

后人认为《诗经·唐风·葛生》是悼亡诗之鼻祖。

葛生蒙楚，藟蔓于野。

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藟蔓于域。

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

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

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

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此诗从葛藤丛生的墓地写起，生发出对离世爱人的情思。夫妻双方阴阳分隔，各自独处，倍感孤独伤心。诗人反复抒写对埋葬在荒凉墓地的爱人的牵挂，其实也是反衬未亡人孤单无依的凄凉处境，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往昔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的缅怀。最后诗人反复咏唱“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发出了死后同穴的誓愿，对逝者爱情的抒发达到了高峰。

我国古代有不少悼亡诗的佳作，潘岳和元稹的悼亡诗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潘岳是我国晋代的知名文学家，史云“善为哀诔之文”。他就是古代与宋玉齐名的美男子潘安，不论走到哪儿，都受到女性的围观，甚至给他的车里投掷果子。然而，他一点也不花心，对妻子的爱情坚贞不渝。

他与杨氏结婚之后共同生活了24个年头，感情一直很好。妻子病逝之后，他悲痛不已，一连写下了三首《悼亡诗》。

潘岳《悼亡诗》中的第一首尤为有名，传诵千古。后人遂以“悼亡”为丧妻的代称。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僮俯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帟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雷承檐滴。  
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岳犹可击。

此诗抒写了潘岳在丧妻不久后离家赴任前对亡妻的怀念。他举目所见，家中处处留下了妻子的印迹，仿佛她依然活在此世一般，使他久久不忍离去。诗人用大自然中的事物比喻他此时的心情，如林中双飞双栖的鸟儿落了单，如水中比肩同游的一对比目鱼到中途折剩了一条，非常形象生动。“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诗人对亡妻的思念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忧思越发加重。此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潘岳中年丧偶的悲哀与孤独之情，十分感人。

唐朝著名作家元稹的《遣悲怀》三首，为悼念亡妻韦氏而作，也有中国悼亡诗绝唱的美誉。韦氏出身高贵，美丽贤慧，不幸27岁即夭折。

《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荇簞，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这几首诗深情地赞誉了亡妻生前的种种美德。韦氏未嫁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自从嫁给他之后，家境贫困，但她毫无怨言，野菜充饥甘之若饴。她还费尽心机拼凑布料为丈夫缝制衣裳御寒，甚至当掉了自己的首饰替丈夫沽酒喝。如今抚摸着妻子亲手替他缝制的衣裳，想到妻子生前对他种种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更加深了对她的悼念。

一般而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夫妻感情更深。诗中发出了“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感叹。正因为对亡妻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诗人才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除了亡妻之外，其他千娇百媚的佳丽都不在他的眼里，他发誓此生不再婚娶。显然，元稹对亡妻的感情比潘岳更深一层，也更感人。

在表现手法上，后人认为潘岳、元稹的悼亡诗，显然是诗经中悼亡诗的化出。这是有道理的。

如《诗经·邶风·绿衣》写道：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  
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  
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  
我思古人，俾无訖兮。  
絺兮绌兮，凄其以风。  
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这首怀念亡妻的诗，表现了一种直观而朴素的感情。未亡人身上穿的衣裳，都是亡妻生前一针一线所缝制的。因此，当他看到自己身上穿的绿面黄里的衣裳，就不禁想起亡故的妻子，更加令他伤心不已。

睹物思人，是悼亡诗中最常见的一种怀旧心理现象。配偶新丧未久，未亡人看到死者的衣物、用具或死者所亲手制作的東西，更唤起了对亡者的思念，陷入了更深的悲痛之中。这是人之常情。

潘岳诗中：“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帟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元稹

的第二首云：“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这些悼亡情感的表达，都是常用的睹物思人的表现手法。

苏东坡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上是其词创作的巅峰时期。《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三首词最享盛誉。

其中，《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便是一首著名的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悼念的是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王弗。作者写此词时为熙宁八年（1055），王弗早在十年前已经病逝于京师开封，年仅27岁。当时王弗的灵柩被安葬在四川眉山苏家的墓地，苏东坡自从父亲的丁忧期满出蜀之后，再没有回过家乡。

上半阙主要是抒情。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开头两句质朴的语言直抒胸臆。

苏东坡同王弗幽明相隔，彼此惘然无知。此时，王弗已经离世十年了，苏东坡也已经续弦了。表面看来，他对亡妻似乎已经不再思念了，实际上，内心深处对她从没忘却过。“不思量，自难忘。”这两句似乎矛盾的话语，正表现了作者对亡妻思念之深。诗人对亡妻的思念并没挂在口头上，而是埋在心灵深处。

诗人完全明白夫妻幽明两界生死之隔，今生今世已经不可能再团聚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能亲自到亡妻的坟上去祭奠，向她倾诉自己的心声，聊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情。然而，由于路途的遥远与险阻，连对亡妻倾诉衷肠的地方也没有，他的痛苦更甚。十年来，诗人仕途坎坷，饱经沧桑，已经两鬓斑白了。他设想，即使与王弗得以重逢，由于两人分离的时间过长，已经物是人非，恐怕爱妻也认不出她的丈夫来了。由此更加衬托出诗人无奈、悲凉的心境。这为下半阙的夫妻梦中相会作了铺垫。

下半阙主要记叙夫妻梦中相会的情景以及抒发诗人梦醒后的哀痛心情。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生死的界限，时

空的阻隔，难以逾越，只有梦境才能超越。苏东坡对亡妻的思念达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步，于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梦境。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诗人行色匆匆地回到了故乡眉山，径直来到从前自己与王弗的爱巢，只见王弗还像新婚时那样坐在窗旁对镜梳妆。王弗从菱花镜里瞥见了满面尘土、鬓角斑白的丈夫，似乎有点认不出来了。夫妻俩默默相对，长久的离别，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扑簌簌流淌的泪水表露了两人恒久的思念之情。这场梦中的夫妻相会，简直令人肝肠寸断！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然而，这场夫妻重逢只是幻境而已。实际上，只有那荒凉的墓地才是王弗的安息所在。梦境瞬间破灭了，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来。他只能借助想象，神游千里之外的故乡，仿佛看到凄清的月光照射着爱妻的坟茔，四周只有当年他亲手栽种的松树在寒风中摇曳，发出簌簌的声响，似在表示对丈夫的无限眷恋。

苏东坡从梦中醒来之后，当场饱含热泪挥毫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首悼亡词。

按理说，时间是治愈心灵伤痛的最好良药，十年的漫长时光应该淡却了亡妻在他生活中的影响。再说，苏东坡的续妻王闰之是位贤妻良母，他在生活上并不缺乏周到的照料。苏东坡对亡妻的念念不忘，主要基于更高层次的需要，那就是精神上的依靠。

要理解苏东坡对亡妻王弗如此深厚的情感，必须充分认识王弗其人。史书上对王弗事迹的记载微乎其微，但苏东坡亲自为王弗撰写的墓志铭，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

（《亡妻王氏墓志铭》）

苏东坡跟王弗是一对情投意合的伉俪。王弗才貌双全，知书达礼，不仅仅是苏东坡的爱妻，而且是他

的知音，也是他的诤友。苏东坡初入仕途时，她常以公爹的教诲提醒他，交友要慎重。苏东坡对妻子的见识与睿智非常佩服，有什么事也常向她倾诉。王弗这样做是出于对丈夫的真正理解与关怀。

知子莫如父。苏洵《名二子说》，分析了两个儿子的性格特点。次子苏辙性格内敛、稳重、谨慎，他比较放心；长子苏东坡才华横溢，性格外露、坦率，容易招祸，他很不放心。苏洵与苏东坡的关系，不仅是父子关系，而且是老师与弟子的关系。兄弟俩的才学都是他们的父亲亲自传授、培养出来的。

其胞弟苏辙也常劝告兄长慎交以避祸。苏东坡回答：“吾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此乃一病。”他也自知这是自己的弱点，但就是改不了。因为他有一颗淳朴坦诚的童稚之心，又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后人评论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确实，苏东坡看人从不分高低贵贱，对各个阶层的人都一视同仁。皇亲国戚、高官重臣、诗画之友，乃至僧道平民，都可以做朋友。在年龄上既有同龄人，又有忘年之交。

王弗主要在苏东坡初出仕的五六年间陪同在丈夫的身边，尤其是凤翔任上的三年。当时，苏洵得了个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职务，留在京城为朝廷修撰礼书。苏东坡初次离开父亲外任。

尽管当时苏东坡只是一名八品的小吏而已，然而，由于他才华出众，尤其在御试制策中取得了最高等，仁宗皇帝视之为宰相的后备人才，更是名震士林，因此人们纷纷慕名而来同他结交。

每当苏东坡外出归来，王弗总是详细地询问情况。常常提醒他，我们远离父亲，缺少了长辈的耳提面命，为人处事不能不谨慎。

不仅如此，王弗蕙质兰心，善于慧眼识人。她并非相面的术士，而是通过倾听来客的话语敏锐地辨识他们的心态。家里每当有客人来访，王弗在周到地招待的同时，还站在屏风后注意倾听客人与丈夫的交谈。待客人走之后，王弗就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对那些新结交的人加以评论。她认为人们来结交丈夫，有各种不同的心态：有的是出于信任，有的则是出于攀附，一些人的品格不是短时期内会显露出来的。特别是有的人刚同你结识，就对你推崇备至，对你的见识唯唯诺诺，如同老熟人、老朋友一样，将来一旦有事，这样的人便会对你唯恐躲避不及。因此，王弗告诫丈

夫：不能将所有的人都引以为知己。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王弗确实有先见之明。而且她离世的时间越久，苏东坡对妻子的直觉，也可说远见卓识，越加心悦诚服。

即以苏东坡的同年章惇来说。章惇比苏东坡年长，而且官职也高一级。由于苏东坡刚中进士之时，即告假回乡服母丧，晚出仕了几年。章惇时任商州县令，同凤翔距离较近，他主动前来拜访。此人自视甚高，夸夸其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还自诩为苏东坡的好友。苏东坡对他也热诚相待。后来章惇飞黄腾达，当了宋哲宗的宰相。由于他极度嫉妒苏东坡的才学，唯恐其取而代之，对苏东坡兄弟整得最狠、最惨。章惇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苏东坡兄弟贬谪岭南。苏东坡先在惠州待了三年，章惇还不罢休，接着又将他贬谪海南岛的儋州，当时流放政治犯的最蛮荒之地。苏东坡被贬谪岭海前后达六年之久，受尽了苦难，直到宋哲宗死后，章惇下了台，苏东坡才得以返回中原，可是不久便病逝了。

话要说回来，苏东坡的朋友遍天下。即以凤翔而言，苏东坡也结交了几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如陈襄父子，尤其是他与陈慥成了莫逆之交。起初，由于凤翔太守陈襄对他特别严厉，他与陈太守的关系比较僵。后来通过与陈慥的交谈，苏东坡才了解到陈太守对他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对他严厉一些，为的是防止他少年得志，不思长进。苏东坡这才理解了这位前辈对自己的良苦用心。陈慥虽然出身世家大族，但他本人是名布衣，侠义之士。陈慥同苏东坡素昧平生，出于对他人品与才学的仰慕，主动前来结交。两人通过一番坦诚的交谈，意气相投，成了挚友。在以后的岁月里，当苏东坡在仕途上处于顺境时，陈慥疏远他；反之，当苏东坡处于逆境时，陈慥就竭尽全力前来帮助他。苏东坡贬谪黄州的艰难岁月里，多亏了当时正隐居于麻城的陈慥照顾，从而缓解了他生活上的困境。苏东坡被流放蛮荒之地儋州时，年迈苍苍的陈慥竟然还准备漂洋过海去看望他，遭到了苏东坡的坚决制止。

苏东坡亲自为爱妻王弗撰写的铭文中，最后还有最关键的一句话：“余永无所依怙”。爱妻的亡故，苏东坡痛惜地感到自己永远失去了精神上的依靠。这句话，分量重千斤。这就是苏东坡对亡妻久久难忘的深层原因。

苏东坡为何在此时此地对亡妻迸发出如此强烈的



思念之情？这也是有缘由的。

此时，苏东坡刚刚从繁华的杭州调到贫瘠的密州任知州。干旱，蝗灾，饥谨，弃婴，盗贼，还有坑害百姓的《手实法》……这么多关系到全州黎庶生存的重大问题接踵而来。他首次担当一州之长，感到身上的担子特别沉重，出于对百姓高度的责任感更让他忧心如焚。正月是一年之始，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苏东坡独自在书房里踱来踱去，愁眉苦脸，烦躁不安。此时此地，他迫切需要有个人倾诉心中的焦虑，希望帮他出出主意。然而，此时他的父亲也已亡故了，弟弟苏辙同他在不同的地方任职。诗人如此强烈地思念亡妻的心情就可以理解了。

这首词在表现手法上，完全摆脱了以往悼亡诗睹物思情的窠臼。苏东坡对亡妻的怀念，其起因并非由于一般的触景生情、睹物思人。苏东坡与王弗伉俪生死相隔，时间已越过了十年之久，空间遥隔千山万水。然而，漫长的时间，遥远的空间，不但没能淡化了苏东坡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反而更深沉了，更强烈了。

在内容上，也并非停留于一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上。词作对亡妻并无直接的赞美之词，也无立下海誓山盟，语言非常质朴。然而，此词高远的意境，鲜明的人物形象，刻骨铭心的思恋之情，强烈地感染着，乃至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苏东坡的门生陈师道对此词评得最精彩：“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

一般的悼亡诗词，即使如潘岳和元稹等公认的悼亡诗的佼佼者也是无法与苏东坡的这首悼亡词比肩的。

用词表现悼亡之情，是苏东坡的首创。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力。这是苏东坡对词的创新发展的重大贡献。

后来，王朝云在惠州感染了瘴疔而仙逝后，苏东坡也为她写了一首悼亡词《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浣，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王朝云是苏东坡晚年遭政敌陷害流放岭南时患难与共的红颜知己，年仅三十出头因感染瘴疔不治而歿。苏东坡的悼亡词将王朝云的品格寓意于冰清玉洁的梅花，超凡脱俗，立意很高。然而，这首词不如密州所作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样脍炙人口，流传深远。

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一首别

开生面的悼亡词，不愧为抒发伉俪之情的千古绝唱！

（陈慧君，山东济宁学院教授）

（上接第41页）贬到黄州后，一大家子连饭都吃不饱，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带领一家，在黄州城东的山坡上开荒种地，以解决温饱，并自号为“东坡居士”，苏东坡之名自此响彻天下。晚年再贬儋州，拖着六十多岁的衰老多病之身，带着小儿子苏过，漂洋过海，来到不毛之地的海南岛，过的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的艰苦生活，可他却能坦然面对，还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诗句，这是何等豁达乐观的情怀。这样的人生态度，不值得效仿吗？

再者，我们的官员领导应把苏轼的“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作为座右铭。我们的官员领导应该说是人中的佼佼者，具有高于一般人的各种能力与素质。但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多么强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本事，你都要用清廉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就像苏轼认为官员应懂得“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的为官准则那样，把清廉作为官品的第一要素，在自己的履职工作中“廉一贯之”。“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苏轼在千年前的这一看法，在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大量鲜活的事实证明着它的正确性。尤其是“功废于贪”让我们异常信服。且看当今那些因贪腐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大小贪官，哪个没有这样那样的能力？哪个没有勤奋努力？谁不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级一级地走到今天的领导岗位？谁不是身上寄托着党和人民、亲人朋友的殷切期望？可就是一个“贪”字，毁了自己的前途，毁了自己的名声，毁了自己的人格，毁了自己家庭，毁了自己的一切。所以说，我们的官员领导把“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作为座右铭是十分重要而必要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这里了解苏轼的清廉，分析苏轼清廉的原因，除了表达对他的景仰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从他身上学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如果真能这样，那就让人欣慰了。

（胡先西，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 习主席李总理引用苏轼名言 ——读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

王晋川

2014年7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说：

近1000年前，中国古代文学家苏轼说过：“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发展中美关系要顺时应势，与时俱进。

李克强总理在英国智库发表题为《共建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的演讲时，引用了苏轼的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演讲的最后一段，李总理说：“英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各自的辉煌，更有顺应时代大潮，求新求变的执着追求。英国诗人雪莱说，‘人不能创造时势，但可以抓住那些已经出现的机遇。’中国文学家苏轼说，‘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中国与英国，东方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抓住机遇，共迎挑战，携手建设一个包容发展的美好新世界！”

二位领导人引用苏轼的“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语出苏轼的《代侯公说项羽辞》。苏轼写这篇文章时，有一小叙，兹引如下：

汉与楚战，败于彭城。太公间走，见获于楚。项羽常置军中以为质。汉王遣辩士陆贾说项羽请之，不听。后遣侯公，羽许之，遂归太公。侯公之辩，过陆生矣。而史阙其所以说羽之辞，遂探其事情以补之，作《代侯公说项羽辞》。

苏轼说得很清楚，楚汉相争时，项羽把刘邦的家眷关在军中作为人质。刘邦派陆贾去劝项羽放人，项羽不肯。后来刘邦手下一个叫侯公的说服了项羽。但侯公究竟是怎样说服项羽的，史书上没有记载。苏轼便代侯公把说服项羽的经过写了下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代侯公说辞，不如说是苏轼借汉代的一个小故事，表达了对北宋时期天下大势的评价，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发扬。

文章一开头，苏轼便写“侯公在军中，而未知名”，乃毛遂自荐，坦言刘邦在用人上的失

误，“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则丧气。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则挫心”。主动要求担当重任，去项羽营中当说客。接着写“侯公至楚，晨扣军门，谒项王”，公正的评价项羽“夫首建大义诛暴秦者，惟楚。世为贤明显名于天下者，惟楚。天下豪杰乐从而争赴者，惟楚。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强将武，百战百胜，莫如大王。诸侯畏慑，惟所号令，莫如大王。割地据国，连城数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数者以令天下，朝诸侯，建大号，何待于今。”一席话说得项羽眉开眼笑，侯公话锋一转，指出项羽如今“智穷兵败，土疆日蹙”，原因在于缺失“仁义智信”。“夫制人之与见制于人，克人之与见克于人，岂同日而语哉。……夫智贵乎早决，勇贵乎必为。早决者无悔，必为者无弃”。最后，侯公给项羽献上一计，“臣闻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臣愿大王因其时而用其机，急归太公，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大王解甲登坛，建号东帝，以抚东方之诸侯，亦休兵储粟，以待天下之变。汉王老，且厌兵，尚何求哉，固将世为西藩，以事楚矣。”“项王大悦。听其计，引侯生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会三日而归之”。

苏轼写得很机智，引经据典，层层剥笋，辩驳有力，妙语连珠。既写了刘邦的优柔寡断，又写了项羽的刚愎自用，更写了地位低下、不为人知的侯公，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天下大势，使项羽明白了抓住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终于圆满完成了促使项羽释放人质的任务。

目前，眉山与全国一样，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好历史机遇期。在以习、李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眉山正朝着“经济跨越、文化繁荣、环境一流、人民幸福”的战略目标阔步前行。抢抓机遇，梦圆眉山，我想，这应是读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的应有之义吧！

（王晋川，眉山市文体局原调研员，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 《苏轼词编年校注》第五次印刷后记

邹同庆 王宗堂

拙著《苏轼词编年校注》自2002年出版以来，至今已重印四次。2013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书目。《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8日发表署名文章称：这些书目是从1949年至2010年间出版的25000种古籍整理图书中评出的精品，是“树立古籍精品图书的样板和标杆”。拙著忝列其间，我们深感荣幸，又感不安。因为当我们翻检它发现其中存在的纰漏和不足时，心中总会涌出惭愧之情，难以自安，感到它距“精品图书”还有很大差距。《周易·益》云：“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杜甫《偶题》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清人李渔《闲情偶记》卷一《文贵洁净》有言：“隔日一删，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无瑕瑜互见之失矣。”发现错误就马上改正，慢慢地就能上升到至善高度。自拙著出版以来，每当我们发现书中的错误和遇到新的数据时，就立即记录下来，以备日后修改、勘误和补充之用。现在我们的书还不能重新排版，故不宜大量改动原来版面，补充的新数据和需要申述的问题，只能在后记中加以说明。

## 一、关于“底本”与“校勘”

1982年中华书局交给我们校注苏轼词的任务时，要求用最早之曾慥辑《东坡先生长短句》二卷《拾遗》一卷作底本。东坡词自宋至今流传有三个系统：即曾慥辑《东坡先生长短句》系统；傅干《注坡词》系统；元延祐刻《东坡乐府》系统。其中曾慥辑本刊刻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为苏轼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本子，可惜原刻本已佚，现今只流传着三种抄本和一

种排印本。它们是其一，明吴讷（1368～1454）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二卷，《拾遗》一卷。卷上收词114首，卷下收词157首，拾遗收词40首，共311首，天津图书馆藏（198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其二，明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本《东坡词》三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其三，民国十七年（1928）梁廷灿据天津图书馆藏吴讷抄本过录、梁启超校《唐宋名贤百家词》，国家图书馆藏。排印本一种：林坚之（大椿）校订《百家词》本《东坡词》二卷《拾遗》一卷。此本据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排印，民国二十九年（1940）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印成后，即逢港变，存书都作一炬，仅有数部运至内地，北京师大、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福建师院、吉林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藏（1992年天津市古籍书店有影印本）。另外，明万历三十四年茅维编刻《东坡先生全集》本《东坡词》二卷，亦据曾慥本收录，而将曾本《拾遗》卷40首，分别编入前二卷之同调诸词之后，并增补若干首佚词，共收词316首。明万历四十六年焦竑编曼山馆刻《苏长公二妙集》本《东坡诗余》二卷，也出自茅维辑刻本，并增补20首。明末毛晋汲古阁《宋六名家词》本《东坡词》一卷，则据全集和焦竑本重编，并校以元延祐刻本，收词328首。《四库全书》本《东坡词》则出毛氏汲古阁本。上述诸本中，吴讷抄本、紫芝漫抄本、梁抄本，都较好地保存了宋曾慥刻本原貌，但由于抄手的随意性，错误很多，诸如错字、别字、前后重出……等等，几乎触目皆是，用作底本，殊不足据。林大椿排印本，虽然增强了规范性，但对于东坡词，仅从《拾遗》卷中删去重出的《醉桃园》等7首，此外实无他本校订，故其

内容编次，实同吴讷抄本。其它明刊全集、二妙集、毛本、四库本，虽然承袭于曾慥本系统，但都经过编者的改编、增补，无论是卷数和收词首数，与曾本大异，失去了曾本原貌。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本《东坡词》时，采用的是曾慥本系统，但他未用上述诸本作底本而另辟蹊径。他在《全宋词》本《东坡词》附注云：“案苏轼词今用最早之曾慥本东坡词二卷拾遗一卷，文字从毛扆校汲古阁本东坡词录出，编次据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及紫芝漫抄本东坡词。”（见第1册325页上）唐先生编《全宋词》本《东坡词》为了再现曾慥本原貌，词的前后编次用的是吴讷抄本和紫芝漫抄本，每首词的文字却从毛扆校汲古阁本。这样编东坡词，既能保持曾慥本原貌，又采纳了吴讷抄本、紫芝漫抄本、毛扆校汲古阁本等诸本之所长。我们认为唐先生这一扬长避短、各取所需的做法是可取的。中华书局要求我们“校勘要精简”。我们从唐先生编《全宋词》本《东坡词》中获得启迪，在校注苏轼词时，编次用吴讷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而文字多从《全宋词》本《东坡词》，再校以其它诸本。这样可以避免吴讷本在抄写中的诸多错误，减少校勘文字，以达到“校勘要精简”的要求。对我们的这种尝试，田玉琪、杜茜二先生批评“是对底本颇不重视”，吴讷抄本的诸多漏误，未有出校，“希望该书再版时对具体错误能有所更正。”（见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4期《〈苏轼词编年校注〉之校勘指瑕》）因拙著凡例校勘条未详细提及，故在此特做具体说明。至于我们的作法，是耶？非耶？望方家指正。《唐宋名贤百家词》是一部词总集，较毛晋汲古阁刻词早出近二百年，为研究宋词提供了重要价值的版本数据。田、杜二先生正承担古籍整理项目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汇校》，希望二先生遵守校勘之法，校勘出一部能还吴讷抄本原貌、高质量的东坡词集，惠及学林，功莫大焉。作为苏学同道，我们期待着。

## 二、关于“编年”

最近几年，学界又出版了几部苏轼词校注本，如中国书店2007年1月出版的朱靖华、饶

学刚、王文龙、饶晓明编《苏轼词新释辑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的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中之《苏轼词集校注》，对苏轼词编年都有新的发现。另外报刊上发的有关苏轼的文章，也有涉及苏轼的编年，读后颇受启发。《苏轼全集校注》2013年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对学术发展、文化传承意义重大。《苏轼词新释辑评》收入叶嘉莹主编《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共收苏词411首，是目前收词最多者。且对411首词都编了年，并篇篇有讲解，对读者特别是初学苏词者，很有帮助，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但411首编年，是否篇篇都十分准确、稳妥，我们想还会有商榷的余地。

读了张志烈、朱靖华诸先生校注的苏轼词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感到拙著需要变更编年及应加案语者，有以下几首：

（一）上册14页《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原据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七编熙宁五年壬子（1072）正月。自王文诰之说一出，后来治苏词者，多袭之，如朱孝臧、龙榆生、曹树铭、石声淮、唐玲玲、薛瑞生、孔凡礼等。近几年苏学界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刘尚荣先生在《乐山师院学报》2005年8期发文《苏词开篇，红杏报春》，略云：苏轼熙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杭州通判任所后，旅途劳顿，首要任务是会见僚友，熟悉环境，忙乱中已进暮春，有诗有纪可证，惟不曾有熙宁五年正月探春的纪录，若说此时苏轼有探春词，恐难令人信服。再细审王文诰的相关考述，亦是自相矛盾：既说“此倅杭作而年无所考”，又正式系于熙宁五年正月，足见其并无显证，亦无自信。苏轼这首词，“应写于熙宁六年春正月，可能是二十二日，即与陈襄去寻春之次日。”熙宁六年正月，苏轼城外探春，苏轼诗集里可见到确凿无疑的旁证：如诗集卷九有《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及《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二诗，详说熙宁六年探春事，陈襄也有《和苏子瞻通判在告见寄》。苏诗、陈诗的描绘都正好与苏轼《浪淘沙》探春词互为发明，互相印证，提示读者《浪淘沙》应作于熙宁六年正月。龙吟先生《苏轼词作编年新说》也说“苏轼熙宁五年无词，《浪淘沙》作于熙宁

六年(1073)正月。”(见学苑出版社出版《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张志烈《苏轼词集校注》也系于熙宁六年春,并补佐证说:“陈襄自熙宁五年五月由陈州移知杭州,熙宁七年六月除知应天府,能邀苏轼寻春的时间只有熙宁六年和七年两个春天,而熙宁七年春苏轼在常润,故相邀只能在熙宁六年之春。”据上诸说,今移编熙宁六年正月,作于杭州。

(二)上册193页《浣溪沙》(四面垂杨十里荷),原依曹本编熙宁十年丁巳(1077)正月,作于济南。1982年依曹本编年时,就心存疑惑,正月里怎么会出现“四面垂杨十里荷”的景象?怎么会有“且来花里听笙歌”的活动?因当时此词只有曹氏一家编年,无别本参证,权且“暂依曹说编年,以俟详考”。1998年薛本发行后提出此词“疑似作于颍州。”编入元祐六年,并引《名胜志》和秦少游的两句诗“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以证不妄,但并无自信。2004年出版的孔凡礼《三苏年谱》据薛说系于元祐六年,并加案语云:“案‘十里荷花’云云乃秦观(少游)之弟秦觏(少章)诗,乃苏轼初到颍州时,觏所呈者。”后有“秦觏(少章)尝呈轼诗”条,并录《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七引《王直方诗话》:“杭州有西湖,而颍亦有西湖,皆为游赏之胜地,而东坡连守二州。其初得颍也,有颍人在坐,云:‘内翰但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盖言其讼简也。秦觏少章因作一绝以献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已无。’后东坡到颍,有《谢执政启》,亦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邦,辄为西湖之长。’”(案:孔录此文,《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七不载,见后集卷九“投献门”,亦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孔当误记)。朱靖华等《苏轼词新释辑评》云:“此词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至九月间东坡到颍州太守任时。”张志烈等之《苏轼词集校注》,亦系于元祐六年闰八月初到颍州时。以上薛、孔、朱、张等四家之说可从,现改编到元祐六年辛未(1091)闰八月,作于颍州。

(三)上册376页《渔父》词“编年”栏,原作“同前首”。今下加案语:

“案,《渔父》四首,又见《苏轼诗集》卷

二五,查注、合注、集成均编元丰八年春作于南都(今河南商丘市),以后出现之朱本、龙本、薛本、《三苏年谱》均从诗集编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校注编元丰八年(1085)二月,作于南都(见4册2784页),词集校注编元丰五年(1082)春,作于黄州(见9册376页),自相抵牾。录存待考。”

(四)中册602页,《渔家傲》题作“送吉守江郎中”,原编元祐四年己巳(1089)八月,作于杭州。此编年有误。明万历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八四载此词,题作《送江宽,宽知台州》。我们考辨,此词是熙宁七年九月初江宽由真州转台州途经杭州时,苏轼送行之作,详见下册《重印后记》1126页至1128页,不再重述。

还有一些词,属见仁见智的编年,一时难以定论,只能存疑。析疑匡谬,以待来哲。

### 三、关于“考辨”

中册687页,《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考辨]栏,原有考辨,欠全面,现修订如下:

此词明洪武本《草堂诗余后集》卷下作无名氏词,清康熙年间刻本《双湖先生文集》卷四作元人胡一桂词,题作“清明”,“落红”作“落花”。案:除傅本、元本、吴本、外集未收外,明刊全集、二妙集、毛本、朱本、龙本、全宋词、曹本俱载。且明陈钟秀《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卷下、武陵逸史《类编草堂诗余》卷二、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二、杨慎评点《草堂诗余》、董其昌《新刻便读草堂诗余》卷三、李廷机《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卷三、陈耀文《花草粹编》卷七、潘游龙《古今诗余醉》卷八、清朱彝尊《词综》卷六、沈辰垣等《历代诗余》卷三九、先着《词洁》卷二、董毅《续词选》卷一、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二、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乙集、董苏《蓼园词选》,以及王士禛《花草蒙拾》、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下等,均作苏轼词。《天机余锦》卷一亦载此词,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蓝格抄本未署作者,2000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校点本,补署苏轼。足证洪武本作无名氏者误。《草堂诗余》成书约在宋宁宗庆元元年

(1195)以前,该书在社会流行已五十多年,胡一桂(1247~?)才出生,作胡一桂词显误。或云今传《草堂诗余》最古之本,乃何士信等后人在原刊本的基础上增添而成,故题《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此首未尝不有混入苏词之嫌。案:增修本中凡增添之词,均标明“新添”或“新增”二字,共106首。其中新添苏轼词两首,前集卷上新添《江神子》(天涯流落思无穷),后集卷上新添《念奴娇》(凭高挑(眺)远)。而此首《蝶恋花》未标“新添”或“新增”二字,说明乃宋本原有篇目,作苏轼词当不谬。

#### 四、关于“笺注”

(一)上册12页,《南歌子》(琥珀装腰佩)笺注引傅注后,原加按语云:“按《汉武内传》‘五兵’原作‘玉之’,疑钞本笔误。”此按语现改作:按《汉武内传》“六山火五兵佩”原作“六出火玉之佩”,疑傅注抄本有误。“六出”谓一花生六瓣。“火玉”,传说能发热的红色宝玉。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会昌元年(841),夫余国贡火玉三斗……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则不复挟纩。”此谓上元夫人佩带着用火玉做成六瓣花状的玉佩。

(二)中册556页,《水龙吟》序中有“元丰七年冬,余过临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湛然先生梁公”原失注,今补注如下:

湛然先生梁公:即道人梁冲。《苏轼诗集》卷二四载《赠梁道人》诗。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三“赋诗赠梁冲道人”条云:“《济南先生师友谈记》叙嘉祐二年应进士举时论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为道人梁冲所得’,‘冲以吐纳医药为术,东坡贬时识之,今在京师’。苏轼赠诗首云:‘采药壶公处处过,笑看金狄手摩挲’,知此道人乃冲,在黄州时已识其人,今遇之于途中。”苏轼诗、词均为元丰七年十二月由黄州赴京途中在泗州所作,当时道人梁冲也在泗州,“知湛然先生梁公”,即道人梁冲。

#### 五、关于“参考数据”

(一)上册9页,明杨慎《词品》后加一

条:

明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卷四:“‘篆’字沈在上韵,苏入去韵,可见沈韵原不必尽要合也。至如‘朋’与‘蒸’同押,‘画’与‘卦’同押,‘画’与‘坏’同押,此等音皆缺舌,犹当避也。”

(二)上册192页,清王士禛《渔洋诗话》与近人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之间加一条: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8《东坡词》:“《阳关曲》三首,已载入诗集之中,乃钱李公择绝句。其曰‘以《小秦王》歌之’者,乃唐人歌诗之法,宋代失传,惟《小秦王》调似绝句,故借其声律以歌之,非别有词调谓之《阳关曲》也。使当时有《阳关曲》一调,则必自有本调之宫律,何必更借《小秦王》乎?”

(三)上册377页,《渔父》(渔父饮,谁家去),原无“参考数据”,现增加栏目及一条数据:

【参考数据】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二五《渔父四首》案云:“《渔父词》起于三闾,诰向能以七弦道之。公又尝改张志和词为《鸂鶒天》。此四章亦其遗意,皆可谱入琴声也。”

(四)中册409页,明张綖《草堂诗余后集别录》与清许昂霄《词综偶评》之间加一条:

明潘游龙《古今诗余醉》卷一一:“语语高妙闲冷,初不英气凌人。李白《赤壁歌》‘楼船扫地空’,则‘檣舳’字甚妙,俗本作‘强虏’可笑。”

(五)中册536页,明顾从敬《类选笺释草堂诗余》与清王士禛《花草蒙拾》之间加一条:

明潘游龙《古今诗评醉》卷一一:“欧词‘樽前看取衰翁’,已觑破矣。此言‘未转头时皆梦’,更警醒。”

(六)中册578页,《蝶恋花》(自古涟漪佳绝地),原无“参考数据”,现增加栏目及一条数据:

【参考数据】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涟水有真君泉,在军治园中。东坡尝题字于石栏,又作长短句,所谓‘倦客尘埃何处洗,真君堂下寒泉水’是也。”

(下转第72页)

# 开卷有益的“另类”窗

## ——读夏海《品读国学经典》别札

方永江

读书，可以打开看世界、看人生的窗户，无限可能地照亮未来。开卷有益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反复检验过的真知灼见。就是这样的经典表述，也要遭受汹汹市声的埋汰，为所谓逆向性思维、发散性思维所戏谑。开卷不一定有益，是墙头草哲学，不足道；开卷毫无益处是知识无用论的翻版，看似威猛，实则纸老虎，亦不足道。只需反诘一声，不开卷焉知无益？就射中其命门。看来，常开卷总是对的，并且多多益善。

所以，我说夏先生的《品读国学经典》是开卷有益的一扇窗，传递着向上的力量。在下已从读书之至要及其特殊人群的示范性，善莫大焉；广开言路、凝心聚智的重要性；治国理政“文治武功”并重的借鉴意义；精辟解读了修身齐家关乎个人荣辱和国家兴衰的重大命题等方面进行了歌功颂德，形诸文字，不再赘述。这里想要表述的是另外一个话题。

其实，该书首先击中我眼球的就是另类。夏先生走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路子，确与是非功过留人评说的作者不同，他在自序中对自己的著述做了视野开阔、风格独特、文字厚重等高屋建瓴的评价，似让人不再好评，更似不足让人评了。“内举不避亲”的夏先生，想必也能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更何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品读夏先生之大作，感觉瑕疵有三。其一，技术上的。夏先生在自序中说，国学经典是天空，更是大海，蕴藏着无穷的宝藏，内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到了品读刘禹锡《陋室铭》中，引法国大文豪雨果言：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还要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可见，

在天空面前，大海是不姓更的。同样是这篇文章，引苏轼诗“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有缺憾——大苏《和董传留别》原句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其后，在品读苏轼《赤壁赋》中，引清人赵翼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更工”，为苏轼之人生画龙点睛。其后一句，只查有句便工、句使工而不闻句更工的。博学、慎言、深思如夏先生者，也有些许失误，何况吾辈乎？此不足怪也。在《开卷有益的一扇窗》中，可谓对夏先生推崇备至，只因心中有着一个共同的圣贤。故而，关乎苏家的说道，我是分外在意的。

技术层面的，可以大打折扣、一笑而过，观点、观念上的错讹，必须较真。这就是其二，误读苏洵。夏先生在品读苏洵《谏论》中，依陈见说，苏洵年轻时并不好读书，直至二十七岁才茅塞顿开、发愤读书。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苏洵是励志的楷模。在品读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认为自身努力是求学的关键所在。历史上就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的典故，意指宋朝著名文学家苏洵，年轻时不好好读书，二十七岁以后才发奋（前作愤，原文如此）读书，并且取得很大成功，位列“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拙作《饮泉就饮苏老泉》（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曾就一部《三字经》误读苏洵一千年有过详细的阐释，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苏老泉。苏洵少时“为人聪明，智辩过人”，八岁发奋读书、登堂入室，“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俨然一时豪杰。后人为何多从《三字经》之说呢？只因断章取义，多以“游荡废学”妄议之，更远离了事物真相。他的“游荡废学”，实则是游学。读千卷



## 新书评介

书，行万里路，遍游名山大川，开阔视野，故能“下笔顷刻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否则，时至今日安有老泉可饮乎？

其三，误读苏轼。在品读苏轼《赤壁赋》中，夏先生说苏东坡的坎坷经历没有成就他政治上的事业，却造就了天才的文学巨匠，为中华文化贡献了精品和经典。何为政治上的事业？何为政治上的成功？并非一定要出将入相，并非一定要开疆拓土。苏轼是一位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无关乎他在文学、艺术、美食、酿酒、养生诸方面空前绝后的创造。他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楷模，他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处困境也要一心为民的典范。千百年来，凡是苏轼踏足留痕的地方，人民群众无不深切地怀念他、颂扬他，只为他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和出类拔萃的事功。杭州筑堤、开封断案、密州治蝗、徐州抗洪、登州榷盐、扬州罢会、定州戍边，即便是他人生中最为落魄的黄惠儋，也有坡公遗爱传千古、犀带新桥惠西湖、琼海兴学破天荒，这些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哪怕只一件，不管落在谁的身上，都足以名垂青史。谁能说苏轼没有政治上的事业呢？

爱之深，责之切。夏先生对苏轼的爱戴，我是由衷感佩的。只想在今后的再版中能予以修正，使之更趋完美，先生以为然否？以此就教于先生，罪过，罪过！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处，一字不苟如此。”

明胡应麟《艺林学山》卷五：“东坡‘春事阑珊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趁韵，非也。唐刘瑶诗‘瑶草歇芳心耿耿’，传奇女郎王真真诗‘燕折莺离芳草歇’，皆有出处，一字不苟如此。‘芳草亦未歇’，谢康乐诗也，坡当祖此，杨所引误。”

（邹同庆，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宗堂，河南财经大学教授）



书 名：三苏葬郊考略

作 者：乔建功

出 版：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上接第 70 页）

（七）中册 688 页，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前加两条：

明杨慎《词品》卷一：“宋人作诗与唐远，而作词不愧唐人，亦不可晓。《太平广记》载妖女一词云：‘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折莺离芳草歇。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其词亦佳。坡词‘春事阑珊芳草歇’亦用其语。或疑‘歇’字似趁韵，非也。唐刘瑶诗‘瑶草歇芳心耿耿’，皆有出



## 三苏葬郑追梦人：乔建功

王宪斌

早在1985年我就认识乔建功先生了。那时他是郑县总工会职工学校校长，正在组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普通农民的我参加了辅导班的学习，从而与他结下了师生之谊。后来我受聘于郑县一高，他调县财政局工作。他退休后一头扎进苏轼葬郑的研究中，写出了一系列有关苏轼葬郑的学术论文，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发，破解了有关三苏坟的诸多谜团。已至引起中央电视台的关注，受到苏学权威的首肯，论文汇集为《三苏葬郑考略》，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自1102年苏轼葬郑至今已九百余年，由于时久尘封，史无详载，苏轼葬郑的原因似乎成了无从解读的谜团。因为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只留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的遗言，所以千百年来人们苦苦寻觅苏轼何时来过郑县，何时到此选择墓地的蛛丝马迹。因而演绎出了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选择墓地的“练汝说”；之后发现苏轼根本就没有到任，便又产生了绍圣元年苏轼前往汝州路过郑城，看中此地酷似家乡峨眉的“形胜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主观臆测的泥淖中不能自拔，而这些说法陈陈相因，几成信史。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苏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苏轼致子由第八简中有“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能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丧事，千万莫循俗也”这么一段话，为研究苏轼葬郑之因提供了又一种思路的前提条件。于是有人便以此为据，

认为苏轼葬郑是屈尊同意与侄妇同用一葬地。乔先生不唯书，不唯上，在弄清轼、辙兄弟在北宋晚期一系列党祸纷争中沉浮宦海的悲惨遭遇的基础上，理顺了当时苏氏家族的人事活动踪迹，写出了《三苏园中的两个黄氏女》、《苏坟应是苏家的自家田地》、《辨析苏辙二月二十二日书信关于葬地的内容》等文，破解了探因过程中的疑难和瓶颈。在研读过程中，发现《苏轼年谱》中有几处疑点，他就数次致信作者孔凡礼先生大胆陈述自己的意见，结果受到孔先生的肯定和赞扬。终于弄清楚所谓苏轼葬郑，实际安葬的是4个亡灵，出现的是3个坟墓，起初这里就是族墓的形式。他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考证出涉及苏轼葬郑一事兄弟二人来往的三封书信和七篇祭文，并把它们用时间的红线串联起来，于是，一个苏轼葬郑前因后果的故事情节链，便清晰完整地展现出来。原来苏东坡既没有到此亲堪葬地，也没有为小峨眉命名，所谓“即死，葬我嵩山下”是告诫弟弟不要再花钱另买葬地，就用自家葬地的叮嘱。苏轼葬郑的真正原因是：这里是轼、辙兄弟二人于困顿无奈中在自家田地上辟设的流寓在外的苏氏族茔。苏轼归葬小峨眉完全是一任自然，天意巧合。

十多年来，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化，他先后六写《苏轼葬郑探因》这个命题，从小小的“豆腐块”直至洋洋洒洒万余言的学术论文，先后刊载于《大河报》、《平顶山日报》、《苏轼研究》

等五家报刊，最终正式发表于2012年《平顶山学院学报》第三期，并收入《2013年郑县年鉴》。郑县原副县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高文焕先生（已故）逢人便夸赞，这是苏轼葬郑探因的重大突破，研究苏轼后继有人了。郑县原人大主任、郑县苏轼研究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王盘根先生说，文章道出了我多年想说的话。郑州大学原学报编审魏玉现先生说，至此苏轼葬郑探因这个问题可以划上句号了。乔先生称他们是自己的引路人和加油站！

关于三苏坟的沿革，传统认为苏轼葬郑时称“苏坟”，苏辙葬郑后称“二苏坟”，元末添置苏洵衣冠冢后称“三苏坟”。乔先生认为，这里从开始计议到逐步实施，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名副其实的苏家族茔，这里葬着苏家祖孙四代有文字可考的20多人，其准确称谓应为“苏坟”。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他梳理出两个不大不小的漏洞。一是二苏墓碑名不副实：苏轼、苏辙当年都是同各自的夫人同穴合葬，而现在看到的墓碑却是“宋东坡子瞻苏先生墓”和“宋颖滨子由苏先生墓”。二是对苏坟的说法有误：传统认为，北宋灭亡南迁后苏家后代流散各地，苏坟就香火断绝，陷入荒芜了，上下延续的时间只有25年左右。乔先生通过考证《苑中碑》和《金史》等史料，证实整个金代苏坟不但保护完好祭祀不断，并且还留下许多社会贤达拜谒的碑碣石刻，呈现一片祥和景象。这里真正遭到重大破坏是蒙古铁骑入侵，金朝灭亡以后的事情。苏坟自1102年苏轼葬郑至1232年金朝灭亡，上下延续达130年。为了印证这个推断，他亲赴当年苏辙寓居的许昌县椹涧乡西长店村以及苏家后裔聚居的苏桥村进行考察，考察结果与推断完全吻合。他写就的《三苏坟究竟葬几人》先后刊载于《三苏》、《超然台》、《放鹤亭》，最终发表于《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并收入《苏辙研究》和《2013年郑县年鉴》。

三苏园中的广庆寺在坟院的西南，而苏辙《再祭亡嫂王氏文》说“茔兆东南，精舍在

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多少年来一直使人不明就里。乔先生在参阅大量文献和现场踏堪墓地的基础上，写出了《发微显幽，探骊得珠——苏坟茔兆曾东移》一文。该文精辟地阐释了不是苏辙说错了方向，也不是广庆寺迁移了位置，更不是书写印刷有误，而是苏家的葬地原本靠西。苏轼的门生李廌前来吊唁时，发现东去不远就是小峨眉的箕形山坳，是可遇不可求的堪輿佳城，于是就趁苏轼灵柩在广庆寺待葬80天的间隙，往返奔走于许汝间劝动苏辙，把茔兆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苏轼是闰六月二十安葬的，苏辙的祭文四月二十三日写就，当时还没有东移茔兆的动议，所以才出现广庆寺的方位与苏辙祭文所述不一致的问题。文章论据充分，考证缜密，受到原郑县文化局局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郑县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刘继增先生的一再褒奖，说该文写出了水平，能够自圆其说，解决了有关三苏坟的一大难题。

出坟院大门南行百米处，神道两侧分别有两座坟墓，西边是顺治初年发现的苏迟夫人梁氏墓（苏辙长房），东边是1972年发现的苏仲南夫妇合葬墓（苏辙次房）。它们为什么孤零零地坐落在坟院大门外同父辈的坟墓相距半里之遥？所依据的是什么葬法？长期以来使人困惑不解。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南省博物馆的李绍连研究员以及平顶山市委党校姚海栓副教授等人曾先后撰文探讨，但始终不得要领。这是三苏园中最难解的一个谜团，又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也是乔先生考证最费力的一个议题。为此，他遍阅史料，走访朋友，咨询名家，拜谒过欧阳修、范仲淹的陵园，还远途跋涉亲赴襄城县王洛乡房村、许昌县灵井乡禹王城及安阳市殷都区皇甫屯村，寻访和苏轼同时代的范镇、韩绛、韩琦等人的坟墓，上下求索，极力寻找打开这个谜团的锁钥。终于，一个大胆的逆向思维使他茅塞顿开，他精心构思写出了《穿越历史烟云，寻觅二苏真茔》一文。该文对现有的二苏坟墓提出了七个疑点，证实其不是真茔。然后，依据文献记载的方位数据资

料，指出二苏真茔的位置所在，以及苏家子辈其他四人坟墓的位置，并绘制出了《苏坟原貌示意图》，最后阐述了造成这种舛误的历史原因。元初（1295年）刚任汝州知州的元叔仪前来祭扫苏坟，看到这里坟墓荡平，一片荒凉，唏嘘再三；无奈之下，只好象征性地堆土为坟，立苏先生墓碑聊以寄托哀思。从此代代相传，致使苏坟成了当今的格局。元叔仪的此举记录在尚野所写的

《二苏先生墓碑记》中。2012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赵乐一行三人在三苏园对乔先生进行长达5个多小时的专访。听了乔先生的上述观点，赵主任拍着他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您真行！今天和您一席谈话，胜我读四年本科。又对一直陪同的三苏纪念馆的宁馆长和丁书记说，你们应该请乔老师作顾问。

2013年7月我和乔先生一起参加第18届国际苏轼学术研讨会（四川乐山）。期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四川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学者邱俊鹏先生对乔先生说：你近几年写的有关苏轼葬郑的文章，每一篇文章我都看过。你算把三苏坟的事情说清楚了。并叮嘱在场的刘继增先生说，以后关于苏轼葬郑的事情不要再随便说了，有什么疑难问题你就找他。在这次汇编《三苏葬郑考略》一书同中州古籍出版社接洽时，社长助理、资深编辑王小方先生看过书稿后感叹说，这些都是纯学术性的论文呀！这应该是大专院校和大型图书馆的馆藏类书。在当今社会，能静下心来写出此类有价值的文章，的确不易。并当场决定免收书号费予以支持。看来学界自有慧眼识珠人，大方所见略同。

一位哲人说过，怀疑是科学研究的首要方法。乔先生就是一位敢于怀疑，善于怀疑的人。他能够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疑点，切入主题；能够从众人熟视无睹的史料、碑刻中采撷一个个论据，并能够发微显幽，将这些“边角下料”有机地串联起来，把文章写得如老狱断案，周详备至，不但能其说自圆，而且无懈可击。他那敏锐的洞察能力、犀利的思辨能力、缜密的审

视能力、严密的组织能力使人折服。这样的文章能写出一篇、两篇，解决一两个疑难问题，就不简单了。他却能连续写出数十篇，有根有据地破解了有关苏轼葬郑的一系列疑难问题，足可立一家之言，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我老家距苏坟不足4公里，有老亲戚是苏坟村的，从小就在苏坟陵园前的石人石羊石马上嬉戏玩耍，初中时就曾抄遍那里的碑文；后来定亲又是苏坟村的，对苏坟不可谓不知。我是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专科、本科毕业证后受聘于郑县一高的，后来又被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再后来被圣光集团聘为文化顾问、编审，应该说也有一定实力。但我并没有发现苏坟的疑点，也没有对苏轼葬郑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后来乔先生让我看文章时渐次深入进去，只能对其作品作些文字语法上的修改，却不能像他那样纵横捭阖。

古人云：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196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许昌一高，而“文革”使他终止了学业。尽管他先后参加了省财专、东北财大、江西财大、省委党校的进修、函授，却始终弥补不了这个缺憾。

乔先生为人低调，不事张扬，耿直孤僻，不善交际，爱发议论，好“较真儿”，大有“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之嫌。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唯独喜欢读书。退休后，他十年如一日，甘守清贫，心沉气定地潜心学术，在自己喜爱领域里尽情发挥着特长。这也算是一种自知之明的智慧吧！话说起来轻松，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其间的苦甜酸辣自不待言，没有相当的定力恐怕是做不到的。可能古往今来的学问都是在冷板凳上坐出来的吧！

（王宪斌，郑县一高中学高级教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 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致辞

苏 灿

尊敬的苏明、苏振武名誉会长，苏子营会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苏氏宗亲：

大家好！非常高兴受到子营会长的邀请，我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刘清泉来到海南，享受到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和煦的海风，尤其感受到海南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苏氏宗亲的热情好客！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庆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借此机会，我们谨受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张志烈会长的委托，代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向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苏东坡作为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以他无与伦比的辉煌的政治才能、文学才华、艺术成就，受到世人的赞誉。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学习、研究东坡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东坡文化的社会团体先后成立、东坡著作一版再版、专著论文汗牛充栋、遗址遗迹先后恢复，东坡文化这一朵优秀传统文化的奇葩，盛开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大花园中，灿烂夺目。

2007年夏天，我有幸带领眉山市政协组织的“东坡足迹万里行”考察团，到海南考察东坡遗址遗迹，耳闻目睹东坡先生被贬儋州后的生活情景，感触很多，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东坡先生面临被赶出官舍的困境时，是海南百姓帮助他搭起几间茅屋遮风蔽雨，送来粮食，让他解饥。苏东坡为了报答海南人民对他的深情厚谊，在他贬谪儋州三年多（1097～1100年）的时间里，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完成了《书传》、《易传》和《论语说》三部专著，而且还开办学堂，传播中原文化，教人知书习礼。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经过苏东坡教育的姜唐佐考取了功名，成为海南第一位举人。

今天，海南人民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是没有忘记苏东坡这位先贤。近年来，海南学习、研究东坡文化热情不减、活动不断、成果丰硕。1987年12月举办苏轼贬儋890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7月举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8届学术研讨会，2009

年10月召开东坡国际文化节恳谈会，2010年1月成立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同年12月又举办了苏东坡在儋州·东坡国际论坛。同时，海南苏轼研究学者在发表论文的同时，还出版了一批令人称道的专著和传记，如《苏东坡在海南岛》、《新编东坡海外集》、《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点校本）、《苏东坡在儋州》、《东坡居儋故事》、《东坡乐府研究》、《天涯孤鸿苏东坡》、《天涯守望——苏东坡晚年的海南岁月》等等。

今天，我们又欣喜地看到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了。这标志着海南苏轼研究将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作为省一级的东坡文化研究会，海南开了一个好头。我相信在子营会长的领导下，在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苏氏宗亲的积极参与下，希望你们定期组织开展学习、研讨活动，加强与苏轼遗址遗迹地的联系，加强与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的合作，加强与全国各地苏轼研究学会的沟通，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加强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联系，互通信息，资源共享，形成合力，共谋学会发展。我们相信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必将在东坡文化研究方面有新的收获、新的成果，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贡献一分力量！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1980年9月成立，先后分别在苏轼遗址遗迹地的18个城市举办了18次学术研讨会、12次纪念活动，学会会员出版了上百部专著和传记，发表了数千篇学术论文，联络了国内外200多名苏轼研究专家学者，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目前，学会第三任会长是著名苏学专家，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烈先生，学会挂靠在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配备有独立的工作机构和人员。我们热情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苏氏宗亲到苏轼老家——眉山来参观、考察和指导。谢谢大家！

（苏灿，眉山市原政协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

##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十三）

[日本]池泽兹子

在《苏东坡的词》（1974，《宋词研究》，创文社刊，改题为《苏东坡词论》）一文中，村上氏把苏轼作词时期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是熙宁五年至七年（1072~1074）在杭州的时代。这时苏轼与张子野交往，开始作词。村上氏指出，张子野开创了词的新的方面，他的词不咏悲伤，而咏日常生活中的感慨，具有比较淡泊的味道。从词的历史来看，可以说苏轼扩展了张子野的道路，第一期是苏轼学张子野词的习作期。第二期是熙宁七年至元丰二年（1074~1079）苏轼在密州和徐州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苏轼的词脱离张子野的影响，开辟出新的境界。第三期是元丰二年至七年（1079~1084）苏轼在黄州的时候。这一时期苏轼的词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产生了不少直观地观察人生的作品。离开黄州以后的第四期，作品数量减少，没有新的发展。村上氏指出，苏轼的词，细致地描写日常生活而直观地观察人生，用毫不在意的口吻寄托深深的感慨，不耽于感伤而对人生达观，器量很大，这几个特点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村上氏最后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对苏轼词的评语说，苏词在词的历史上表现出非凡的杰出的风格。他还写有《苏东坡书简的传来与东坡集诸本的系统》（1977，《中国文人论》所收。）

《中国书道史论考·苏东坡的书与书论》，中田勇次郎，1970，《中田勇次郎著作集》。中田勇次郎，中国文学学者。主要研究中国词和书法。中田氏在苏轼的书法方面的

研究较多。他在《中国书道史论考》中分三个时期论述苏轼的书法。第一期从青年时代到元丰二年苏轼24岁的时候，这一时期苏轼的书法受到王羲之《兰亭序》的影响，擅长有晋唐风格的行楷。第二期从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的时候到元祐八年苏轼58岁的时候。在这个时期他模仿颜真卿、五代的杨凝式。第三期是绍圣元年以后，现存书作很少。中田氏提出的结论是，苏轼的书首先学《兰亭序》的自然风格，然后学颜真卿流露人性的书法。中田氏还研究苏轼的艺术论和词。

《在苏轼文学中世俗题材的高雅化》，合山究，1974，《中国文学论集》4，《滨一卫先生退官纪念号》。在该文中合山氏云：苏轼在诗中常常以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为题材。比如小动物、昆虫、药草、少见的蔬菜、日用品、风俗习惯、饮食品等等，不胜枚举。但苏轼咏这些家常琐碎的时候，还用有典故的炫耀学问的词，把世俗的素材赋予高雅的气氛。这种作诗方法是黄庭坚所倡“以俗为雅”的作诗方法。合山氏还云，这些宋代诗文的“日常性”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在新文化兴起、经济生产发达的宋代，统治阶级的士大夫往往被要求具有广泛的知识。再加上他们到赴任地区以当地特色名产为题材赋诗，如果这些诗传遍天下的话，可以为地方文化的普及做出贡献。合山氏还撰写了《苏东坡的和陶诗（上）》（《中国文艺座谈会笔记》15, 1965, 7），《朱熹的苏学批判·序说》（《中国文化论集》3, 1972, 5），《苏东坡的自然观》

（《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所收，1974,10）等论文。

《梅花与返魂》，岩城秀夫，1978，《中国人的审美感》（创文社）。岩城秀夫，中国文学学者。他在该书中云，苏轼到黄州的途中咏《梅花》二首，苏轼以深山幽谷中秀丽的梅花安慰自己孤独的处境。之后苏轼对“梅花”怀抱着特别的感情。在黄州生活小康之后，他开始期望恢复原职，相信梅花的幽香有神奇的力量，把自己的心愿寄托在梅花上。在“长于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元丰六年在黄州）；“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四，元祐六年）等诗句中，可以看见他的心愿。以后苏轼终生把梅花作为知心朋友。

### 三、平成元年（1989年）以后

在平成时代刊行有以下研究苏轼的单行本：

★《苏东坡文艺评论集（东坡题跋）》，丰福健二译注，木耳社，1989,2。

★《苏轼·陆游》（《鉴赏中国古典》21），村上哲见、浅见洋二著，角川书店，1989,2。

★《苏东坡》，石川忠久编，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0,1。

★《苏东坡诗话集（东坡题跋）》，丰福健二译注，朋友书店，1993,12。

★《橄榄》第七号《专题·苏轼的文学》，宋代诗文研究会编，1998,7。

★《月刊しにか》《专题·苏东坡》，大修馆书店，1998,11。

★《橄榄》第八号《专题·苏轼的文学II》，宋代诗文研究会编，1999,10。

丰福健二译注的《苏东坡诗话集（东坡题跋）》，是中华书局校点本《苏轼文集》第66、67卷的翻译。

《橄榄》第七号、第八号《专题·苏轼的文学》的编者宋代诗文研究会，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氏主持的研究会。主要的研究活动是：①钱钟书《宋诗选注》译注，②

刊行宋代诗文专辑《橄榄》，③召开《宋代文学研究谈话会》（1999年邀请上海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在该会中有许多青壮年中国文学研究者参加。

在平成时代刊行的论文还有：在该书第7、8卷中收入《宋诗选注》所录的苏轼诗译注及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上、下）（大木尚子，矢田博士译）、保荻佳昭《苏轼与柳永词》，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考（上）》等论文及梅田雅子《苏轼文学研究单行本目录》。泷本正史《苏轼之“水”与他的世界观》（《集刊东洋学》52,1984），近藤正则《苏轼的〈武王非圣人〉论》（《国学院大学汉文学会会报》30,1984），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初探》（《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1986），田中正树《北宋的中庸和皇极·契嵩与苏轼》（《集刊东洋学》62,1989），大野修作《在苏轼书画论中的虚实之理》（《书道研究》4~11,1990），宇佐美文理《苏东坡的绘画论与〈东坡易传〉》（《日本中国学会报》42集，1990），石本道明《东坡咏竹诗管窥》（《国学院中国学会报》38,1992），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词考》（《日本中国学会报》44集，1992），保荻佳昭《苏东坡词中的“梦”词》（《汉学研究》29,1993），汤浅阳子《苏轼的吏隐》（《中国文学报》48,1994），土田健太郎《苏轼思想概略》（《中国社会与文化》12,1997）等。1989年以后还发表有不少优秀的论文，可惜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

（池泽兹子，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 我与苏东坡的“第二次握手”(三)

## ——河南卫视《成语英雄》拍摄记

李 新

河南卫视《成语英雄》第二季晋级赛之后，产生十二强，接下来是复赛，要求选手两两对决，开始比了，我穿着爱人韩松言买的粉白色“七匹狼”衬衣登上成语桥，手搭凉棚，举目眺望三位成语先生上方的大屏幕，这时窦文涛老师说：“嘿，李新这次的架势很精神，好像海军陆战队队员……请看大屏幕，开启第一题！”第一题成语画面：一块飞石，击中一对小鸟，太简单了，我直接书写“一石二鸟”，呼和浩特二中高三语文老师王铁军也写完了，公布答案，他写的竟是“一石双鸟”，错误！我率先赢得一分，成语桥向中央缓缓行进，我双腿立正，右手向三位成语先生敬了个军礼，他们又笑了：“果然像海军陆战队……”第二题，画面上是一匹白马，地面上有一道裂缝，右上方有一个钟表，画的是十点的时刻，我不禁问到：“上面指向十二点的是时针还是分针？”钱文忠先生说了一句：“原来他在注意那里，长的是分针吧……”实在想不起来，心态尚好，只好笑笑，写了一个英语单词“Sorry！”答案是“白驹过隙”，王铁军得了一份，1:1平局，实际上，“白驹过隙”典出《庄子》。隙，应指的是门的缝隙，画家没有重视原典给选手有一些误导。后来，我写英语的事，还在“综艺真人秀”网站上登载，说“大学老师李新，不走寻常路，遇到难题，以英语单词作答……”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呵呵！

第三题开始了，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一只小鸟，衔着树枝，向高处的大树飞去、搭窝，下方是人们开着大车，驶向新建的房屋……我想了一下，一定是《诗经》中的“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比喻迁徙搬家，于是，写

下“乔迁之喜”，而王老师写的是“车载斗量”，答案公布，果然是“乔迁之喜”！钱文忠老师也解释了典故，果然是《诗经》，我2:1领先。到了第四题，画面是一个人盘膝而坐，闭着眼睛，双手捂着耳朵，我以为是“充耳不闻”，不想是“闭目塞听”，王老师又追平了。到了第九题，画面是额头有月牙的包青天，用手推却一个向他行礼的人，我笑了笑，摇了摇头写下了“铁面无私”，这时窦老师说：“哟，李新选手很不屑地笑着摇了摇头，对他太简单了！”而过了好半天，王老师还没动静，我也默默地等候着，读秒声到了，结束！他不会，答案揭晓“铁面无私”，我获胜了！我们胜败已分，我又不禁地向三位成语先生敬礼，这时，王蒙老师笑着点评：“李新选手今天的状态真是不错，学文的就要这样，不仅有学问，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要块儿有块儿，多好，英雄，咱绝不能怂……”

之后就录制胜者组的争夺单场冠军的比赛，六人登上成语桥，面向评委，屏幕上出现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大家写成语加以描述，三位评委亮灯来评定胜负，我写的“宜嗔宜喜”和第二轮“嫣然一笑”，三盏灯全亮！我成了第一场“成语英雄”冠军！窦老师宣布：“请王蒙主席，为你颁发成语樽！”好美的成语樽——下面是梯形长方体，写有“成语英雄”，上方是一颗镀金的大五角星，对着镜头，我不仅吻了它一下，梦想，竟这么快实现了！不，虽然第二场，冠军可以轮空直接进胜者组，但下面的赛程还要继续，努力……

（李新，保定学院副教授、河北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 “苏东坡的流寓人生与文学研究”会议召开

本刊讯（一隅）11月1~2日，“苏东坡的流寓人生与文学暨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广东湛江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湛江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海洋大学主办，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承办，来自日本南山大学、日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昌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广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湛江市雷州文化研究会等单位的8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章超桦、广东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林有能、湛江市社科联主席余伟民、湛江市雷州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华江到会并致辞。

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苏东坡的流寓人生与文学研究”、“雷州半岛及其它地区流寓文人研究”、“流寓文化理论与流寓文学研究”三个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关于第一个主题，蔡毅教授以日本五山时期苏诗注本《四河入海》为例，对苏轼岭南诗的异国

别解现象进行了探讨；陈才智研究员从咏梅诗的视角切入，就苏东坡对白香山的受容与超越进行了细密解析；张强教授从“和陶诗”着手，论述了苏轼的心态变化与审美追求，认为陶诗是苏轼寻求精神寄托的支撑点；韩大强教授、刘洪生教授、乔建功先生等分别考察了苏轼的饮茶诗词、苏轼诗中的“水”和苏轼流寓人生的归宿之迷。关于第二个主题，除对苏辙、秦观、胡铨、汤显祖等雷州流寓文人的行迹与创作进行考察外，蒋寅教授关于李宪乔之流寓粤西、文师华教授关于苏辙之流寓筠州、蔡平博士关于王粲之流寓荆州、杨挺博士关于陆游之流寓成都、唐芸芸博士关于翁方纲之流寓广东的论说皆论析缜密，各具见识。关于第三个主题，张学松教授对“流寓”概念的界定、对流寓类型的划分、对流寓原因和流寓之时代地理特征的分析扎实有据、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曾大兴教授对流寓文化研究与文学地理学之关系的述论、任群英教授关于流寓地对流寓文人反哺效应的探讨、王小岩博士对李贽流寓观的分析皆自出机杼、引人注目。

## “地方传统文化进课堂”教学展评举行

本刊讯（一流）11月20日至22日，首届“地方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高峰论坛暨全国中小学“地方传统文化进课堂”教学展评活动在泸州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中小学语文教师齐聚一堂，聆听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顾之川先生《地方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和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周裕锴先生《文化巨人苏东坡》的专题讲座，以及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

范、著名特级教师韩军老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课堂教学。

20日下午至22日，教学展评活动在江阳区教培中心（小学组）、泸州外国语学校（中学组）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二十四位参赛老师在课堂上尽展风采，用富有个性化的课堂教学诠释了对地方传统文化进课堂的独特理解。经过激烈角逐，分别评出一、二等奖，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颁发获奖证书。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东坡学校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机构参与了此次活动。